周保中　遗著



战斗在白山黑水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战斗在白山黑水

周保中 遗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11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5/8　插页：4
印数：1—13,6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景富　责任校对：王　得
封面设计：耿志远

统一书号：10090·340　定价：0.4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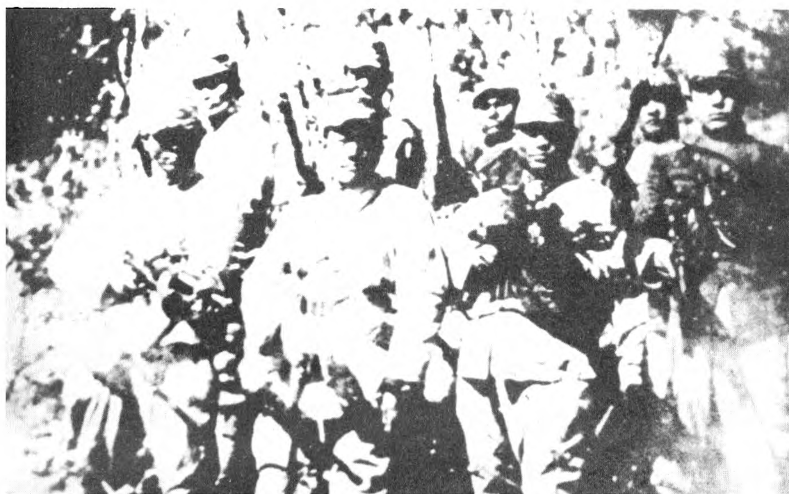
周保中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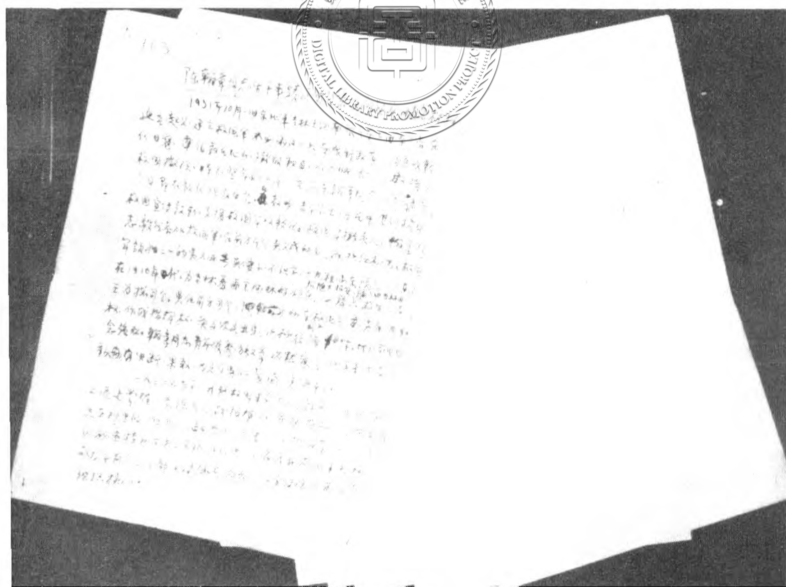


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在密营前集合，正准备去战斗。（前排右起二、四、五、六是女战士。）

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在大树上刻布告和抗日口号。



一九三九年夏，东北抗日联军小队在行军中。



周保中同志手迹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序　言

周保中同志是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杰出的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和优秀党员。在艰难的战争年代，他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周保中同志的高大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周保中同志原名奚李源，字绍黄，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人，白族，生于一九〇二年。他十五岁时，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虚报两岁，投军入伍，参加了“讨袁护法”的斗争。以后，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七期工兵科学习。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大革命的激流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的组织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周保中同志曾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秘密到浙江、湖南、河南、河北及山东等地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

一九二九年冬，中共中央派他去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党派他回上海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派他到满洲省委工作。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到了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事运动部主席（即军委书记），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

“义勇军组织法”等。约半年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派他到抗日自卫军和救国军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各种抗日组织，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提高了党的威信。

一九三五年二月，周保中同志担任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军党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底，他又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领导四军、五军、七军、八军、十军和救世军，此外一路军的第三师也经常和五军部队在一起战斗。部队活动在吉林省东部地区和中东铁路、哈绥铁路两侧及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等广大地区约三十余县，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他和东北人民一起与日寇奋战了十四个年头。

日寇投降后，周保中同志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十几万八路军和数万党政干部，迅速进入指定地区，及时掌握了东北地区的领导权。同时，他积极协助彭真、陈云、李富春、林枫等同志，为消灭日伪残余势力，实行土地改革，扩建党和军队组织，建立东北各级地方民主政府建立了功勋。

周保中同志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时期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领导了东北人民和抗日联军，同日寇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并牵制了日寇精锐的关东军六、七十万人，伪满军三、四十万人；积极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周保中同志从入党的那一天起，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他都是战斗在第一线，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不懈的

斗争。他曾五次负伤，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仅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他就曾三次负伤，有一次肠子被打出来了。当时，哪有医疗条件呀！连治外伤的药也没有，可是他不叫一声痛，硬是将肠子塞回腹部，敷上草药，用绑腿缠好，仍然坚持战斗和工作。他的模范行动，深深地鼓舞着广大的抗联将士。

“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进入了高潮。抗日烽火到处燃烧，日本侵略者到处挨打、碰壁，伪满军成连成团的起义；参加抗日救国的人们也揭竿而起，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然而，日本侵略者为了加速实现占领全中国的狂妄计划，调关东军入关。这就必须先拔掉插在他心脏上的一把钢刀——东北抗日联军。为此，将关东军增加到五十多万，再加上伪军、山林警察大队等，聚集了多于抗联几十倍的兵力，对抗联进行了疯狂、残酷的“讨伐”和围攻，使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极其残酷的年代。

一九三八年冬，整个形势对我抗日联军来说更加恶化，日寇加强了对抗联的围剿，对群众已完成一整套的法西斯统治：强迫归屯并户，修集团部落（围子），搞保甲制，实行十家连坐，一家犯法，十家全杀。同时，用深沟堡垒，坚壁清野，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等办法，企图割断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在军事上则继续增加关东军到六、七十万人，进行“大讨伐”，步步推进，实行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来回拉网、搜捕、围攻，派特务混进来搞瓦解、破坏、暗杀等来进攻抗日联军；天上配以数十架飞机轮番侦察、扫射、轰炸；以步兵和骑兵交替搜索追击，企图一网打

尽，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当时的情况，对我军是十分不利的，自然条件也威胁着我们，气温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北风怒吼，大雪齐腰，冻得断指裂肤，肚子里又缺少食物。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周保中同志却鼓励同志们说："越是困难的时候，同志们越是要振作革命精神，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坚持革命，战斗到底，决不能苟且偷生，玷污伟大革命战士的气节。"为了突出重围，一天，他命令部队保持一定距离，跟着敌人的踪迹行动，然后，在深夜穿插，绕过敌人数道封锁线，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行程二百多里，终于钻出了牡丹江东岸的敌人包围圈，紧接着又以神速的行动，袭击了方正县陈家亮子的日寇"森林采伐队"，达到了歼灭敌人，补充枪支、弹药、服装、给养的目的，并解放了一千多名林业工人。在周保中同志指挥下的其他部队，在互相支援密切配合下，也同样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大讨伐"计划。

正是由于周保中同志忠于我党的民族解放事业，同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因而日寇对他是深恶痛绝的。早在一九三六年，日寇就先后在牡丹江地区、松花江下游地区，到处张贴布告，或散发传单捉拿他，并以重金收买他的首级，赏金由五万元增加到数十万元。然而日寇却什么也没捞到，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东北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可是当年出卖东北的蒋介石，妄图吞并抗战的胜利果实，又拉开了内战的战幕。周保中同志这时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

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共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委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在东北局的领导下，仍站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到了北京正准备南下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了，住进了北京医院。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医生认为，必须进行治疗和休息，最少要半年时间。但是，周保中同志却坚决要求带病南下，对劝他的医生和同志说："多少同志都倒下去了，我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多年来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我决不能掉队。"他决然南下了。云南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民委主任、云南大学校长、中共西南局委员等职。因周保中同志是白族，对多民族的云南省的党政军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带病坚持工作三年多，到一九五二年冬，心脏病更加严重了，多次休克，医生再三劝告他治疗休息一年，组织上也要他听医生的话，这时他才同意休息治疗。不久，调他到西南大区工作，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等职务。他到重庆后，早已把疾病忘在脑后，忘我地工作着。直到一九五四年夏，他的病很严重了，心力衰竭，就连拿一杯水的力量都没有了，情况很是危险。经贺龙同志报告中央，周总理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治疗中，又发现他患有严重的胆结石症，每次发作都严重地威胁着心脏，随时有生命危险。此时此刻，周保中同志丝毫未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在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中，还忙着看文件，整理历史资料，接见来访同志，或者去参加会议等。我和同志们多次

劝他要注意休息，可他却说："我为党工作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只要我能动，就要为党做些工作，不看党的文件怎么能行呢？"

一九五九年周保中同志的病情更加恶化，严重的心肌梗塞，卧床不起，不准探视。这时，东北来了两位同志要和他谈问题。我和他的秘书考虑到他的病还在危险期，不能会客，就拖延了几天才告诉他。他立刻批评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远道来的同志应及时接见才对，我不能起床就躺着谈也好嘛！过去打仗时和群众在一起，今天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不能和群众疏远。"他对群众来信、来访，都是有问必答，有求必见。有些事情年深日久很难想起来，他就写信向老战友询问后再回答。有些信，是他直接答复的，有些虽是请秘书代写的，但都是在他亲自过目或修改后才发出的。

周保中同志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他继续发扬大革命时期、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股革命干劲和革命热情，克服了病痛的折磨，用颤抖的手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我和同志们都劝他等病稍好一些再写，可他执意不肯搁笔。按他的说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现在活着的人不多了，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自己有限的时间整理出来，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牺牲了的先烈们。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周保中同志夜以继日地写呀，写……

周保中同志因病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他

的高大形象，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周保中同志的遗作《战斗在白山黑水》一书出版了。书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仅是周保中同志生前在病榻上所撰写的一小部分。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十四年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先烈们的光辉业绩；是了解和研究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以及激励人们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的有益教材。

我作为周保中同志的亲密战友、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对于周保中同志遗作的出版，感到十分欣慰。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让我为此书写序，我感到很荣幸。但苦于自己水平有限，又对整个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史和周保中同志的整个经历了解不够，恐有失读者期望，深表歉意。

王一知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目　　录

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最初短时间内基本奉行全国一致的革命路线。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后，依照中央新的指示，在东北贯彻执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过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前后十四年，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写下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历史篇章。但是，这一段历史，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来加以系统的总结，有待于各方面的及早努力。本文仅仅用单纯的回忆形式，并偏重于军事方面作概括的叙述，为了解、研究东北人民革命历史提供参考素材。

一、东北一般状况

旧时代人们常说：“关东山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不如说：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世界闻名的原始森林参天高。东北地区虽然处于严寒地带，因为冰雪覆盖着广阔的原野，滋润了肥沃的土壤，风调雨顺，水利丰富，实为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好乡土。能供应现

代化需要的地下矿藏，种类几乎应有尽有，数目非常之多，真是一块半开发或未开发的处女地。就这样，“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日本军阀首相田中义一奏折称：“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把侵略东北当成推行其“大陆政策”，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首先必须夺取的扩张基地。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反动派通过诱使张学良“易帜”，加强了他们在东北地区（包括原热河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危机的爆发，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相对稳定，促使美、英、法极力拉拢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拉拢奉系军阀张学良。这样就加剧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一方，以美、英、法帝国主义为另一方，为争夺中国和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尖锐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以旅大及附属地为立脚点，在东北有近三十年的经营，尤其在南满更握有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控制权，当然不能容忍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推进和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家越来越巩固。以美、英、法为背景的，由蒋、张发动的反苏进攻又遭挫败。中国土地革命在长江流域正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差不多都错综复杂地集中到东北，或直接、间接地影响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进攻苏联，特别是它认为要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同时为扑灭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尽其宪兵

作用，反对它的竞争者美、英、法帝国主义，那就非发动武装侵略，占领东北不可。日本帝国主义也估计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蒋介石是会“逆来顺受”，宁肯对外不抵抗，对内也毫不放松对人民革命的镇压；而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也会袖手旁观，放任日寇为所欲为的。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走钢丝”当作坦途，向东北进行武装进攻。

二、事变的突发

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炸毁了沈阳北柳条湖火车道，然后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制造了所谓“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开炮袭击奉军北大营和兵工厂，占领了沈阳市。当时南京政府蒋介石总司令命令东北的张学良副司令采取不抵抗的方针，一味“退让”，助长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于是日寇很快占领了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翌年一月进占哈尔滨，① 大体上控制了满洲战略地区。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建立伪满洲国，抬出傀儡溥仪做“执政”。从此东北沦陷，东北人民蒙受了做牛马奴隶的奇灾大难。当时民间曾传诵着这样的一首歌谣：

日寇袭来莫慌忙，
攘内安外蒋主张。

---

① 日寇攻下哈尔滨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周保中同志此处是指进攻哈尔滨的时间。

御敌有术不抵抗，
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命，
叫尔小民做羔羊。
亡国恨，空前绝后！
要生存，惟有自强！

三、党的主张

在中国大革命以及土地革命时期，东北虽然没有象长江流域那样掀起过大的风暴，但东北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影响下与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曾经在南满和北满一些地方发生过规模较小的反帝反封建、反买办阶级的革命运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与奉系军阀合流以后，这一斗争日趋尖锐。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指使，向苏联进行试探进攻。中国共产党特别指出：东北的外来危险，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阴谋；东北人民和土地有被蒋介石反动派出卖的可能性。不幸而言中，“九一八”事变，证明了这个预断，同时也表明了东北人民对日寇侵略东北，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不是没有革命行动的。

事变后两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宣言。九月二十一日满洲省委发出紧急通告，强调指出：日寇侵略东北其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并为进攻苏联做准备；中国人民，东北人

民的民族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卖国投降政策给带来的，不能对它寄予任何幻想；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自己起来救国自救，组织民众政府，自动抵抗日寇进攻，才是唯一的出路。党的这一号召，深入东北民心，因而掀起了东北初期抗日救国高潮，武装军队纷纷起来抵抗日寇，给日寇军以最初的打击，迫使日寇不得不推迟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计划。

四、初期抗日，旧军队的崩溃

事变爆发后，东北广大军民，对南京政府的“镇静”、“不抵抗”感到非常失望，因而激起了义愤。在日寇还未占领的北满、吉东地区，掀起了自动抵抗的浪潮。黑龙江地区马占山所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① 揭起抗日旗帜，部队开往嫩江桥前线，英勇地阻击进攻的寇军。继之而起的有：苏炳文的东北屯垦部队（黑龙江省抗日军）；中东铁路护路军丁超军两个旅②；镇守依兰的李杜二十二旅③；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④；守备吉林市的冯占海、李海青⑤ 等的警卫队

---

① 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正式爆发是在十一月三日，但在十月间北部边防军黑龙江军已经同投降日寇的张海鹏部逆军交战，周保中同志说十月揭起抗日旗帜亦可。

② 此处应为中东路护路军丁超的二十八旅和赵毅的二十二旅。

③ 李杜所部应是二十四旅，此处作者记忆有误。

④ 此处应为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六六〇团。

⑤ 李海青，原名李青山，又名李忠义。他原是黑龙江万福麟部下营长，事变前因事系狱，为马占山放出抗日，他并未充任吉林军里的警卫队，周保中同志此处记忆有误。

（吉林自卫军）；辽宁旧东边道地区的奉军唐聚五、李春润部队（辽宁民众自卫军）等都宣布“抗日救国”。驻在延边的原吉林陆军第三旅第七团的“老三营”①，以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为首，在事变后不几天就暴动起来了，刹那间卷入数万之众，组织救国军到处打击日寇。辽东三角地带有邓铁梅、苗克秀、王凤阁等部；辽西和辽热边境有耿继周等部义勇军。此外各地保安队、警察武装也纷纷起来抗日。有些地区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起来积极抗日。就是那些由畸形社会条件造成的“胡匪”队伍也都打起“反日山林队”旗号，阻扰日寇的行动。从事变后到一九三二年初，北满、吉东、东满地区的抗日武装达三十万人，辽东南和辽西近十万人。其中五分之三是旧东北的正规军，人员配备很完整，有相当的战斗素养。军事后备潜力是很大的，仅民间枪械就近百万支。作战可以依据和回旋的地区也是很广的。这四十万左右的军队受到全东北人民沸腾的抗日情绪所鼓舞，斗志是高昂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地区组织当时的力量虽然还微弱，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但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共青团员，曾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在各地给这些抗日武装军队以各种支援。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抗日援马代表团”的名义，到黑龙江战地进行慰问和宣传鼓动，并派志愿兵参加战斗。翌年一月，

---

① 王德林的“老三营”原属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二十七旅六七六团，此番号之前为吉林陆军第十三旅第七团，六七六团是后改成的全国统一番号。周保中同志沿用的是旧番号，但又把十三旅误为三旅。

曾在哈尔滨宣传和组织各阶层群众支援吉林自卫军在双城、榆树地区的作战，组织各界群众协助自卫军保卫哈尔滨的活动。当救国军在延吉暴动前夜，中共东满特委派遣有力干部多人，参与暴动和组织救国军的计划。在救国军进攻敦化、额穆、东京城、宁安、汪清地区行动中，党的干部同该军的上层领导左倾激进分子互相配合，树立了坚强作战指挥，并动员东满革命群众组织义勇军参加作战，或担任交通运输，以及敌后的别动游击。中共南满特委和吉奉铁路线的党组织以同样的积极行动，对辽宁民众自卫军——辽东、辽西反日义勇军给予支援。各级党的活动干部，曾向这些旧军队的上层领导恳切地提出过建议：抗日军队必须依靠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必须团结一致，分区活动，统一指挥，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并采取机动作战，放弃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党曾经耐心地开导和不倦地宣传解释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首先是发挥朝鲜民族的抗日积极性，使他们广泛地参加抗日斗争。但是这些旧军队的上层领导们，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影响，往往拒绝党的主张，有的人口头上接受，暗地里还是坚持自己那一套，或者接受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拒绝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在某些领导上层人物中，虽然没有执行公开的“反共”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自动组织武装抗日是违法的，因此最初时期，党所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海伦游击队、汤原游击队被黑龙江抗日军摧毁了。穆棱和密山游击队被吉林自卫军缴械了。磐石和海龙游击队两次受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延边各县的游击队受到救国军的限制。有的救国军领袖还不止一次的阴谋暗杀

党在该军中的领导干部和左倾激进分子。

这些旧军队上层领导们，虽然揭橥着抗日救国的旗帜，军队上级军官、战士和人民群众还跟着他们走，但他们并未脱离旧军阀的老路。他们之间经常为了抢夺地盘扩充个人势力、争夺关内外爱国捐款、分配驻地、军事物资等而进行内部斗争，甚至互相火并。在军事上，每与寇军接触，士兵在前线奋战，有的将领就在后方逃亡。各军之间没有相互支援，甚至有些将领“身在曹营心在汉”，早与日寇特务勾勾搭搭，或者促使抗战行动垮台，或者一遇局势稍稍不利就动摇投降日寇。

当着黑龙江抗日军正在嫩江桥声势浩大地抗击日寇的时候，海拉尔屯垦区苏炳文等以及吉林省丁超、李杜等的自卫军静静地作“壁上观”。等到日寇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丁、李、苏等才不得不起来抵抗。而声震一时的“民族英雄”马占山却与日寇谋妥协。日寇正准备从牡丹江西岸向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进攻的时候，救国军孔宪荣，谋杀了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①，给日寇造成了进攻的有利条件。

总之，初期抗战的最大弱点是：第一，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影响，在这些抗日旧军队中的上层领导人物的头脑中，占着一定地位；第二，广大群众和爱国战士，还没有能够从反动统治传统思想下解放出来，束缚了高昂的斗志；第三，共产党在东北组织的革命武装力量——人民游击队的力

---

① 马宪章，字则周，时为左路总指挥。杀害马宪章者为刘万奎，外号刘快腿，此人后来投日。当时风传刘万奎杀马系孔宪荣唆使，但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确实证据。

量还小，还不能在这些旧军队里起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关东军最初仅仅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事变，并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地。以后寇军增加到四个师团向北满和吉东、东满举行进攻。日寇充分地利用了抗日旧军队上层领导的腐败和弱点，施展政治分化、特务渗透、挑拨离间和收买诱降等手段，配合着正面的军事行动。这些庞大数量的抗日军队，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被各个击破，并使之趋于瓦解和崩溃。日寇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东北地区的整个局势。虽然在嫩江地区，吉林、长春地区，奉吉铁路沿线，牡丹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曾对日寇军进行过无数次的激烈抵抗，牺牲了不少的英雄人物（日寇死伤亦达二万余人），但是由于丁超、王之佑等投降，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的逃跑，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宣告挫败，影响所及，使东北广大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浪潮趋于低落。

五、抗日游击战争新高潮

以军队为主体的抗日斗争过程中，虽然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受到少数上层领导的反对、阻挠、破坏，但是东北党组织坚持不渝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路线，组织人民群众，组织人民武装，以坚决彻底地进行抗日自救、收复失地为使命。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党组织在南满、东满、北满各地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青年、爱国人士中不倦地宣传鼓动，组织群众性的、公开的、秘密的“反日

会”和“农民义勇军”。延边、磐石、海龙、宁安、穆棱、密山、饶河、汤原等县组织了人民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限制，几经被破坏，但仍然主动地、勇敢地参加旧军队的抗日作战，在斗争中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到达满洲省委，这正是旧军队崩溃瓦解之后，人民群众悲观失望，而日寇额手称庆，进犯热河，巩固长城线，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缔结“塘沽协定”的时候。满洲省委号召与督促全东北党组织，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加强扩大各地人民游击队；另一方面在溃散后的各色反日武装部队中积极开展工作，以挽回东北抗日消沉和混乱的局势。在三万左右武装救国军中，加强党的领导，重新建立救国军总司令部，整编各路军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在救国军总部直接指挥下，第二次攻占安图县城，控制了全县和邻近的抚松、桦甸、敦化、蛟河各县的一些小城镇和地区，建立起“辽吉边区”根据地，不断袭击京图铁路沿线的交通运输和寇军据点。在宁安县境，新编的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的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干部，组织了党委。他们团结了救国军、自卫军残部和反日山林队约二万人左右。在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下，攻占了东京城、南湖头，袭击了宁安县城，展开了牡丹江流城的对敌游击战，不断打击出扰的日寇，威胁中东铁路东线地区。东满延边各县的人民游击队，揭穿了日寇进行民族挑拨的阴谋，变民族歧视、对立，为民族团结合作。他们与救国军和各种反日山林队相互支持，西至“辽

吉边区”，东达中东铁路。这里的朝鲜人民游击队，团结好，纪律好，战斗力强，成为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核心力量。南满方面自一九三三年夏，海龙和磐石游击队合并改编为磐石人民游击队，同年秋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在这过程中，由于该部队的积极活动，联合与支持着吉奉铁路沿线最大的反日山林队“殿臣”、“双江”（罗明星）、“老双胜”、“德林”等约万人的抗日武装，不断破坏铁路交通，伏击日寇。吉奉铁路交通曾被割断半年之久，吉林市和抚顺矿区经常受到威胁。磐石人民革命军分遣部队扩大活动到达通化及安奉铁路线，联合着那个地区的王凤阁部队，以及辽宁自卫军的残余部队——邓铁梅、苗克秀残部约七八千人，坚持抗日游击斗争。

由满洲省委直接指导的珠河县中心县委，一九三三年成立了“珠河游击队”。在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右岸、中东路两侧，展开游击斗争，不断获得胜利，吸引着自卫军的残余部队李华堂、于海云、孝风林及其他反日山林队，共约一万多人的武装。从珠河游击队——哈东支队为中坚，继续同日寇对抗。远在饶河中心县委领导的饶河游击队，支持着救国自卫军陈东山、高玉山等四、五千人的抗日部队联合行动，曾经攻占虎林县城及团山子等地，不断打击乌苏里江岸的寇军。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南北满由旧军队留下来的，以新的组织形式出现的抗日武装总计十余万人左右。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影响不再起领导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它的威望提高了，统一战线政策思想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行动主张，大体上为他们所接受；（二）党所领导的人民武

装——游击队逐渐扩大加强了，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比较系统的、高级的组织形式，并成为各种抗联武装的榜样和核心力量；（三）南北满各地的抗日武装开展规模不同、作战方法不同的游击战斗，使日寇军到处遭受打击，兵力损折越来越多，迫使日寇改变以往的作战方式——由以静制动，以少胜多，分进合击，各个击破，不得不增加兵力，分散到广大地区，处处防守，陷入被动，随时随地有遭受袭击的危险；（四）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以后，不仅在游击地区的人民群众几乎普遍地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直接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就在寇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沿线据点，也都建立起地下"抗日救国会"和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短时间挫折之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日寇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民游击战争，为了更残酷地压榨和欺骗东北人民，为了混淆国际视听，表示侵华反苏的决心，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组"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开始实行保甲制、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批地掠夺民族工商业；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支；并施行武装移民。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向人民加紧压迫；同时不断地增加日寇关东军，改组伪军（一九三四年初日寇达二十余万人，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达五十万人）。在军事行动上，以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攻对象，不断地进行大"讨伐"。日寇计划在较短的时期内达到

“治安肃正”，巩固“满洲国新秩序”，但是情况的发展与日寇的意愿相反。由于民族的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政策，人民觉悟的提高；新型抗日军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东北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经过短暂时期的挫折之后，又重新高涨起来了。

一九三四年初在依兰县土龙山区，为反对日寇收缴地照和枪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数万农民大暴动。在不到十天之内，一个县区就打死打伤日寇饭塚大佐以下三千余人①，暴动很快蔓延到松花江右岸的富锦、同江、宝清、勃利各县。在这同一时期，正是南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部队占据着广大农村地区，向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铁路沿线据点，不断地袭击，粉碎了敌人的历次出击和“大讨伐”，形成了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七年间抗日游击运动的高潮。在这一长时期内，东北地区党组织基本掌握并贯彻执行了中央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中央《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的《告全党同志书》。这些指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抗日联军的建立

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中共东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时期，在延

---

① “三千余人”应是“三十余人”之讹。据载土龙山暴动打死日寇饭塚以下二十三人，还击毙伪军盖文义大队长以下五十余人，说“三千余人”。当系笔误。

边和绥宁以及吉海铁路各地区，曾组织起农民和工人的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卫队。它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反对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东北地主和军阀。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使用原始武器，活动不经常，而且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对于群众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东满延边各县的反日游击队，吉海铁路——磐石、海龙县反日游击队，密山、饶河、汤原反日游击队等，迅速地建立起来。虽然受旧军队和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破坏、阻挠，但这些游击队有斗争历史渊源，直接从革命群众中产生，因此颠扑不破，在抗日的内部斗争中，在同日寇的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不象“巴彦游击队”那样，缺乏斗争经验，加上该部队领导干部又执行错误路线，脱离群众，结果使时机成熟、人数众多、枪马齐全、地域条件优良的部队，经不起风险，很快地瓦解无遗了。

一九三四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抗日新高潮及人民武装斗争的新发展，把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等队伍，逐步着手进行统一军队建制，使人民武装游击运动日益加强起来。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醉心于侵略的日寇，借口南京蒋介石卖国政府履行“塘沽协定”不力，以军事重压加于平津和整个华北，引起全国愤慨。中共中央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主张全民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东北人民武装就在这前后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如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一九三一年末在伊通、磐石、海

龙建立了反日的赤色游击队。一九三二年春，磐石哈马河子中朝农民暴动以后，地下人民武装——自卫队，和义勇军这些队伍合并为南满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二周年，在磐石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有三个团和师直属队；一九三四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十七周年，扩建为二个师和军直属警卫团、少年营。并在通化地区、鸭绿江左岸、安奉铁路两侧，以统一战线形式，编建了十个游击支队，以联系辽宁民众自卫军和东北反日义勇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一九三五年秋，增编为三个师，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一军。

抗日联军第一军最初的根据地在磐石的二、三区，即玻璃河子、石虎沟，桦甸县的票河、横道河子、色洛河、红石砬子，辉南县和金川县的大房身、二岔沟以及抚松、通化、临江、集安、长白各县的山区。基本的游击区扩大到吉奉铁路、安奉铁路和通化地区、鸭绿江东岸地区二十余县。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九一八”事变前以及以后不久，曾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在一些山区建立过“苏维埃”和赤色游击队。救国军王德林暴动起来以后，中共东满特委除派遣干部参加该军活动外，并指示各县游击队积极加强反日游击战争，并从汪清县里的赤色游击队里选派五十人左右的一支小部队，参加救国军的“别动队”。一九三二年各县赤色游击队及别动队都有相当的发展。一九三三年初，东满特委正式取消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改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会和人民代表会议，把各县的赤色游击队、反日游击大队，于一九三四年春建立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延吉大队编为第一团七个连。一九三四年末至一九三五年初，以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为基干，改造成功了救国军的一个旅，扩编为两个师，一个警卫营，一个青年义勇军大队，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二军。一九三五年末，扩编为四个师和军直属警卫团、青年义勇军大队（教导队）。

抗联第二军最初的根据地是：延吉县的鹰湾沟、倒木沟，海兰江山区和哈尔巴尔山区，汪清县的大小汪清，绥芬河山区、八人沟、对头砬子、腰营沟、大黄崴子以及汪清和珲春之间的山区。后期的根据地是安图县、敦化县、桦甸县交界及抚顺、长白山区。基本游击区是中东铁路东线以南，图佳铁路、牡丹江市以南，京图铁路老爷岭以东到图们江。西部为抚松、濛江、长白、临江、集安等约二十个县。

抗日联军第三军。一九三五年初，满洲省委鉴于巴彦游击队和珠河工农反日义勇军与孙朝阳救国义勇军失败的教训，指示珠河中心县委坚决执行组织人民武装——“反日游击队”。这个部队初期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把从孙朝阳部队分离出来的李启东等同志的武装，和珠河地方武装合并组织起来。大力开展珠河、阿城、双城等地区游击战斗，队伍迅速壮大。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珠河县宣告正式建立“珠河反日游击大队”，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一九三四年六月因战斗不断胜利，队伍发展壮大，扩建为“哈东反日游击支队”。下分九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迫击炮队，一个教导队。同时以哈东游击支队为基础，联合其他各色队伍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建立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同年八月一日，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三军。初编九师之众，后缩编为六个师。

抗联三军的根据地最初在珠河、延寿、五常以及方正县大小罗勒密一带。一九三六年以后，主要根据地移转到松花江左岸汤原、东兴、庆城以及北安、绥化以东山区。该军基本游击区最初为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右岸十余县，以后扩大移转于松花江左岸、绥化、佳木斯铁路沿线及黑龙江右岸之萝北、佛山、绥滨县等，共达三十余县。

抗日联军第四军。“九一八”事变，王德林暴动组织救国军以后，组织了许多次的重大战役，如攻占敦化、额穆，伏击天野部队,进攻宁安以及中东路磨刀石车站的寇军等等，救国军总部直属的补充团起着骨干作用。这个团始终在党的政策思想指导之下行动。王德林、孔宪荣逃亡后，这个团成为救国军新编的游击军的基干，在绥宁地区联合救国军和自卫军残部以及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新的抗日战斗，掀起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新高潮。但是，由于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党的组织领导意见不集中，没有坚决执行吉东党的军事指示，从宁西南部轻易地向中东路以北移动，结果遭到寇军多次阻击，部队受到一些损失。一九三三年冬，游击军司令部和补充团到达密山和林口以东地区，部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四年秋，中共密山县委领导的密山游击队合并编入游击军，增加了新的核心力量，建立为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并开展了密山、林口、勃利、依兰、方正以及东部宝清、虎林、饶河一带的游击活动。一九三五年冬正式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四军。初编为两个师。一九三七年扩编为三个师。

抗联第四军最初的根据地为方正县与依兰县的山林地区，大小罗勒密一带。一九三七年以后移转至富锦、宝清、桦川交界地区。游击区为牡丹江——佳木斯铁路两侧及北老爷岭东西地区，宝清、富锦、密山一带十余县。

抗日联军第五军。这个军是在救国军辽吉边区部队、绥宁地区部队以及吉东游击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宁安县委、吉东县委、吉东局、吉东特委、东满特委以统战方式在整个救国军中积极活动，在该军前方司令部和一些部队里建起党的组织。经过宣传部，在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并动员革命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该军，有的当战士，有的做其他各种工作。当时的方针是：一方面直接促使救国军“左倾”革命化，坚持抗日；另一方面造成有利条件，以便东满延边各县游击队以及吉东地区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易于成长壮大。在三年多的过程中，这一方针基本实现了。但也有失败的经验教训。例如，一九三三年秋李光“别动队”受袭击，一九三四年夏末“工农义勇队”被奸细拉走，救国军总司令部上层统一战线不能不破裂。但是，从全局看，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是成功的。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和第四军的建立，都是有救国军的工作渊源。第五军的多数部队还是由救国军部队彻底改造过来的。

一九三三年冬，党估计到救国军内部的分化，上层统一战线存在的破裂危机。在宁安东部（平日坡），以辽宁边区部队“工农义勇队”、“宁安游击队”为基础与救国军总司

令部相平行的建立起"吉东抗日同盟军"，并设军事委员会。党的同志完全掌握了领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同盟军军事委员会联合了宁安、敦化、额穆、舒兰、苇河、牡丹江等地的救国军和自卫军残部以及大量的"反日山林队"，开展了不断的游击战斗，锻炼了人民革命武装。一九三四年秋，为接受失败的教训，把辽吉边区部队和"工农义勇队"失败后所有的干部都加强到宁安游击队，并把它扩编为"吉东游击大队"。一九三五年二月在宁安三道河子区域宣布建立抗日联军第五军。初编两个师，第一师三个团，第二师三个团。军直属一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抗联五军南面与抗联二军联络，北面与抗联其他军队呼应，在不断胜利地打击日伪军中充实壮大。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伪满驻牡丹江森林警察大队七百余人举行暴动，参加抗联五军，接着在林口地区也有伪军起义来投。于是扩编为第三师，军属教导团，警卫营。

该军最初的基本根据地在宁安、额穆、镜泊湖沿岸以及牡丹江西岸老爷岭和东岸老松岭山区。一九三五年夏移转至北部牡丹江西岸和刁翎地区。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延伸到勃利县东部，富锦、宝清南部，完达山脉两侧山区。基本游击区是：西南起敦化、额穆，沿牡丹江两岸，北达依兰，再从方正松花江右岸直达桦川、富锦、宝清，中间有图佳铁路、中东铁路、林虎铁路、穆棱铁路。一九三八年曾伸张到哈尔滨东南及中东铁路两侧和拉图铁路以东，共二十余县地区。五军一师于一九三六年曾跨过松花江，一度进出东兴、庆城、铁骊地区。

抗日联军第六军。“九一八”事变前，中共地下党汤原县委，就曾经在汤原的西北和西南农村中，组织过地下武装和徒手的农民义勇队。事变后根据省委的指示，组织反日会和人民武装——汤原游击队。一九三二年夏，省委巡视员到汤原后，县委即积极着手新的武装组织。是年十月十日组织起人数不多的一支武装——汤原游击队。但是因为领导干部缺乏经验和许多“反日山林队”抱着反共的态度，这支初生的队伍被山林队“荣好”缴械了。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秋收运动、募捐购械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开展了汤原、萝北、通河地区的游击活动，队伍获得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党的干部缺乏阶级警惕性，被容留的土匪“老来好”暗中在队伍中拉拢落后分子，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队内发生叛变。“老来好”等杀了党的干部把队伍拉走，致使汤原县委检讨两次建军失败的经验，后派出党团员七十多人做骨干，并以县委主要领导人为指挥员，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初，这个部队以汤原为基地跨越松花江两岸，扩大游击战争，不断获得胜利。队伍人数和夺自敌人手中的武器大大增加，同时得到第三军的支援，于一九三五年底在汤原建立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下属六个团。一九三六年队伍发展到八个团，一个青年教导队，遂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下属四个师，每师两个团。

抗联第六军在松花江左岸、黑龙江右岸、小兴安岭和其以西配合第三军行动；在松花江右岸配合联军其他部队行动。最初的根据地为汤原县西北和西南六个县区。在松花江

南岸为依兰、桦川的双鸭山和太平川一带。

抗日联军第七军。中共饶河县委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在该县朝鲜族农民中及少数汉族农民中，建立地下武装组织形式——“农民反日自卫队”，但不久即被当地旧东北军的“自卫军”和“救国军”所破坏。一九三二年秋组织了六十余人的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饶河反日游击队”。该队公开活动，对乌苏里江左岸饶河、虎林等地抗日活动有较好的影响。但一九三三年一月受到该地区救国自卫军陈东山、高玉山部队的压迫，饶河县委指示该队，在保持一致抗日和共产党组织独立的条件下，接受救国自卫军军事的统一指挥，因而被收编为一个“独立营”。但是，“饶河反日游击队”因战斗力强，组织纪律好，在群众中有深刻印象，事实上保持了军事上的独立游击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东山、高玉山军瓦解后，它成了乌苏里江岸唯一的一支中坚队伍，人数迅速增加。一九三五年一月吉东特委指示，将该部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第四团。不久该团扩展发展编成一个师（两个团一个营）。一九三六年正式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编制三个师（每师三个团）和一个独立团。最初的根据地为饶河县的小佳河、八响地、大莱子沟及同江县的大旗杆。游击活动北达同江、抚远，西到宝清、富锦，南至虎林、密山。

抗日联军第八军。一九三四年初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编成二万左右人的“民众军”。在一个月内对日寇展开了广泛的游击作战，寇军曾遭到惨重的打击和损失。但是，该军的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指挥为地主阶级分子所掌握。最初农民自发地、主动地到处打击日寇，扩大活动地区，以后地

主阶级领导分子，在军事上转为消极的防守行动；同时领导成员间在战斗紧迫的环境中，侵吞农民暴动"果实"，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暗中勾结日寇特务。党在"民众军"中，缺乏领导干部，只有个别党员参加该军做局部工作。这样，"民众军"经过三个月的作战，在日寇不断增强军事压迫和使用政治分化收买之下，趋于瓦解状态。一九三四年秋只剩下六、七百人，由谢文东① 率领东走，企图渡过乌苏里江逃往苏联。在饶河县委与饶河游击队积极支援之下，稳定了该军的士气，劝阻了该军领导人逃亡的意图。年末该部返回依兰、勃利、桦川，得到我反日联合军第三军及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的协助，并得到联军各部队的支援，在方正、延寿及北牡丹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吉东和北满党加强对该军政治和军事领导，在军队中建立政治领导工作系统，该军人枪大增，逐渐恢复壮大，编为三个师。一九三六年底，正式宣布建立抗日联军第八军。一九三七年八月增编第四师。

抗日联军第九军。吉林自卫军李杜等部于一九三三年初崩溃后，在宝清地区留有一个团。团长李华堂② 坚持抗日。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间，在松花江下游左岸地区得到我抗

---

① 谢文东一九三九年四月在牡丹江北刁翎为警卫营长姜××胁迫投降伪满洲国，后积极"反共"。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谢在依兰、牡丹江市之间为国民党反动派地下军首领，有千余武装。一九四六年春被我军消灭。

②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进攻方正县陈家亮子，李华堂负伤，送西风沟里密营养伤，为日寇俘去后投降。一九四五年末，在依兰、方正间为国民党反动派地下军"司令"。一九四六年被我军消灭。

联三军及五军的支持活动，党在该部队中加强领导，建立政治制度。一九三六年末，该部人数发展到四个团，编为两个师，并正式宣布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日联军第十军。一九三三年，在拉滨铁路沿线的冯占海、李海青①、宫长海等的吉林自卫军和其他救国义勇军等崩溃瓦解后，在该地区残留着上万的“反日山林队”。报山头“双龙”（汪雅臣）②，就是该地区最大反日山林队之一，人数近二千。一九三四年珠河中心县委曾派党员干部去进行统战工作。政治影响虽好，但组织效果不多。最主要的是缺乏更多的干部人员派到那里去。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该部人数减到千人左右。一九三六年末，吉东党和军的领导继续派干部去联络帮助，稍稍获得发展。同年十一月宣布取消山头，正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重新开展了拉滨地区的游击战斗。一九三八年配合第四、五军西征部队，活动到哈尔滨附近的阿城、榆树、双城等地。

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在土龙山农民暴动直接影响下，桦川县、双鸭山煤矿三百余名矿工，在祁致中同志③倡导和率领下，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举行起义，组织“反日山林队”，推祁致中为首领，报山头“明山”。桦川、富锦、勃利的一

① 周保中同志此处记忆有误。李海青没有参加吉林自卫军，他独树一帜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和李杜等吉林自卫军没有联系。

② 汪雅臣非党人士，接受党的领导，坚持抗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在舒兰县冲河山区英勇战死。日贼对汪烈士深为衔恨，将其首级割去。东北光复后在哈尔滨重新安葬。

③ 祁致中同志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在黑龙江右岸萝北地区游击战斗中牺牲。

些农民踊跃参加，很快就达五百余人。一开始这一支队伍是拥护“民众军”的，其成分多数是工人、农民，领袖是矿工。因此政治思想没有受束缚，游击行动非常积极。活动范围，西达方正、延寿，东到富锦、宝清，南到密山。“民众军”崩溃时，这个队伍正在发展。一九三四年秋，中共密山县委、勃利区委都派了干部到该部中进行统战工作，开始接受党的政治影响。一九三五年冬季之后，经常配合联军第三军和第五军行动，并得到支持。吉东党的工作深入到下层战士，部队在游击战斗中，不断进行改造作风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人数扩大到千人左右。一九三六年春在勃利宣布取消“明山”山头，改编为抗日联军独立师。同年夏队伍扩大。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富锦成立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编为四个团，一个独立营。

“九一八”事变初期，以东满延边为中心，在东北各地少数民族——朝鲜居民中组成“反日会”，不久，改组为“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团结着广大的朝鲜爱国志士，以联盟形式同中国人民团结合作，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抗联第二军同时也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在“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民族革命群众活动的基础上，创建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他各军领导干部成员和战士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会员参加。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中朝人民为共同事业，把鲜血凝结在一起。除上述抗联十一个军以外，参加联军的队伍，还有救国军残余姚振山司令（救国军起义首领之一）所部编成游击军，约六百余人。其中包括孔夫人、闵宪仁营长，他们从来是同情共

产党的。在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副总司令孔宪荣及代理总司令吴义成先后向关里逃亡以后，他们团结在一起，立志不投降，不逃亡。在宁安以东，穆棱以南，东宁以西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接受吉东党的领导。一九三七年参加抗联第二路军。一九四一年春，孔夫人及姚、闵与日寇作战阵亡，所部大部战死。第二部分是迷信组织的“救国军”（山西五台山系）王荫武部队六百余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依兰、方正、延寿地区的农民组成的。一九三六年参加联军，接受党的政治军事的领导。一九三九年该部因作战人员锐减，十月间王荫武失踪，所部多战死，少数逃散和投降日寇。

在辽东和安奉铁路地区，有王凤阁的救国军千余人。一九三五年以后参加联军。一九三九年该部因战斗缩减，人数降至四百余人。一九四〇年完全战死。在辽宁旧东边道地区有反日山林队——“老双胜”（祁永全），一九三六年以后，正式参加抗联，人数多时曾达三千之众，一九三八年降至数百人，一九四〇年冬，“老双胜”部队除战死者外，瓦解星散。独“老双胜”一人坚持到最后，在桦甸、敦化交界的新开岭上的大森林中一棵青松下冻饿而死。

在辽吉边区的救国军残部李洪滨（万顺）旅长，于一九三八年（吴义成逃关里后）约千余人参加抗联接受统一指挥。一九四一年以后，李洪滨负重伤离队，所部除战死以外，所剩不多，自行瓦解星散。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成经过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三年，由赤色游击队到反日游击队；第

二，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初，由反日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第三，一九三五年初到一九三六年底，统一了军队建制，编为抗日联军十一个军。由第一军到第七军，从创建开始，就在党组织领导下，并得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的支持，受到广大群众和“抗日救国会”的拥护。各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关，亲密团结。部队有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和士兵的群众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这七个军是抗联的基本力量。第一、二、三、五各军战斗力最强，富有活动力，政治素养较高，内部团结巩固，纪律严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又属第一、二、五等军。抗联各军的武器装备绝大多数是夺自寇军手中的新式武器：三八式步枪、四四式马枪、轻机、阻击炮、步兵炮、重机、迫击炮等。抗联各军在军制上，基本实行“三三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不设营）有五个连到七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分三组，班有十至十二人。但有个别军只编两个师，或编四个师到五个师。三军在一九三六年曾一度编到九个师，但很不巩固，一九三七年底定为四个师。

一九三七年抗日游击战争最高潮的时期，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人数发展到五、六万人。此外在统一战线关怀下，固定地接受统一领导指挥的约五千人，不固定的约万人左右。人民喜悦联军的壮大，当时在辽、吉、黑各省民间广泛地歌唱着：

十大联军十万人，

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
铁骑纵横扫妖氛。
但愿民族获解放，
白山黑水庆升平。

一九三五年秋，党中央指示撤销旧满洲省委，建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并将联军编为三个“路军”。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金川县河里地方，召开东、南满党和第一、二两军高干会议。决定：东南满合组为“东南满省委”。第一、二军编为第一路军。魏拯民同志担任东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同志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担任副总指挥。在通化地区、吉海铁路及安奉铁路的救国军、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很多参加了第一路军。游击地区西起辽沈，南达安东（今丹东市）及鸭绿江右岸，东到牡丹江至宁安以南。中间横贯图佳铁路，南段到京图铁路，东段到奉吉铁路北段约三十余县。

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依兰县的四道河子，吉东省委会上决定：以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编成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姚振山、王荫武部队参加二路军，此外还有一些反日山林队和救国军残余不固定地接受二路军领导。周保中同志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二路军的游击地区包括中东铁路的哈绥线两侧，拉滨铁路以东各县，沿牡丹江整个流域及方正县以东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约二十余县。

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初，北满党组织和三军党委在汤原汤旺河建立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抗联三、六两军及松花江左岸的抗联其他部队。因内部思想混乱，组织纠纷，迟迟没有执行中央指示，建立“路军”。延至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会才发通告，正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以张寿篯（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许亨植同志任参谋长。当时政治委员未确定。第三路军下辖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游击活动区域沿松花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以东、黑龙江右岸，远至黑龙江平原，跨过中东铁路的哈满线到达嫩江下游三肇地区，共三十余县。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情绪更加振奋，“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发展了，许多游击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抗联的士气更加昂扬，如火如荼的游击战斗，燃遍了东北大部地区。尤其是在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下江地区的伪“三江省”。广大农村布满了抗联的“铁骑”，纵横不断地进攻和袭击寇军，使它遭到无休止的打击与损失；伪满军普遍动摇，成连、成营、成团的举行暴动投向抗联；有的消极、观望，不肯与抗联作战；有的被日寇暗中包围监视，不许他们和抗联接触。日寇认为这是必须“根除”的心腹大患，于是增加寇军关东军达五十余万之众，厉行法西斯恐怖统治，首先消灭抗联的基础，即支持抗联的人民。

七、斗争尖锐化

以旧军队抗日为主体的初期，因上层领导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没有持久抗战的决心，因而战略上是盲目的，作战方法是陈旧的与消极防守的。日寇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从部分寇军为基干，走狗伪满军为前驱，几乎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损失很少，收获很大。以至在旧军队崩溃以后，曾使人民群众抗日热潮受到打击，一时出现“谁做皇上给谁纳贡”的沮丧情绪。但是很快地代替旧军队而起的是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日同盟军、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这是新型武装——东北人民子弟兵，有高度的政治素养，有广泛的群众依靠。兵员的构成是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战士，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骨干。部队是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成立，在人民抗日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它具有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愿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思想基础。部队组织和军事生活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榜样的。满洲党组织和抗联领导干部，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必须在东北坚持进行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且这一斗争是同全国全局相连系的。因此认识到在游击战略上是持久的，必须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巩固自己，为争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在作战方法上，必须有高度机动性、灵活性，避强攻弱，避实乘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而自己则要尽可能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同时在游击作战过程中，利用东北农村人口分布

及自然条件的特点，在靠近山区的地带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并不断地扩大新的游击区，使游击部队获得更多的有利军事行动条件，人员物资补充有经常来源，作战后能获得休整训练场所。

日寇碰到的是这样新型的革命的人民武装，所采取的军事对策，也就不同于以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日寇开始在我根据地周围的基本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并初步实行消灭山边地区农民散户，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以图摧毁我游击部队与人民的联系。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深仇大恨，配合着游击部队行动，有组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敌人开展了争夺游击区域的斗争。南北满的游击地区不仅没收缩，反而扩大。在军事上，抗联部队更加机动灵活，主动的采取伏击、袭击和突然地进攻，使寇军兵力损失增大，军事设施不断遭到破坏。抗联部队从敌人手中夺取的精良武器装备不断增加，人员大量获得补充，部队不断扩大。游击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接之而来的就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游击战争高涨形势。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区卷入了游击战争的浪潮。但是，敌强我弱，敌人处于军事上、经济上绝对优势的地位依然持续，更因为日寇侵略我全国计划势在必行，因此对于巩固基地“满洲国”，以解除“心腹之患”的企图也就更加迫切，对我抗联的围剿就更加残酷。一九三六年开始，在南满和吉东地区，日寇厉行法西斯统治。

第一、加紧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保甲制、连坐法。把游击区的农民散户，一律迁移到便于日寇控制、监视

的铁路、公路沿线指定地点，构筑集团部落。在部落周围，挖深沟、筑高垒、设自卫团、派日寇特务直接控制。各部落之间，互相呼应联络，以防抗联之袭击，也便于监视群众的行动。在交通沿线及据点附近，禁种高秆农作物。农民的春种秋收，渔牧采伐，行商走贩，婚丧庆吊，亲友往来，甚至饮食起居，无一不在日寇特务监视之下。靠近游击区的城镇管制办法，也和集团部落相同。此外用抓丁、抓兵、抓“勤劳奉仕”的办法，控制青年于日寇掌握之中。凡集团部落以外的游击地区，一律焚烧。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散居着的农民田园庐舍化为灰烬，变为无人区。当时农民为日寇这种残酷的暴行编有两首小唱。

第一首：

“九一八”事变，
民国二十年，
锦绣的东北日本来侵占，
小家底眼看就要完。
门牌钉的紧，
户口勤调查，
十家连坐安上警察，
保甲费全得一齐纳。
满洲狗官们，
丧心病狂了，
鬼子杀人他们当向导，
遍地狼烟大火烧。

见人就屠杀，
无故被活埋，
市镇乡村遍地成了灾，
强奸妇女谁能忍耐！
年景大荒乱，
人们过年，
吃穿不够还纳大租钱，
活倒霉捐税又增添。
坚壁又清野，
强迫归大屯，
扔下家业全部进阴城，
城关上下鬼把门。
实行挑兵制，
抓走青年人，
全家老少落进囚牢中，
眼睁睁无处逃生。
……

第二首：

说起归屯泪淋淋，
东北民众们，
痛恨日寇来归屯，
归屯最难忍。
先归吉林省，

后归奉天境，
归成大屯，
屠杀我们中国人！
吉林归了屯，
全家归日本，
日本人按上衙门，
出入看得紧。
出门得挂号，
回来报原因，
要有一时错误，
全家性命难保存。
同胞弟兄们，
万众一条心，
联合反日的人，
准备打日本。
收回东北地，
才有合家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才有中国人。

第二、厉行经济封锁，制定“经济犯条例”。抗联所需的粮食、服装、医药以及经费等等，凡来自民间募捐者或代为购办者，日寇一律加以禁绝。集团部落收秋时，经过特务清查地亩，做到颗粒归屯入仓，防止农民暗中留粮食给抗联游击部队。一切生活必需品施行“配给制”，特别是布匹、

棉花，各有限额，若多购一尺、半斤，即做违法论。凡以粮食物资供给抗联或代采购者，一律枪杀，甚至牵累亲人，连坐邻里。

第三、加强政治措施，严厉惩治“政治犯”。在城市，特别在农村，大力摧毁共产党和抗日救国会地下组织。经常进行定期的或临时的大检查，拘捕“共匪”或“抗日匪”以及嫌疑分子，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强迫供认。凡被认为是革命的骨干分子就被公开屠杀或暗害，嫌疑分子被集中强迫劳动。在城市强迫各阶层上层分子参加“协和会”、“协和青年团”、“国防妇人会”等等，培养一部分走狗来钳制大多数。在农村利用少数地主、富农分子，给予特权引诱，迫使他们成为统治农村、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的支柱。以城乡的忠实走狗为骨干组成“宣抚班”、“工作班”，在宪兵和特务指挥下，跟随日寇“讨伐队”行动，专做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日部队工作，收买叛徒、逃兵等变节分子，以及派遣特务混入抗联内部，进行刺杀重要干部、策动叛降等等。从外部和内部动摇联军士气，瓦解联军。

第四、管制思想，推行奴化教育。凡是对日寇侵占、残酷压榨、侮辱、毁损等稍存异议，情绪表示稍有不满者，或对反对抗联的各种措施执行不力者，一律视为“反满抗日”、“思想犯”，其罪与政治犯、经济犯等同。重者处死刑，或被秘密押往杀人工厂抽血致死；轻者关监坐牢，或流放远方。伴之而来的是奴化教育，伪造历史渊源，篡改地理沿革，使汉文变体，汉语成为“协和语”。风俗习惯强制效法日本，使长者“三缄其口”，青少年忘却祖宗。在社会上武

断宣扬“日满一体”，倡导“天皇至上”，说日本武士道的使命是要“黄种人自强”、“日满协和”、“满洲王道乐土”、“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满提携”等等。甚至欺骗世人，诡称日本是帮助满洲国走“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宣扬“日本皇军”的使命是反对“中国赤祸”，反对“苏联赤化”等等。

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日寇“中国通”从蒋介石反动派“剿共”那里学来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釜底抽薪”手法，加上日本法西斯自己的精心炮制，用来对付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毒辣手段，企图使抗日联军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赞助，孤军作战。

日寇不仅使用法西斯统治手段，还不断增加关东军兵力。在军事行动上也大有改变，在重要的地区，集中重兵，把伪满军控制在后面，以便于监视和使用，而以日寇充当第一线；同时分地区包围封锁，依靠集团部落坚壁清野、稳扎稳打，长时期的对我军搜索进攻。在一地区内不断来回拉网，甚至采取“篦梳式”、“踩踏式”步步前进，肃清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向其他区域进攻。

日寇虽然采取异乎寻常的法西斯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一切恶毒手段，来进攻抗联，但是他们的所谓“满洲国治安肃正”、侵华“后方基地巩固”这一目的仍然没有达到。全国抗战初期，抗日游击区域虽然开始不稳定，后方根据地屡屡受到破坏，但是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加紧打击与牵制敌人，南满我军迫近沈辽地区，扰乱安奉铁路沿线，进出鸭绿江岸；东满部队活动于吉辽边区，不断袭击京

图铁路沿线敌人据点、吉东及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右岸。各军展开积极活动，不断打击敌人，挫败敌人的围攻，致使伪满军成营成团的大批哗变、起义，投向我抗日联军。一九三八年间，吉东部队冲破敌人大包围，突入敌后，回到老游击区，开展靠近哈尔滨、吉林间的胜利活动。松花江北岸部队主力，越过小兴安岭，进入黑龙江平原，开辟了二十余县的新游击区。一九三九年攻克克山、北兴镇、讷河、德都。一九四〇年活动伸张到嫩江下游，突入三肇地区，攻占肇州、肇源，震动了长春、哈尔滨，引起了伪哈尔滨航空学校学生三百余人哗变出走。

这一尖锐斗争，自一九三七年起持续到一九四〇年底，虽然使敌寇受到严重的挫折，侵华与反苏基地遭受巨大牵制与破坏，但我联军各级干部、战士也不断蒙受牺牲损失，广大民众受到空前的摧残、压制。由于联军同人民群众的隔绝，游击作战的困难越来越多。

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以后，日寇为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增加到七十余万。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我联军虽在游击战争方面仍有新的发展，但东北游击战争处境已十分险恶，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急剧趋于低落，接着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时，日寇增兵满洲数达百万左右。这样大的兵力，在日寇进攻苏联处于待机期间，便把它使用来对付抗联，迫使我军陷入窘境，造成抗联后一时期的挫败。

八、坚持苦斗，东北光复

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整个形势，实际上已趋向于急转直下，处于不断遭受挫败的形势（黑龙江省游击部队暂时例外）。我联军游击部队，逐渐丧失机动灵活的战术活动，每每不得不在被迫情况下作战。战斗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裂肤的苦境。即使是胜利的战斗，给敌人以惨重的打击，但我方损失仍极严重，得不偿失，人员减少，得不到补充。武器虽多，但大部分埋藏或毁坏。在这样情况下，根据地完全丧失，游击区受到破坏，问题严重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地步了。

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以“吉林省委”、“北满省委”集会讨论，估计到满洲新的情况，提出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方针，重新配置力量，制定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开始积极着手，将第一路军各军缩编为一、四、七三个支队。第二路军各军缩编为二、五、八三个支队。第三路军各军缩编三、六、九、十二四个支队。部队经过初步调整之后，人员虽然锐减，但政治情绪稳固，思想坚定，组织和纪律更加严明。在游击活动上以保存实力为主，采取高度的运动，远距离的“游走”，以避免敌人的围攻和追逐，特别是在敌人最容易活动的冰雪季节，避免与敌人接触。此外在条件有利，不易为敌人侦察发觉的林区，各部队派出相当人

员，散种农作物，自己准备必需的粮食贮藏。只有在明了敌情，情况十分有利的条件下（春夏之交及夏季易于隐蔽），才能迅速集中兵力，对敌人的孤立据点，或远距离脱离据点的敌人，给以意外的歼灭性打击。打了就走，使敌人不易跟踪反击。

对党和群众工作，首先对被敌人摧毁的老游击区的党团组织以及抗日救国会的组织，进行严格的整顿，完全采取地下深藏的方式，并且不得与游击部队发生联系。

一九四〇年的一年，抗联就这样紧张地机敏地进行了东北各地区的游击战争。但是仍然不能避免继续遭到严重的损失。黑龙江省平原游击活动在这时期曾有开展，但到一九四一年急剧趋于恶化，仗打的越多，敌人的损失虽然不少，但我方的困难有加无已，因死伤减员得不到新的补充，部队日趋缩小。

一九四一年初，中共东北各省委再度集会商讨，正确估计全国抗战所处的形势、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影响及发展的前途与东北抗日斗争的远景；同时克服了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所发生的取消主义，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革命旗帜，坚信最后胜利的远景，坚决贯彻保存实力保存干部的方针。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坚决实行合并东北三个省委为一个“东北党委会”，合并现有抗联各军为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部队。把这个部队的主力两千多人，完全控制于黑龙江下游深山密林与日寇完全隔离的地带，专门进行党的思想、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教育训练，认定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新时期、新变化到来时新的斗争种子，非必要时绝不

滥用一人。另外分编了十五个小部队①，每一小部队由十五到二十人组成。分遣于北满地区者四，吉东和延边者八，吉辽边区者三。这些小部队的基本任务是：（1）侦察敌伪统治状况（以军事设施为主）；（2）准备局势新变化时期，大规模游击部队的临时依据场所；（3）秘密联系群众，进行地下党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作；（4）可能条件下在群众中组织地下武装。这些小部队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经过挑选的中级干部。这些小部队的活动是和主力分离开的，由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直接领导。

一九四二年八月，主力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训练教育，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整整三年。部队干部和战士有系统地学习了党的革命历史和重要文献。依据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对照东北实际斗争情况进行了“整风”。在干部教育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与战术著作。这一时期部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士，在政治思想修养方面，及革命文化水平方面都有所提高，身体有了很好的恢复，特别在现代化军事战术、技术、技能方面有较好的锻炼和收获。从过去因战斗负伤和患病人员中，选拔出人员补充部队。这支部队在数量上同一九三七年高潮时期，是不可比拟的，但在质量上焕然一新，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指挥能力、作战能力和工作能力增强百倍。

---

① 小部队不止十五个，周保中同志这里所指的是经他负责由抗联野营部队中派出活动的那部分小部队，其余部队未有涉及。

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这一时期东北的游击运动，虽然消沉，但并不是象日寇所宣布的什么“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一九四二年伪北安省区、伪吉林省区仍有我小部队突然出现袭击日寇据点，以及伪三江省区，密山、宝清、佳木斯间的交通运输被我小部队截击。驻兴河镇的伪军一个连起义投向我二路军二支队。一九四三年十月末，哈绥铁路线乜河站南沟日寇据点被我小部队袭击，二十余日寇被歼灭。该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伏击追兵又消灭日寇百余人。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吉辽地区、伪通化省区，我小部队也有个别袭击活动。甚至在奉吉铁路线和拉滨铁路线，以抗联名义突然出现的自发游击斗争时有所闻。在日寇心脏区伪满新京及沈阳、阜新、抚顺、本溪等地，受我党地下活动影响，怠工、罢工，集中营里集体反抗、逃亡等等抗日的政治性事件仍不断发生。

燎原的烈火，虽然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期间，被日寇暂时遏阻，但是更大的燃烧正在新的酝酿着，最后焚毁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者，恢复东北锦绣江山，解放东北人民的信心和斗志是坚定不移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末，当我们从无线电收听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及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摘要时，东北党和抗联领导同志，就预想到未来的新任务。接着就是五月九日苏联攻克柏林，结束了反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战争。东北党委会和抗联指挥部欢欣鼓舞，认真研究了新形势，动员主力部队和分散活动的各小

部队全体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在一致行动计划下，加紧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全线攻入我国东北。中日矛盾交错复杂的纽结被苏联红军万钧重锤打开了。东北抗日联军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与来自华北的八路军东进部队汇合，踊跃地协助苏蒙军作战，消灭了盘踞东北十四年之久的日寇百万关东军，捣毁了傀儡满洲国，解放了东北人民，使长白山重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黑龙江扬起了响彻云天的巨浪。中共中央象“九一八”事变当时一样关心东北，为了保证光复后的东北领土和获得解放的东北人民，不重蹈历史覆辙，不被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出卖，在全国抗战胜利之后，领导东北人民高举民主旗帜，谱写了东北人民自卫斗争的新诗篇。

战斗在白山黑水

敦化——额穆地区连续攻击作战

一九三五年十月，东满延边、吉东、牡丹江和宁安地区的日寇进行冬季“大讨伐”。我抗联第二军、第五军部队分散活动。二军突破汪清、延吉敌人的包围，五军突破宁安敌人的包围。二军四师与五军一师，在镜泊湖左岸汇合，接着在敦化、额穆两县地区开展活动。这一地区敌人的兵力配置和防守都相当薄弱。

十一月下旬，我二军四师第十团向敦化县以东地区佯动，袭击沙河防所、大石桥车站，并越过京图铁路向大荒沟前进。我二军主力十一、十二两团及五军一师一、二、三团集中兵力统一行动，由李荆璞、陈翰章等同志任指挥，准备袭取官地，打击通沟岗子的寇军。十二月七日四时，我二军十一团，五军一、二两团约九百余名兵力，由二道沟方面秘密运动，绕过官地赶到通沟岗子以北，潜伏在大沙河沿岸柳丛中。午前六时，我二军十团、五军三团逼至敌官地街东口和北口防所，我攻击部队用集束手榴弹猛炸防所，并施以火力打击。两个防所的自卫团除被打死者以外，都向我军交枪

投降。在小街中心，日寇教官三人率伪军中队据守抵抗。激战不久，西防所亦为我军攻破，伪警察队一个排也缴枪投降，其余敌人在中队部顽抗。激战一小时，日寇教官被打死，敌人停止抵抗，我军完全占领官地街。此次战斗打死日寇三人，伪警察队及自卫团二十二人，伤十五人，其余一百五十人全部被俘虏。我军占领中队部以后，即威逼伪警官用电话向通沟岗子的日寇说："'共产军'袭击官地被击退，仍有继续进攻的模样，请求火速增援。"通沟岗子驻有日寇小林部二百名，闻讯后，慌慌张张全部出动，午前七时向官地大道前进。敌人的部队刚要拉长行军的序列，就遭到我潜伏在通沟岗子东北面的伏兵猛烈的袭击，敌人一部就地抵抗，大部企图退回通沟岗子村边反击。但通沟岗子小街已为我二军九团完全占领，从南面集中火力袭击敌人。敌人陷入包围圈中。激战至午前九时三十分，战斗胜利结束，除漏网逃脱的寇兵十余人以外，全被我军歼灭。此役计缴获三八式步枪一百六十余支，杂色枪五十余支，重机一挺，迫击炮四门，轻机枪九挺。通沟岗子自卫团四十余人全部投诚。

我军在官地、通沟岗子连住三天，召开群众大会，打开敌人仓库，把粮食物资分给群众，并发动群众清除走狗，布置了地下抗日救国组织工作。

十二月十七日，敦化县寇军联队部派出一个大队约七百人，以伪警察大队三百人为前驱，经黑石屯向通沟岗子、官地进犯。同时延吉明月沟日寇已越过哈尔巴岭西向大石头、沙河沿、大桥铁路线增兵封锁，以防我军闯过铁道。但我军并无此打算。月底，寇军以三个中队约五百余人兵力及伪满

教导队、警察大队魏部（绰号蒙左）三百余人，防守官地及通沟岗子。另一个日寇中队约一百五十人及额穆伪警察大队的一中队一百余人，驻黑石屯镇。该警察大队约四百人驻守额穆索，组成敦化东北和西北的连络网，互相策应，但不敢远出。

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我二军二师第四团，四师第十一团，五军一师第二、三两团千余人的主力部队，在南湖头江西岸——马家屯附近秘密集结。二军四师第十二团，五军一师第一团约六百名兵力，于一月四日自二道梁子方面向官地以东沙河沿佯动，吸引官地、通沟岗子敌人。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将向铁道移动，拟在铁道线夹击我军。一月六日傍晚，我二、五两军主力四个团沿牡丹江西岸强行军。一月七日黎明前绕至距黑石屯西街口三里之土岗潜伏，按事先侦察清楚的敌情部署进攻。二军两个团担任攻击西南面，五军二团担任东北面。第三团为预备队，控制黑石屯东牡丹江岸，准备阻击官地和通沟岗子方面的援军。午前六时，敌西防所发现我军行动，向我首先射击，我军西南进攻部队即展开勇猛进攻。西防守所伪警察队不敢抵抗，当即交枪投降。我进攻部队直迫日寇防所，该敌利用房屋设置街垒，在屋内挖枪眼、堆沙包顽固抵抗。我进攻部队将敌人截为东西两段加以压缩，并占据屋顶及控制街口，用猛烈火力及手榴弹逐段扫荡前进。激战至午前十时，寇军一百五十名完全被我歼灭，伪警察大队及自卫团二百人除死伤二十余人外，全部投降。

当黑石屯镇被攻击时，我二、五军南进部队正展开对沙河沿、二道梁子各防所及大石头车站进行积极扰乱破坏活

动，攻克沙河沿小街。因此通沟岗子及官地的日寇不敢出援，仅仅派出伪警察队二百多人向黑石屯试探前进。但经我江岸部队迎头痛击，战斗半小时，敌人即狼狈逃归官地。

午前十一时，我军完全占领黑石屯镇。配置警戒，处理战利物资，召开群众大会，部队进行大休息。

一月八日午前十一时我军撤离黑石屯镇，估计官地、通沟岗子敌人不敢出动，乘额穆索（老县城）守备伪军动摇，决心攻打额穆索。一月九日午前五时，我二、五军主力前进至额穆索附近，首先沿河岸北面，将城西和城南包围。突击部队沿通往黑石屯镇、官地的大道向城东防所攻击前进。伪军关大队长率警察大队二百余人死守顽抗，但城西南面防所，已被我河岸攻击部队突破，迅速向街东敌大队部压缩，激战二小时，敌人支持不住，伪军关大队长率一个中队九十余人突围狼狈南逃。午前八时战斗结束，将额穆索完全占领。此役计打死日寇指导官一名，教官二名，宪兵六名，击毙击伤伪军官兵五十余人。俘虏伪警察大队人员二百七十名，伪警察四十名，自卫团六十名。夺获敌人的各种枪支三百八十余支，重机二挺，轻机五挺，解放了在监狱内关押的“人犯”百余名，没收了敌人遗留下的不少物资，除部队带走外，其余一概分发给地方群众。

午后三时据探报，敦化县敌人从秋梨沟及通沟岗子两路来援兵一千二百人左右，南路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至距县城十五、六里的老岗附近，此时我二、五军部队满载胜利果实向城东北塔拉站方向移转。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底，两个半月时

间，我二、五军联合部队，冲破敌人在东满延边及吉东宁安地区的“冬季讨伐”，进入敦化、额穆地区开展活动。除上述连续作战击毙寇军约四百名，伪军约百名，俘虏伪军约六百余人以外，其他与敌人接触战斗十余次，共击毙寇军二百五十名，伪军五十名，俘虏伪军自卫团二百余人，使敌有生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同时开展了这一地区广大群众中的抗日救国宣传和组织工作，鼓舞了人心，提高了我军士气，总结了战斗经验。部队接受了成百名优秀农民参军，扩大了抗日武装实力。

一月中旬，我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秘书长石光等同志到达镜泊湖北湖头五军军部，召开了东满党委临时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任务。王德泰、李学忠等同志西去敦化。我二军四师全部向东图铁路以南顺利转移。二军二师四团、五军一师全部继续在额穆东及镜泊湖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莲花泡防御战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根据吉东党委和五军军部的指示，我第一、二、三团全部逐渐向镜泊湖及宁安西南转移。一则为了执行新开展五常、舒兰地区的游击活动作准备，再则该师两个多月在敦化、额穆地区的积极活动之后，部队需要整训和休息。但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部队领导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于是造成了莲花泡防御战的惨重损失。

二月二十日前后，正值旧历春节，我五军一师各团从额

穆出发，进至距东京城三十余里的吊水楼西北地区。一师六团的干部和战士多半是这一地区的农民子弟。群众欢迎自己的好儿女，杀猪宰羊款待胜利归来之师。白天我们战士串亲戚访朋友，夜晚开军民联欢晚会，唱歌跳舞，尽情欢乐。虽然师部已搞到情报，东京城日寇有“出扰”的消息，但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工作员说：“来了就打，怕什么？”实际上是麻痹松懈，孕育着惨败的危机。

我部队以莲花泡北部石岗子为中心，指定第三团在东北方向的石滩布置警戒；第一团对沙兰站方向配置警戒；师部直属队和第二团驻莲花泡北面。总的估计东京城敌人不敢轻出，如来进犯，即利用莲花泡现地连绵不断的大石滩错综复杂的地形，就地消灭敌人。

二月二十七日夜间，驻东京城的日寇将防务所交给伪军步兵二十七团第一、二营。寇军七百余人及伪军二十七团第三营为主攻部队，夜间出动，向莲花泡秘密前进。另有伪军骑兵第三十三团，骑兵八百余人，自东京城、上马河一带出发，向吊水楼以北地区前进，准备截断我北湖头交通联络。后来寇军指挥改派伪军第二十七团三营转向花脸目方向警戒，防止我军向沙兰站转移。

二月二十八日拂晓五时，敌先头部队进至莲花泡东石港子屯。我第三团前方警戒部队即开展攻击。李荆璞师长命令第三团团长王汝起全部加入战斗。敌军攻势甚猛，激战二小时，我师部及第一团驻地亦受敌人围攻。此时李师长命令第一团就地抵抗，第二团全部自右侧反击。激战至下午二时，我第一、三团大半面被敌包围。我第二团反击屡遭挫折。战

斗陷入不利情况，敌人又开始炮击。阵地上顿时烟雾弥漫，战士们均感头昏脑涨，神经麻痹。敌人都戴上防毒面具，步步向我军逼进。我军估计敌人是使用了化学毒气，战斗不能持久，乃下令各团用火力猛烈反击，敌人迅速分路撤退。于是我军亦指派第二团第二、四连掩护，在下午四时许撤出战场。主力撤走后，掩护部队第二团第四连马连长带着十九名战士还深陷在敌人包围圈中，且都处于半昏迷状态。马连长命令战士停止射击，缩紧距离，隐蔽潜伏。寇军指挥村田中佐以为战斗结束，耀武扬威地指挥寇兵，搜索战场。马连长突然以手枪连击，将该中佐击毙。其余战士都发出他们最后一粒子弹射击敌人，给敌人以重创。终因寡不敌众，马连长及战士们壮烈牺牲。

这次作战，虽然寇军被击毙村田中佐以下官兵七十余人，伤二十余人，但我军阵亡亦有七十八名，负伤四十五名。损失步枪六十支，轻机三挺，消耗弹药甚多。这是游击作战上一个惨重的损失。战斗结束以后，地方抗日救国会代备棺木，埋葬了四十二具烈士尸体（实际上阵亡者不止此数）。日寇卑鄙丑恶，深恨我军猛烈抵抗，尤其他们认为战斗已胜利结束时，村田中佐以下十数名官兵最后被打死，因而大发兽性，破坏我战士尸体。

抗联同志们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牺牲的先烈，写了一首诗，悲壮地悼念他们：

江水映斜晖，黑山云雾飞，
镜泊湖上，涛光苍茫，

白昼起寒微。
山麓列青冢，湖畔碧野，
荒蒿蓬蓬，英雄去不回。
天涯芳草系忠魂，旌旗伟，
义气轻生死，英风永世垂。
壮志未酬啼遍野，
午夜惊闻雁泣西风悲。

二月二十八，追恨志无涯。
血溅青石，尸陈遍野，白骨沉黄沙。
慷慨奋捐生，同志四十又二名。
浩气贯长虹，壮烈长铭齐行，永震敌胆惊。
回首江山易，强奴肆纵横。
新仇旧恨何时了？
墟芜千里遍地起悲声。

敦化寒葱沟伏击战

一九三六年三月，抗联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在敦化马号附近与军长王德泰、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还有一、三、四各师干部，开过了东满省委会议，扩编二军为四个师，规划了游击活动任务：第三师暂留敦化、延吉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第一、四两师向安图、桦甸地区移动，作进攻安图县的准备。首先必须拔除控制敦化、安图、桦甸三县交界的大蒲柴河的敌人据点，但是必然引起敦化敌人的增援。于是决

定，先在敦化以南地区命第三师展开积极活动，引诱敦化敌人。并派小部队在大蒲柴河、腰岔子等地作攻击大蒲柴河的活动。把主力一、四两师约一千一百余人秘密控制在敦化玉皇庙、一棵松一带，准备相机打击敦化出援之敌。

二月七日敦化日寇五百余人，伪警察大队二百五十余人果然出动，当天晚上进至马号宿营。经我军探明：敌军将继续向大蒲柴河前进，准备在那里短期驻扎“搜剿”。

二月七日晚，我第一、四两师向寒葱沟移动，拂晓到达岭顶，在北山坡大道两旁，利用森林障蔽，依大树和深沟作掩体，各距离约三十至五十米，布置了伏兵。我第三师十团、十二团亦同时向寒葱沟口移动，准备封锁沟口。

二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寇军尖兵六、七十名，进至寒葱沟口附近搜索，并未发现我军踪迹。日寇在前，警察大队在后，陆续沿着曲折的山道上山，往寒葱沟岭顶前进。正午，敌军完全进入我伏兵线内，尖兵进至距山岭半里，我军土地雷忽然沿大道同时爆炸，伏兵一齐开枪，经十分钟的工夫，尖兵全部被打死炸死，狼藉满道。我三师十、十二两团，在山下封锁了沟口，并向伪军猛烈射击。激战约一小时，伪军二百余人除被打死十数人，其余全被缴械。并将敌兵运输弹药给养军需品的民伕队三百余人完全卡住。此时寇军主力四百余人，沿路卧倒，死力抵抗。我军组织交叉火力，猛烈射击敌人，并掩护冲锋队前进。激战至下午三时，我军第二次冲锋与顽抗之敌肉搏格斗。敌军死伤过半，残部向山下狂奔，又被我军三师部队截击一阵，敌人仅剩下一百七八十名，向马号方向逃窜。

下午四时，战斗胜利结束。共击毙寇军三百五十余人，伤五十余人，被俘七十名。伪军全部消灭。缴获长枪五百余支，轻机十六挺，步兵炮四门，狙击炮六门，无线电通讯机两部，其他弹药粮食甚多。我军姜指导员、张连长以下二十六名阵亡，伤十余人。

二月九日，我军进行整顿，仍留三师在敦化东南地区活动。军部直属队及一、四两师，十日晚十一时，自寒葱沟岭顶出发，分两路南走，准备乘胜夺取大蒲柴河。军直属队及四师部队主攻大蒲柴河，一师两个团经腰岔绕至大蒲柴河伪警察大队防所西方，沿富尔河设伏，以防敌人向西退逃。十日，拂晓五时，我军主攻部队直迫大蒲柴河东口，将防所攻下。另一部攻下小街西北敌人大部防所。伪大队长率两个中队，果然沿富尔河上游逃遁，为我一师伏兵截击，除伪大队长带亲随数人落荒逃脱以外，全部被俘缴械。此次战役，击毙伪军官兵八人，伤三人，共俘虏伪警察大队二百人，自卫团六十人。

我军拔除了敌人据点，一连住了五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地下工作，散发敌伪仓库存粮，清除走狗特务等等。

经过寒葱沟战役，寇军再不作加强大蒲柴河据点的打算，仅仅派了几名日本特务利用反动地主武装组织“自卫”。反动地主头子也耍两面手法，既敷衍寇军，也讨好抗联，使大蒲柴河在我辽吉边区形成“中间地带”，达两年之久。

猛攻抚松城

抚松县城住有寇军二百五十人，另有敌企业人员（带有武装）二十余人和伪警察大队约五百人。日伪军经常出扰，阻碍我第一军和第二军的联络。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我二军军部放弃了进攻安图的原定计划，将主力第一、四两师及军属警卫团由富尔河、汉阳沟渡过松花江，向万良河、清江甸子、大苇沙河一带移动，准备进攻抚松县城。进攻部队除二军主力一千五百余人以外，还有救国军司令吴义成、李洪滨部队约六百余人参加。五月十五日，我二军主力分两路沿头道江上溯。一路于十九日绕至抚松城南山，一鼓作气先将南山少数守军扫除，占领了南山高地，逐渐扩张占领了东山。救国军部队已从黄泥河子西进到达河叉沟附近。此时敌军将街外据点收缩，以西大街和南街口为抵抗核心，构筑工事，加强城围防御，作固守待援的准备。

我军以全歼敌人占领城市为目的，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南和城西。五月二十日，拂晓四时，我东南山阵地三门迫击炮同时开火，集中射击街西和街南敌防御阵地。敌人迫击炮亦自城内阵地向我回击。攻击部队同时迫近城围施行火力猛攻。激战至九时，我南面及东面攻击部队将敌城攻破，突入南街口及东街口。敌人退据县衙门和大队部以及西大街，顽强抵抗。敌人几次反击，均被我击退，我各突击队步步逼近守敌。下午一时战斗进行得越加激烈，敌人欺我迫击炮早已不响，诱我大量消耗子弹，一再举行局部反攻。魏拯民政委

留在南山指挥所，王德泰军长、李学忠政治部主任亲自率领预备队警卫团三百五十余人加入突击战斗，前进至市口中心，攻击县衙守敌，打死伪大队长后，转向西街寇军抵抗中心。此时我城东攻击部队亦绕至街北攻入北大街，敌守军伪警察大队被我缴械俘虏者三百八十名，其余全部被打死打伤。寇军受重创，缩至西街，继续顽抗。战斗到下午三时，西街的三个寇军据点全被我军攻破，寇军嚎啕惨叫不绝，所剩无几。下午五时，敌人停止抵抗，寇军官兵被我击毙者二百二十人，活着的三十余人及武装企业人员十四人被我俘虏。伪县长及日本指导官逃跑。监狱里各种“犯人”三百余人被我释放。

猛攻激战，当日胜利结束，除了消灭全部寇军外，还虏获轻重武器及其他胜利品甚多。

战斗至中午，虽然敌机四架轮番在抚松上空向城外我军扫射，但并无损伤。敌人期待濛江方面增援落空。

我军在突击战斗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同志、一师政治部主任周树东同志阵亡。团长负重伤者二人，轻伤者一人，营以下干部和战士阵亡者五十五人，重伤者十人。

此次战役，联军声威大振。寇军经过数日之后，才由濛江调警卫旅一个团，收拾残局，重新布防，但不敢远出骚扰了。

战役胜利，收获虽大，但对伪军抵抗程度估计不足，以至激战延长整日。我方伤亡重要干部和很多战士，这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待马沟——水平站袭击列车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我二、五军联合部队，从牡丹江市地下组织得到机密情报称：两日内日军将有特别货车一列，傍晚五时左右由牡丹江东站出发，开赴绥芬河国境。该列车由日伪兵混合队护车，兵力不详，但不会很多，估计晚七时该列车到十站（磨刀石站），中途稍停即继续东开。

当时我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二军二师副师长兼四团长侯国忠，在十站以南接获情报后，研究情报，估计敌人护车部队至多不到四百人，预想设伏兵袭击该列车。

我二军二师四团的一、二、四、六、七连及五军警卫营一、二连约四百五十人为主力，附轻机十二挺，狙击炮四门，还有反日山林队黑山部队一百名配合（该队特别熟悉地形）。

九月十一日晚，我军轻装急行军，由十站南沟向预期设伏目的地待马沟车站方向移动。在森林中，经一昼夜的隐蔽行军，于九月十二日上午四时到了距待马沟车站十里左右之南山休息待机，傍晚，张主任和侯副师长详细侦察了地形，并拟出初步计划之后，召集各连党员干部开会讨论，决定在待马沟东七里水平站附近设伏兵袭击夜间通过的列车。入夜，该部队进入水平站附近，进行编组。将二、五军的各连编为四个战斗队。黑山队员分散配属在四个队里为向导。水平站以西铁路两侧地形险要，构成一条深谷，铁道从西往东经过谷底。铁道北侧约一里长的石砬子，顶巅距路面虽然不

过六十米，但斜面颇为峭峻，为风化岩石，起伏蜿蜒，地形错杂，三个战斗队即埋伏在这一线上；另一战斗队以错角方向配置在铁道南侧为断绝地。预计将敌人列车颠覆在这里，伏兵准备以猛烈火力消灭抵抗的敌人。

一切伏兵都部署好了，并将铁道外侧线上的道钉转松了。果然十六日夜晚八时四十分，敌人火车从西向东急驶。火车到达破坏处，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前大半部脱轨颠覆,向路南断绝地倾倒。道北我伏兵一阵猛烈火力射击,我两个战斗队向未倾倒的列车前进。但已经判明,倾倒的前半部列车为日寇军，未倾倒的后半部列车为伪满军和军马车。于是我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专打日本兵”。伪军慑伏车中不敢动弹。日军仓皇应战，有的在车中，有的在铁道上死力抵抗，但终于被我火力压迫于断绝地深沟里。敌仍然拚命抵抗，部分发生肉搏战。激战到半夜十二时，日寇抵抗渐渐薄弱，我军估计牡丹江、乜河等处日寇敌兵可能增援，战斗持续过久，反而不利，于是南北两面的我军各突击队于黑暗中向残敌猛冲前进，用炽盛火力消灭陷于深沟中的寇兵，并将潜伏在火车厢中的伪军百余名如数俘获缴械。同时收缴被击毙的日寇武装弹药，举火焚烧了火车。我军于十七日夜一时撤离战斗，释放俘虏，携带着胜利品，向铁道南泉眼河方向迅速撤走。

此次战斗极为激烈，达五小时之久，敌人遭到沉重打击。除隐藏在深沟里的五十余人寇兵得以幸免，共击毙日寇一百九十余人，伤五十余人。焚烧满载军用建筑物资的火车一列，击毙军马一百六十匹。虏获步枪三百五十四支，手枪

八支，轻机十挺，狙击炮三门，步兵炮一门，子弹五万余粒。将不能带走的敌人遗弃的武器、装具、器材悉数焚毁。

肉搏战斗中，我二军四团七连连长(模范连长)张颜明、队员梁洪章、张发思等九人阵亡，负伤十二人，失踪一人。

这次战斗的特点：第一，估计正确。虽然牡丹江送出的情报没有说明列车上的兵力，但张主任、侯副师长根据条件和辅助情报推断，该列车不论日军或伪军至多不会超过四百人；第二，选择颠覆列车的地点和破坏铁道的方法非常恰当。水平站地形良好，适宜设伏，该地西距七河站、十站五十里到七十里，东距老穆棱站三、四十里，到小绥芬河国境线站不到百里，沿站驻有较大兵力的日寇守备队，平时防备较严，敌人“志骄意得”没有设想到我军敢于突然出现，设伏阻击；第三，在列车颠覆后、战斗接触时即用密集火力猛冲猛打，使敌人不能有效的反抗；第四，行动隐蔽、机敏，事先兵力运动，敌人毫无所知；第五，伏兵布置周到，战斗动作快捷勇猛，虽然在夜间作战，但是我方火力联络与行动衔接有条不紊，收到了预期的战斗效果，消除了由于对敌寇兵力和抵抗程度估计不足所产生的缺点。

大盘道伏击战斗

一九三七年一月驻后刁翎街的日寇步兵三百七十余人，准备向林口撤走，勒令居民出爬犁（雪橇）二百余张。消息经地方抗日救国会秘密通知我五军。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就直接收集情报综合研究，认为后刁翎日寇七百余名，约一半

多兵力在严寒的季节向林口移动，要是利用爬犁，行驶迅速，至多只要七、八十张就够用的了。现在日寇征发爬犁二百张以上，必定是输送军用物资，其行动不是轻捷，而是笨重。柴世荣同志决心指挥五军二师杨绍成同志的第五团全部及军部警卫营、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共八百余名兵力，于一月二十七日夜晚，自徐家屯附近秘密移动。二十八日午前四时到达大盘道山上。柴军长亲自部署：第五团及警卫营占领大道两旁柳条沟和山坡上的隐蔽阵地；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控制在大盘道北面蛤蟆塘山上。埋伏袭击的准备一切都停妥了。鹅毛大雪满天乱飞，冰雪覆盖着大地。我们的战士静悄悄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忍受着刺人肌肤的猛烈的朔风。从上午七时到正午，还不见敌人的踪影，各部队战士们出现难以忍耐的样子，有的同志埋怨说："白来挨冻，哪来的敌人。"柴军长传令："忍耐着，鱼儿一定来上钩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发现敌人，听从指挥，猛打猛冲。"

果然午后零时三十分从北方传来"吱吱嘎嘎"的声响，我们的战士立刻精神振作，全神贯注地瞅着远方的公路。不一会儿，敌人的尖兵五十人，坐着八、九张爬犁，弯弯曲曲地向盘道上前进。看样子，敌人冻得缩手缩脚的，顾不及警戒搜索了。尖兵过后，寇军大队一张爬犁接着一张爬犁地拥挤前进，都进入了我军的"口袋"。然而敌人什么也没有发觉。午后一时，大盘道西山上的指挥所突然发出信号枪声，指战员们紧张地投入了战斗。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价响。日寇被打得人仰马倒、爬犁翻倒。许多寇军还没有反应

过来，就已毙命了。有的在公路上狼狈奔窜，还有的顽固抵抗。战士们端着刺刀勇猛地冲上去，寒光闪闪的厮杀里，传来一阵阵鬼子兵的惨叫声。敌人被横冲直撞地扫荡着。我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的同志们象出穴的小老虎一样，猛打猛冲同敌人展开鏖战。

激战到下午四时，战斗胜利结束。日寇官兵三百六十余人全被歼灭。我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生俘日寇二十八人，夺获敌人全部轻重武器和皮大衣、军毛毯、钢盔、弹药、粮食辎重等不计其数。警卫营一个连、青年义勇军、妇女团和第三团、第五团的两个连用缴获日寇军的物资装备了自己。

当晚，我军清扫战场后，就在大盘道村宿营。群众欢天喜地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我军截获拉爬犁的马五百余匹。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反动地主的一律没收，其余农民的遣散回家。第二天黎明以前，我军向大顶子方向转移。

夜袭前刁翎屯

大盘道战斗胜利后，驻在刁翎的还有寇军二百余人和伪军二十六团一个营，另一个营分驻前刁翎，小心谨慎而又胆战心惊地龟缩在那里，不敢出扰。尤其是伪军心里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高兴我军狠揍了日本鬼子，消灭了那么多人，就象替他们出了气似的；另一方面恐怕我军进攻他们，小心防守。我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估计到了他们的心理，决心趁战胜余威，敌人处于动摇状态的时机，一举歼灭前刁翎的伪军。

二月一日傍晚五时，我三军第四团警卫营和青年义勇军全部，自徐家屯附近集结，强行军走了三十多里，到达前刁翎西山。分配第四团和第五团六、七两连攻打防所伪军。警卫营和青年义勇军布置在前刁翎北面到西小屯，准备阻击后刁翎出援之敌军。预计夜间十一时攻击开始，至多三小时必须解决战斗。

前刁翎伪军二十六团第一营四个连，分驻三处：营部和一连驻北面张家大院；第二、三连驻西防所；第四连驻东防所。伪军士兵虽然心情紧张，但惦记着快过春节了，欲向老百姓勒索。夜十一时三十分，我四团杜团长亲自率领突击队，从屯子北面沿大道隐蔽前进，得到在伪自卫团里做地下活动同志送出的“口令”，并指出伪营部及第一连确切驻地。突击队先头组直接向村里前进，敌人哨兵发觉问“口令”，我突击组随即答应“×××”，敌哨兵接着叫道：“站住！干什么的？”我突击组突然向前俘住两个哨兵，将哨兵不声不响地带到一边，得知情况后，急速进至营部大院前门，用事先准备好的梯子搭到墙上，跳入院内将大门打开，一拥而入，扑向院落四角的炮台。伪军来不及抵抗，均被我缴械。此时，我进攻部队完全包围了整个院子，向伪营长住所及兵舍猛烈打了几排枪，扔了几个手榴弹，同时高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枪不要命！”敌营长从梦中惊醒，指挥住所伪军从屋内往外打枪，妄图抵抗。但被我军集中火力，一阵猛烈打击，伪营长和几十名伪军被打死在炕上。门前窗下横躺满地。其余的伪军全向我举手投降。

此时，我团六、七两连，一枪不放，顺利地将东大院的

伪军全部缴械。西防所接连两个院套的两连伪军，在日寇教官督促与日本宪兵小队胁迫下拒守院套，死力抵抗。但前院套被我四、五两团混合部队攻破，俘虏了伪军第二连全体官兵。第一连抵抗已陷于松弛。我军冲入后院，利用俘虏作向导，对日寇宪兵队抵抗据点，加以猛烈火力打击，并投掷手榴弹，放火焚烧被利用作掩体的房屋。激战到二月三日午夜二时，西后院战斗结束。日寇教官五名，宪兵小队十六名，伪营长一人，连长二人，排长三人，士兵二十余人被我军打死。伪军四百四十名全部被俘虏缴械。此次战役我方仅五团六连指导员及战士六人负轻伤。

前刁翎的老百姓知道敌人已被完全消灭，男女老幼都集聚起来欢迎我军。我军打扫了战场，捆载了虏获的武器弹药、粮食、军需物资，向群众散发了传单，讲了话，把日寇和伪军向民间征集的春节“礼品”——“年份子”，即猪羊鸡鸭、白面大米都发还群众。同时给伪军俘虏作了宣传教育，将他们全部释放。

凌晨四时我军向乌斯浑河东岸转移。虽然大雪纷降，气温严寒，却掩不住战士们愉快欢乐的心情，战士们唱着胜利的凯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

刁翎后岗的日寇等到天明，才勉强凑集到一块。日寇一百多人在后，伪军三百多人在前，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来到前刁翎战地，“兔死狐悲”地收殓尸体。同时向老百姓大发淫威，追查“是谁通匪”。

依兰攻击战役——诱敌及打援

一九三七年三月，日寇在依兰、勃利地区的冬季“大讨伐”已接近尾声。寇军在这个地区的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已向牡丹江和佳木斯两地撤收。驻扎在依兰县城的日寇部分骑兵约七百人，伪军二十二团一个营约五百人，其余有警察队百余人。敌军经过四个月的长期“讨伐”之后，甚感疲惫松懈。据县城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送出来的情报称：伪满军对日寇所给予的待遇极感不满，关系龃龉，士气低落。同时在依兰县城与勃利县城中间地区的双河镇“讨伐”期间，驻有一个日寇步兵大队约七百人，一个骑兵联队之主力已向佳木斯撤收。而步兵大队是否常驻该镇尚在犹豫中。

我抗联二路军总部驻牡丹江西岸西风沟。经分析研究全盘情况，认为“敌分我合，敌退我进”是时候了。并且很快解冻开江，转入游击活动的好季节。于是决定集中牡丹江两岸联军联合行动，袭击依兰县城；同时诱双河镇寇军出援，以便于半途伏击将其消灭。

三月十日开始行动准备。十八日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到达马家大屯南沟。第一纵队、独立支队均隐蔽于指定的集合地点，开始封锁消息。十八日总指挥部下达作战任务，指示：第一纵队于十九日上午三时在苏格屯附近集结，下午三时向依兰东南团山子倭肯河东方面佯动，十九日夜间强行军，再从倭肯河东岸依兰南方急速隐蔽转移，预定在新卡伦——小河沿中间地区，利用复杂地形，埋设伏兵，伏击由双

河镇北进增援依兰的敌人，给与歼灭性的打击。

三月二十日白天，云雾低迷，雪花飞扬，北风飕飕，满天卷起“烟泡”。气温虽然下降，但恰是我部队移动的天然帐子。地上新雪掩盖了行军过后的踪迹。到了傍晚五时左右，天气忽然晴朗，满天星斗。半夜十二时，我独立支队由牡丹江东岸小山咀子进至依兰县城东北郊，沿倭肯河岸占领阵地。我主力第一纵队半夜十一时三十分进入依兰县城关西南及西北边缘，占领阵地。

二十一日午夜一时三十分，攻击开始。我主攻部队首先以南大营寇军驻地为目标，攻击前进。因得到伪军二十二团地下工作同志的内应，首先突入城西北防所，将伪军一个排缴械，然后从城西北和西南向据守在大营南边的伪军围攻。此时，我独立支队从倭肯河岸向城东攻击前进，围攻据守东火磨的寇军。激战至二十一日晨六时，城区大部为我军占领。部队肃清占领区内残敌，散发传单，召集民众进行宣传，收集军用物资。小部地区战斗仍在继续中。七时我军逐渐分别向城西、城南撤退。主力纵队之第五军和第九军军部（七百余人）以极迅速的动作，撤到牡丹江西岸、马家大屯一带，利用复杂地形隐蔽埋伏。其余半数骑兵半数步兵为掩护部队，佯作散乱仓皇撤走模样，诱使敌人出击。十时左右，日寇骑兵二百六十余人，果然出城追击，进入马家大屯东南我伏兵线内。我军突然发出异常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慌乱就地抵抗。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后，寇军被我全歼，逃回依兰者仅三十余骑。我方主力纵队在攻城及设埋伏战斗中，共消灭日寇三百余人，俘虏伪军一个排，缴获步

枪二百三十余支，轻机十挺，重机一挺，弹药五万余粒，军马五十余匹，其他军用品甚多。我方损失甚小。

我围攻东火磨的独立支队在主力纵队撤出城后，未按预定计划向倭肯河东岸撤走，又转向城南苏格屯，为日寇装甲汽车队和骑兵一部所追击，略受损失。但该支队共击毙敌五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收缴步枪三十五支，轻机枪二挺及其他军用物品。

攻城部队开始围攻依兰时，双河镇日寇军闻讯，以三分之二的兵力（约四百余人）出援，其余守备双河镇据点。二十日黎明前四时出发，沿公路急行军向北前进。

我王光宇师长所指挥的第二纵队，于二十日三时即到达新卡伦西北方小河沿附近的预定作战地点，选定公路两旁的有利地形，开始堆垒积雪，掘筑暗沟，埋设伏兵，隐蔽马群。二十一日黎明，封锁交通，断绝来往。下午二时，我伏兵沉着隐蔽，放过敌先头尖兵约五十余人，敌后续部队成双行大胆行进，闯入我伏兵线内。我五军二师部队在公路西侧隐蔽阵地突然出现，齐集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远者百米左右，近者仅五、六十米。敌人心胆俱裂，沿着公路仓皇应战。敌人失去指挥控制，秩序极度混乱，完全暴露于公路线上。有些敌兵在行进中被射死，有些虽然卧地，但未及扳开枪机就送了命。一部分就地卧倒枪火乱发，抵抗无效。被我放过的敌尖兵曾占领一小山向我射击，在我八军部的猛烈打击下，敌兵拚命向北逃去。经两小时的激战，敌军被我完全消灭。击毙敌二百八十五人，其余十余人负伤被俘。我军在打扫战场时，得到攻城部队三、四两军骑兵侦察队联络报

告：依兰出击的敌装甲部队及骑兵已由苏格屯方向向南行进中。我第二纵队的作战任务胜利完成，乃集合各部向西南土城子，牡丹江岸转移。

此次伏击战，在伏兵线共消灭日寇三百五十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三百二十支，轻机十三挺，步兵炮三门，狙击炮七门，弹药二万粒，钢盔二百八十个，军用无线电报机一台，军马四匹，皮军大衣三百二十件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我方五军二师四团指导员姜万有及八军连指导员王洪山等九人阵亡，负伤战士十一名。

三月二十五日，第二路军总部在牡丹江西岸召开参加作战部队干部会议，庆祝胜利，总结经验教训，分配战利品。经过这次作战之后，双河镇敌人据点撤除了，打通了我军通向图佳铁路以东桦川、富锦的交通封锁。依兰县和勃利县两地敌军龟缩据守，不敢猖狂出扰；同时提高了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积极性，促使伪满军日益消极动摇，便利了我方开展策反活动。七月初，牡丹江北方三道河子森林警备大队七百余人在李文彬、张镇华同志领导下举行暴动，杀死日寇指导官、教官十余人，高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八月，拥有伪满皇帝御林军称号的伪满军二十九团赫奎武部一千七百余人，在依兰起义参加抗日。他们的起义，是我军这次英勇顽强、机敏行动给予日寇以惨重打击所直接促成的。

黑瞎子窨截击战

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张镇华同志率领五、六两团骑兵，由

牡丹江岸喀上喀一带渡江东进，拟向图佳铁路以东地区转移，开展游击活动。五军军部带教导团、炮兵团先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在后面跟进。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当地抗日救国会的同志协助我侦察连逮捕了几名日寇密探。从他们口中得知勃利县的日寇一两天将出动往土城子一带“讨伐”。军部进行了研究，命令二师部队暂在三道岗的钓鱼台、黑瞎子窖一带停止行进，准备截击敌人。五月四日清晨，侦察队报告：汽车十余辆满载着日寇约三百余人，于上午七时由东面开来，到达大兴屯附近，现正向钓鱼台、黑瞎子窖方向前进。我五军军长当即面授指示：第二师五、六两团全部下马，将战马隐蔽起来，作好步战准备，在钓鱼台以西、黑瞎子窖以东，迎击敌人；军直属教导团、炮兵连、青年义勇军、妇女团控制在黑瞎子窖东北面村边。同时派遣了工作队，在选定的汽车道上埋设了土地雷，并将汽车道挖断。蔚蓝的天空，阳光照耀着平坦开阔的原野。我军警戒部队，远远地发现一连串黑点，从南面向北移动，接着就听见隆隆的汽车声。正午十二时，敌人的汽车络绎不绝，一辆接着一辆地进入“地雷区”。先头一辆汽车驶进最北端伪装浮盖着的路面上，突然“喀嚓”一声摔翻了。这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地雷手”一连串地拉动了导火索，埋设的地雷，一阵轰鸣，先头六辆汽车全被炸翻，后面跟着的六辆汽车立刻“卡住”。此时，我伏击兵集中火力猛烈向敌人射击，前面被炸翻的汽车里的鬼子兵全被打死，后面六辆汽车企图往回逃窜，行驶不远，便遭到我黑瞎子窖的伏兵的猛烈袭击。激战四小时，寇军二百五十余人被我军打死，并活捉寇军中

村上尉以下二十八人，其余一百多人向双河镇方向落荒而逃。

战斗胜利结束，我军补充了武器弹药。敌人的汽车东倒西翻，堆塞满道，被我一一焚毁。我二师骑兵部队，第二天浩浩荡荡地向图佳铁路方向前进了。五军军部直属各队渡江西去，在青岗子一带休整。

这次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组织的援助，情况判断正确，部队调运敏捷，截击地点选择恰当，战士作战英勇果敢。

五道岗子截击战

抗联第五军第三师第八、九两团，是从伪军起义过来的，由五军收容改编的。这个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初期，曾经是吉林自卫军积极抗战的中坚部分。一九三三年，吉林自卫军瓦解，该部为日寇收降。从那时起，我党在该部队内建立起秘密的组织活动。该部的领导干部和战士们既受过初期抗日战斗的锻炼，投降日寇后，又深深尝到了亡国奴的苦头，因此官兵觉悟高，党在该部的秘密工作深入人心。从参加抗联五军那时起，该部就建立起完整的政治组织，群众纪律和军事纪律都很好。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由牡丹江向土龙山移动以来，打了大小七次战斗，给敌人以很大的损伤，真是士气饱满，斗志昂扬，深受群众的拥护，对伪军影响很大。开到土山地区以后，驻太平镇的伪满军三十四团和湖南营的（图佳铁路线上）二十七团都与我三师领导干部通气，大有

"跃跃欲试"举行起义趋向。日寇为了防止暴动，把伪满军监视起来，不让与抗联接触，并经常出动骑步兵，不断四出"驱逐"抗联部队。八月十六日，我军与日寇在来柴河打了一战。十八、九两日寇军仍不断在孟家岗与来柴河之间巡逻不休。

八月二十日，我抗联二路军总部命令：五军三师八、九两团（步兵八百余人，骑兵百余人）为主力，上午五时在李红眼屯作战斗准备，五时三十分向五道岗北麓一带隐蔽待机；另派八军刘曙华主任、独立师金正国主任率骑兵进至孟家岗方面，诱使寇军骑兵、黑石部队七百余人出动。我骑兵部队即绕到来柴河东，将敌诱往五道岗东南通往七虎力河子的大道上，追击我军。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五军三师七团配置于五道岗东北端的监视哨报告，敌骑兵先头部队五、六十名猛追我骑兵部队，已进至五道岗南侧大道。十时，我五军三师七、八两团迅即进入预先勘査好了的五道岗阵地，放过敌先头部队，直到敌骑兵主力六百余人完全暴露于阵地前面时，我军发出信号，一齐射击。在居高临下的三里多长的有利阵地上，以猛烈的火力侧击敌人。敌骑猝然挨打秩序混乱，一小部沿大道控制空马群于道南小高地附近抵抗，另一大部乘骑向我中央阵地冲锋，并抄袭我左侧面。激战两小时，抄袭我左侧面的敌骑，首先被我九团四连及师属骑兵队打垮，退至大道边。此时我八军及独立师骑兵亦从五道岗西南方反击敌先头部队。激战到午后一时，将敌人完全压缩到五道岗南面大道两侧。午后二时，我五军神枪手队（八团一连）投入战斗，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死伤累累。下午三时三

十分，我全线发起冲锋，向敌人猛冲压迫，将敌人完全包围，敌骑二百余人拚命突围向孟家岗方向落荒奔逃，抛弃尸体三百五十余具，伤兵五十名，马被打死二百匹左右。战斗到下午四时三十分胜利结束。

我们夺获四四马枪二百二十支，轻机十五挺，钢盔、马刀、弹药甚多。并虏获全鞍战马五十匹。

这次战斗打得敌人丧魂破胆，不敢出扰达半个月之久，伪军受到更大的动摇。八月下旬，以“康德皇帝御林军”称号的伪军二十九团，全部（一千七百余人）在依兰起义，投向抗日联军。游击区的人民受到更大的鼓舞，到处欢唱：

十大联军骑大马，逛大屯，
来往扫荡日本鬼。
要算五军大部队，东冲西闯势难挡。
见百姓叫爹娘，见鬼子逞雄威。
一枪一个送贼命，日本国里招鬼魂。

“十二烈士山”战斗

素为下江一带敌人闻名丧胆的五军三师八团第一连“神枪手队”，全连六十余人，指挥员战斗员都是百发百中的头等射手，连长李海峰是“射击手之王”。他左眼瞎了，可那神鹰般的右眼，明察秋毫，甚至远到八百米之内弹无虚发。全连战士都出生于农村，惯常打猎。自从参加抗联以来，不到一年，打过不少胜仗。日寇官兵仅仅为该连射杀者，不下

三百五十人。

伪蒙古“兴安军”骑兵是日寇特别训练的。每个兵士装备着马枪、马刀、手枪、套马索，马上、马下技艺相当娴熟。冬季除了乘马作战以外，还携带着滑雪板，到处滑走。“兴安军”共三个团，每团约千骑，是日寇有力的一支剽悍和野蛮异常的走狗军队。从一九三七年秋开到下江地区以来，在日寇“大亚细亚主义”、“黄种人自强”等口号下，挑起了民族仇恨，兵士们如醉如狂，所到之处，欺压人民，奸淫妇女。人民恨之入骨。抗联的下江骑兵部队，也常常不断遭受打击。

一九三七年十一、十二两月，“兴安军”在富锦地区横冲直撞，嚣张已极。在集贤镇和李金围子一带的几次战役中，遭到我五军三师步兵部队的狠狠打击，消灭了“兴安军”不少官兵，打掉了这支走狗部队的猖狂气焰。从此，他们只要听说“五军大部队来了”，就不敢疯狂行动。

一九三八年冬季，富锦、宝清一带，降雪甚多，平原积雪深达二尺，山区则湮没人顶。我二路军总指挥部后方及三师部队，以完达山脉密、宝、勃三县交界之兰棒山为根据地。兰棒山山岭重叠高大，溪谷曲折，森林茂密，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宝石河子，蜿蜒向北流往宝清，约百余里。宝石河子两岸谷地平坦开阔，多水藻地，沿河山岗起伏，极目远望，林木扶疏。冬季，这地方有木柴采伐及炭窑作业的农民。最近两年这里成为我根据地与敌军经常出扰的边沿山区。

我五军三师，奉二路军总部指示，集结八、九两团，准

备向勃利、密山地区转移。二月七日师长李文彬下命令，要求第八团于十日以前，将住在宝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的尖山子附近的各连的警戒部队撤收，向兰棒山北麓炮营集中。

五军第八团一连连长李海峰、指导员李正浩率领着“神枪手队”驻守尖山子、大顶子北坡最前线。二月九日黎明全部撤收了警戒，为着按预定日期等候总指挥部交通副官张凤春自富锦方面归来，连长和指导员商议：连长带着两挺轻机和十一名战士在原地等候。指导员不放心，想把全连留下一同等候。李连长说：雪下的这么大，你们先走，踩出一条道来，我们在后面赶你们，那不容易多了么？指导员终于同意了，带着连队，冒着满天飞雪，向兰棒山方面行进。

李连长的小队在尖山子等候了两个多钟头，张凤春同志果然出现在眼前，汗珠及呼出的气结成冰溜，一串串的吊在皮帽沿上，好象戴着玻璃冠一样。张副官看见是李连长等候他，特别高兴，把敌情简单地告诉了李连长：“富锦、宝清的敌人四出骚扰，搜查山边。”

上午九时，李连长的小队和张副官离开了尖山子。他们下了高山，沿着谷地走了一个多钟头。虽然连队在前面走出一条路来，但时间不久又为风雪所湮没，行动很不方便。顶头风越刮越大了，几乎睁不开眼睛。小队向南沟走了十多里路，快到十一点钟了，李连长嫌走的太慢，正要超过前边带路的同志，突然出现敌骑兵一股约三百余人。两方距离仅有一千米左右，平行地向南前进；同时在尖山子南面又出现敌骑另一股约百余人，距小队后尾二千米。李连长判定右侧是敌人伪“兴安军”，后面是日寇军，他立刻命令小队同志：

步兵不能和骑兵竞走，已被风雪湮没了的踪迹不能再暴露给敌人，防止引敌入山，断然占领左前面的小孤山准备抵抗。

这座小孤山是在大顶子南方十余里平原地带突起来的一座小山，从西北到东南长百余丈，高百米。由平地往山顶，越往上坡度越急峻。山顶棱线上点缀着一些天然的峭壁岩石，这似乎是“天老爷”早已安排好了的良好抵抗阵地。李连长带着十二名勇士，迅速地攀登山顶，在长五十米左右的棱线上利用地形堆筑“雪垒”。射手各自占领阵地，轻机两挺分配在两端。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决一死战。敌“兴安军”首先散开包围，日寇骑兵也加入战斗，敌人认为我们“人数很少”，妄图生擒活捉，以解对五军大部队的刻骨仇恨。战斗在午前十一时开始，第一批敌人约百余人分西北和东南两面乘骑往上冲。陡坡积雪很深，敌人跌跌爬爬快到半山腰了，山顶上突然响起猛烈的枪声，不到二十分钟的工夫，枪声停止了。敌人仰马翻，滚落山下，有的挣扎逃命，有的被打死了，埋葬在深雪坑里。敌人发疯了，在东面大山上架起骑兵炮向小孤山乱轰，炮弹不是落到山前，就是掉到山后，一发也没命中。战斗延续达三小时。敌人八、九十人舍了马匹，穿上滑雪板，向山顶猛冲，又被我小队几阵枪火盖了回去。敌人又组织二百多人，发起第三次冲锋，依然没有效果。可是我们的战士已经阵亡了三人。张炮同志使用的第一挺轻机已经换过了两次备补枪身，子弹也打完了，拿起步枪射敌人。李连长左腿也负了重伤，仍然沉着坚定地指挥抵抗，弹不虚发地射击敌人。“兴安军”攻击不下，受到重创，激起了寇骑的怒火：“明明就只是十几个人，抓不到活

的，还不能把他们全打死？”于是寇军全部和伪“兴安军”二百余人，把小孤山重叠包围，向山顶扑来。我们的壮士依然“屹立如山”。敌人不到五十步、三十步不开枪，一开枪敌人就应声而倒。“堂堂威武”的日本皇军、剽悍勇猛兼犷野的“兴安军”，在小孤山一个个失魂落胆了。激战到下午四时，第二挺轻机枪的射手向李连长报告：“我的子弹打完了，机枪打坏了。”李连长告诉他：“把机枪拆卸开，一件件的丢到雪堆里，不要让敌人得去。”他照样做了，拿起一支步枪继续抵抗，但不久便中弹阵亡了。这时李连长右腿又连负好几处伤，下半截不能活动了。其他的战士陆续阵亡。阵地上只剩下五名战士。什么地点敌人聚的多，攻的紧，战士就把李连长抱到什么地方去抵抗，显示“神枪手之王”的本领。

夜幕渐渐低垂，敌人冲锋屡起屡停，山腰和山下的积雪被敌人人马揉成一堆一堆的，敌人卧伏在那里不敢动弹。

最后远处飞来一粒流弹，正中李连长脑顶，他和剩下来的三名战士才安静地躺下去了。

这时，只有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同志还活着。他虽身中数弹，鲜血淋漓，但没有伤到要害处，还能行动。他知道战斗就这样壮烈地结束了，他象平常一样脱去了皮帽，弯下身腰垂着头，向李连长和其他十一位烈士静默。泪水呀，簌簌地流淌。他猛然站起来擦干了眼泪，把阵地上的空枪，一支一支的扔到雪堆里，自己带着两支手枪和两支步枪，趁敌人慌乱之时，寻找空隙，带着重要的信件，向外突围。

敌军蜷伏达两小时，听不到小孤山上有丝毫声响，才慢

慢地、小心地爬上了山顶，蚁聚到棱线上，现出豺狼般的面貌，毁损了战士的遗体，但找不到任何一件武器。

此次战斗中击毙日寇二十五人，重伤十余人。“兴安军”被击毙七十余人，伤十五人。冻伤的日伪军近五十人。军马被打死九十余匹。

我八团一连小队全员十二人，所带弹药约二千粒，平均七粒多子弹打死打伤一个敌人。

二月十日，敌军一个个垂头丧气，人困马乏，狼狈不堪地往宝清城走。前面既无尖兵，后面也无掩护，以为“太平无事”了。上午九时,敌军前拥后挤的经过大顶子以北五里左右的深谷转弯处，侧面两边山头突然出现我军伏兵，响起了爆竹般的枪声，弹丸象雨点一样飞向敌群。敌失魂落魄，胆战心惊，队伍越发散乱了，顾不得组织抵抗，拚命的争先逃跑，敌官兵的尸首和武器抛弃满地。

当小孤山发生激战到下午的时候，二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王效明判定，必系我八团一连李连长被截击，当即召请三师师长李文彬等同志集议，认为必须出援。此处距战场四、五十里，即使部队开到也已是深夜了，乃决定八团全部步兵、总部直属骑兵警卫队、三师骑兵连在先头行进，沿李炮营西北沟山岭向尖山子、大顶子方向试探前进。半夜十一时出发，走两小时之后，尖兵突然在山岭上发现山下有人影往山上走，尖兵要捕捉这“嫌疑人”。快要互相接近的时候，这个“嫌疑人”由山下往上看，看的比较清楚，看准了是自己人，很高兴地叫唤起来。五军老战士们都熟悉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同志，好些同志包围上来，把他身上的枪支拿下来，

诧异地问长问短，张凤春同志总是摇头。见了王效明和李文彬同志后，他把小孤山激战的经过简要地诉说了一遍。王效明和李文彬同志商定，队伍沿山道迅速隐蔽前进。十日拂晓队伍到达大顶子山北方，选择好了向南弯曲接连不断的几座高山，在各个山顶上布置了伏兵。敌人漫不经心地沿着谷地向东北行进，遭受到我军的意外的打击。寇军骑兵死三十余人，伪“兴安军”死三十余人，负伤二十余人。

我军清理了战场，获得了不少武器弹药、军马、军刀、钢盔、铁甲、滑雪板、套马索等等。部队从容地向小孤山转移。王参谋处长、李师长等到达山顶阵地，检查了战迹，升起红旗。部队在山周围警戒线上起立，低沉而庄严地唱起挽歌，向英雄的十二烈士追悼致敬。王效明同志宣布，根据党委的一致意见，从此把小孤山改为“十二烈士山”，永志不忘。

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同志当时写了一篇“宝清烈士山十二烈士苦战记”，印发抗联各军。作者以精辟的、警醒的笔法，撰述十二烈士的英雄形象，刻划出恶战苦斗的情景。这篇文章的每一个读者，无不为之慷慨流涕，对烈士们肃穆起敬，对敌人燃烧起愤怒之火。可惜原文至今搜求未得，仅在我的日记上记载着“十二烈士山后记”，残缺不全的诗一首：

兰棒山顶云雾垂，宝石河边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十二烈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倭奴蒙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胆壮气豪动鬼神。
不惜捐躯为革命，但愿失土早归回。
他年民族全解放，指点沙场吊忠魂。

不到一个月，在同江、富锦交界的西林子，伪“兴安军”又为我抗联七军二、三师的阻击部队所袭击，打死官兵七十多人，负伤二十多人，缴获重机两挺，马枪六十多支，弹药万余发，军马五十多匹。从此“兴安军”既受到抗联的不断打击，也受到民族抗日的教育，该部队日寇教官无论用什么欺骗压迫手段，已不能再煽动起已经低落下去的士气。寇军防卫司令部估计“兴安军”有通抗联的危险，一九三八年四月把残缺不全的“兴安军”调走了。

下江一带老百姓知道了“兴安军”不断挨打的消息，现在又再看不到这般“野鬼”，莫不欢天喜地拍手称快。

突　围

一九三八年一整年，伪满三江省日寇动员七个步兵师团、三个混成旅团和一支装甲部队，还有飞机，在已经完成的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的基础上，要把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联、成千上万的铁骑一网打尽。中共吉东省委早就看出日寇这一恶毒企图，远在一九三七年六日初，在北满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吉东省委代表认为，一则为准备配合迫在眉睫即将爆发的全国抗战，再则为打破寇军对我下江各军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提出抗联下江各部队必须早作准备，打破敌

人的计划。吉东省委首先执行会议的决定，抗联四、五军主力，于一九三八年初陆续在北牡丹江岸结集，四月向老爷岭西方移动，进入敌后延寿（老游击区）攻打了几个据点；接着向南转移，作最大的机动活动，攻克楼山镇，袭击苇河城，多次袭击中东铁路、拉滨铁路的运输，继续向五常、榆树、舒兰地区会合抗联第十军部队，伸张活动，攻打了十几个小城镇，拔除了许多据点，开展了群众抗日救国工作。歼灭日寇近三千人，伪军警千余人。我四、五军主力部队三千五百人，扩大到五千人。部队所到之处，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颇受广大群众欢迎。从此震动了伪新京、吉林、哈尔滨的日寇，谣传风起，人心浮动。这是日寇关东军司令部料想不到的。它在这一广大地区兵力薄弱，防守松懈，使我有转战余地，但是到了深秋十月，情况急转直下，我军正在经营建立舒兰、蛟河、老爷岭等山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寇军伪牡丹江省地区部队一个师团，吉林、哈尔滨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合围而至，将我四、五军西征部队压缩到拉滨铁路以东，并向敦化出兵，由西南面封锁和搜索老爷岭林区。我军几经苦战之后，部队伤亡甚大，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负伤，暂时回归岭东，四军代理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以下各级干部战死者甚多。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陈明雅）、团长曲成山所率领的一个团及十军部队被敌人割断在舒兰、蛟河间的山区，陷入孤立苦斗中。十月末，我四、五军主力部队二千余人，在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下，拚力冲破敌人在五常、舒兰的包围，打了很多次的仗，向中东路以北转移。大雪已经下了两

场，战士仍然穿着单衣，无法立足休整。换上冬装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度从苇河东北翻越老爷岭山脉回到牡丹江东岸刁翎地区。西征的五军部队只剩一千五百人，四军部队只剩二百人。

抗联四、五军西征部队，突破缺口深入敌后，经过半年的积极活动，打破了敌人“三江省聚歼计划”，调动了敌人的兵力，有利于我松花江北岸抗联三路军主力向小兴安岭以西黑嫩地区转移，并减轻了沿完达山脉作依据，坚持下江广大地区游击活动的第五军三师和第七军及三路军、松花江右岸各部队的压力，同时并有助于南满一路军开展鸭绿江岸的活动。这在战略上是成功的，但是敌人处在绝对优势，以及由于我国内抗战形势不利的反作用的客观影响下，加上西征部队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中有单纯进攻偏向，在有利条件下，没有同时积极经营新根据地，以致深秋季节到来，情况急转直下时，被迫退回北牡丹江老区。虽然在这一地区还有被摧残的根据地的支援，勉强换上冬季服装，但又掉进了敌人包围圈的深坑里，情况越来越险恶。

抗联二路军总部是吉东和下江联军各军部队的指挥中心，第五军是联军战斗的基干。敌人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就开始图谋“擒敌先擒王”，处心积虑地搜集情报，用尽一切手段破坏指挥中心和抗联核心部队。一九三八年初，在饶河、同江间设伏袭击我二路军总部，出万元“购求”总指挥周保中首级,同年秋“大讨伐”,“购价”增至十万元。对于抗联第五军除了在军事上不断加强进攻外，还在政治上力图从内部瓦解战斗核心，以求其余可以“迎刃而解”。因而掀起一

九三八年末到一九三九年初刁翎地区突围的残酷斗争。

当四、五两军西征部队被迫重新陷入敌人包围网时，敌人迅速调动兵力，在牡丹江地区形成严密的包围。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敌人的基本目的是：

（1）捕捉二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予以歼灭的打击；（2）以围攻五军主力部队为主要目标，加以歼灭，以后逐渐消灭其他联军部队。敌人围攻兵力部署大体如下：

1、沿北牡丹江岸头、二三道河子、三道通、土城子、江西、马家大屯、大山咀子等地约四百多里的江岸沿线上，配置日寇军一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连队，约一万七千余人。

2、以林口为中心，向北之青山、虎山、勃利，在从勃利向西北经双河镇、新卡伦到依兰这一段约四百多里的公路线上配置一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联队、战车队等，约一万九千多人。

3、由林口、龙爪沟、前后刁翎、土城子、小河沿到依兰配置一个师团，一个独立步兵联队，约一万三千人。

总兵力约五万余人。另外有伪满军步兵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五等团，约七千余人。

4、伪牡丹江中东铁路东线，图佳铁路、穆棱铁路和松花江沿岸另有守军严密封锁。

敌人采用依靠据点，稳步前进，大包围套小包围，来回拉网搜攻的方法；企图用寒冷、疲乏、绝粮等来窒息抗联士气，然后予以猛烈的战争打击，再配合政治进攻，务期达成完全歼灭之目的。

这时期我联军在刁翎地区及北牡丹江东西两岸地区的联军部队有：

第二路军总部及直属队220人

第五军教导团和一、二两师主力1800人

第四军200人　第八军700人

第九军500人　第三军150人

救世军400人　合计3970人

二路军总部和抗联各部队被迫与十五、六倍于我的敌人作斗争。

十一月初，总部由下江赶到牡丹江地区，指示各军部队，就原地赶换服装，补充给养，处理伤病及后方勤务，准备分路向岭西和中东路南突围。但在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的时期内，各部队虽然勉强换上了冬装，而粮食给养却越来越困难，并且在敌人不断地封锁、搜索下和在进攻部队作战中，我方人员继续有损失；八、九两军部队人员逃亡日多，且有少数部分叛降敌人，情势愈趋严重。在联军基干的第五军部队中也发现有企图叛降的，这就成了根本问题。

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本人是小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〇年转为党员，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斗争，因为他表现积极进步，有“理论修养”，作战指挥勇敢、机敏，因而受到党的信任，升以军事政治重职。但党也不断同他的“左”右倾小资产阶级偏向作斗争。当四、五军西征主力回到牡丹江地区时，他背着五军党委同志们，在暗中拉拢动摇分子，进行叛卖活动。他以“抗战胜利遥远、客观形势险恶”为出发点，提出必须

“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可以同敌人取得暂时的“妥协”来保存实力等谬论，在部队中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动摇士气。

十二月下旬关书范借口深入侦察，瞒着五军党委，瞒着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秘密前往敌据点三道通会见日寇工作班特务头子小林和斋藤，同他们两人初步“协商”后，一同到佳木斯日寇军管区会见北部顾问，在那里签订了“协定”，主要内容：（1）接受五军投降，以五军为中心，收编牡丹江抗联部队，改编为一个师独立旅；（2）划定刁翎及土城子地区为特别地区，由独立旅驻防。

日寇在叛徒关书范的帮助下，加强了重兵压迫紧缩包围，妄图把那一地区的抗联部队一网打尽，然后进而消灭整个伪三江省地区的游击活动。

二路军总部估计到关书范等的变节行为，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在牡丹江东岸椰树河子台召开吉东省委干部会议。到会者十九人。主要讨论当前斗争趋势，必须坚持革命，战斗到底；克服五军部队中的动摇情绪，巩固内部。开除关书范、赵子超、郭郁洲等人的党籍，撤销其军政职务，并将为首者关书范判处死刑，捕捉就地枪决。次日召开四、五军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拥护省委的决定。会后积极分子回到各自部队作了必要的传达，揭穿了关书范等的卑鄙恶毒阴谋，进行了教育解释和宣传鼓动。全军战士对叛徒关书范等深恶痛绝，愤激异常，表示愿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坚持战斗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军事行动上，总部决定以警卫部队

作中坚，集中掌握八、九军和救世军，向老爷岭西突围，进入方正和延寿地区。五军军长柴世荣、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同志领四、五军部队，向北佯动，然后从东面突破勃利、林口间敌人的二重封锁线，向南宁安间转移，五师陈翰章、侯国忠两同志率部队协同行动。

一月十五日，叛徒关书范等穿着日军服，随带走狗工作班人员张清等二人，乘坐汽车自佳木斯地区赶回刁翎区，企图寻找我五军部队，进行叛党卖国的公开活动。吉东省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逮捕了关书范，示以宣判书，关表示“一时错误”，后悔莫及，但求宽恕，愿立功赎罪，供出与敌人合谋诱歼我抗联的全盘计划。省委会决定，将关书范、张清等二人立即执行枪决，并向全体战士宣布，真是人心大快，斗志更加坚定。

省委和二路军总部将江岸残留的根据地伤病员作了安置处理，清检和焚毁了党政军各种秘密文件；较好的步枪、轻机及重要文件需保存者，分别埋藏深山密林中，较次的大批武器，包括重机、迫击炮等悉沉江底，准备万一。

当时的斗争方针是：坚持忍耐，力图避开敌人，保存实力，但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即身裹红旗，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埋葬在沙场上，亦在所不惜。宁愿高举革命红旗作光荣的毁灭，绝不苟且偷生，玷污伟大的革命战士气节和贞操。于是，第一次分路相机突围的残酷斗争开始了。

在叛徒关书范还没有被枪毙时，日寇对二路军总部行动方向是捉摸不清的，但是因为关书范案的从犯、五军军需处处长赵子超和教导团三连指导员郭郁洲得到缓刑，趁机逃

脱，投降敌人以后，将我方情况全部告知敌人。日寇指挥部深恨其阴谋诡计被破坏而大失所望，但同时已经获知我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的确实所在。叛徒被处死，我部团结更加坚固，因而引起寇军更加疯狂狠毒，以誓必破坏我省委及总部首脑机关为目的。一方面派出大批特务走狗，四出活动，散布传单、流言，悬奖金十万，购周保中首级；另一方面命令在该地区的所有“讨伐队”积极行动，加紧牡丹江沿岸依兰、林口、勃利各地互相衔接的包围封锁。漫山遍野，满坑满谷，四出搜索进攻，并以飞机数十架轮番侦察、扫射、轰炸，还以战车和骑兵交替搜索目标。在刁翎土城子及江岸地区敌人搜索殆遍，敌我接触不断发生。我总部及直属部队与八、九军和救世军部队联络屡被中断，四、五两军部队亦被割断在乌斯河以北，陷于苦战中，暂时无法突破敌围，只好采用分散活动。延至一月二十七日，我总部及直属部队才和九军救世部队取得联络，在刁翎大百顺沟一带迅速集结兵力，约九百五十人。在极度饥疲困乏中鼓励士气，经两昼夜急行军，穿空绕越敌人三道通封锁线，由柳树河子过牡丹江西岸，进入夹皮沟转四道河子上掌，脱离了江岸敌兵的包围圈，向敌军防守比较松懈的老爷岭西的方正、延寿方面前进。

二月一日，开始在原始森林中行军，正值大雪纷飞，朔风凛冽，气温骤降至零下四十多度，积雪深处达一米以上，没有道路，部队轮番在前按方向踩开积雪行走。寒冻断指裂肤，饥饿困扰士兵，部队在千百处峭壁峻岭、怪石嵯峨的深山大谷中行军。狂风怒吼，参天树木摇曳欲坠，或作霹雳雷

鸣声断折倒地，拦住去路，须绕越而行。枯木冻裂有如枪炮爆炸声，俨如敌人骤然袭来，惊心动魄。有时候遮天蔽日的大森林，忽然静悄悄的万籁无声，飞鸟尽藏，走兽绝迹，这种沉寂，格外引人寒噤。我们的战士渴了，化雪为饮料，饿了吞黄豆和粗糠。有的抗不住冻饿，倒下去几分钟后就变为化石般的僵尸。苦况虽然如此，但是部队的战斗意志是坚强的。经过十天的极度困苦行军，没有人掉队落伍或中途逃亡。

二月八日上午七时，越过岭西到达方正县界的陈家亮子，在密林以东十数里搜查敌情，获知该地驻有日寇一百三十余人，伪军三百二十人，经常出巡森林山谷四处搜查，并与驻松花江右岸大罗勒密寇军一个联队取得联络，在那里按月交替入山。

当时西进部队携带的“给养”只有两日份，若无补充来源势将陷入完全饥饿的苦境。我总部决定：采取短促袭击，消灭该敌，解放采伐工人（千余人），求得给养补充，稍事休整以后，再继续前进。

下午三时，敌人的巡逻兵在木棚附近搜查巡视，未发现我方行动踪迹。下午五时，我方决定部署夜间袭击。部署总警卫大队第一、二中队及救世军部队共四百五十人，袭击木棚西南防所的日寇军；总部第三中队及九军部队三百三十人，袭击木棚东北伪军防所。指挥所掌握其余兵力百余人，控制木棚南方三百米的小山，担任掩护。

二月九日午前二时，我西南攻击部队首先迫近日寇防所土壕边，突击队架设倒木，排除障碍物，猛冲前进，并举火焚烧防所附近储木场，照耀如同白昼，枪声手榴弹声大作，

猛向寇军压缩。寇军混乱不堪，仓猝应战，有的被房屋倒塌压死，有的被击毙击伤。经过两小时激战，寇军全数被我歼灭。此时我攻击东北防所的部队已将伪军包围所内，敌人凭借屋角工事固守。直到西南寇军被我消灭之后，才分出兵力增援东北攻击部队，加强火力压迫。伪军在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专打日本人”的号召下，停止抵抗。伪军死伤五十余人，其余二百人悉数向我缴械投降。战斗延至九日九时完全胜利结束。午前十时，我军清扫战场，召开工人大会，解放工人，处理俘虏，收集战利品及粮食，休息整顿部队。此时根据在工人群众中潜伏着的我方正县地下工作同志向总部提供的情报以及讯问俘虏，综合情况，认为方正、延寿、苇河一带寇军虽减少，防守松弛，但对老爷岭山林区的封锁和搜查行动仍未停止。在陈家亮子敌军林区据点兼伐木场被我扫除以后，必然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对我方向西转移是最大障碍，势难避免脱出岭东敌人的包围，而又陷入岭西敌人的包围。按当前情况，只有两个方案：一是大胆向西冲进，但这是冒险的；二是暂时撤回老爷岭东，在敌人包围圈外边缘地区隐蔽行踪，伺机动作。正在抉择未定，下午九时我方派出的大罗勒密方向的侦察队回来报告称：驻守大罗勒密的寇军骑兵三百余人，步兵五、六百人驰援陈家亮子，估计敌先头部队明日七时可到达。此时总部立即下决心，避免被敌围攻于陈家亮子，命令部队严加警戒，安静休息。二月十日黎明前五时，早餐完毕，焚烧了木棚，毁坏所遗留的物资。部队向东转移，走原来部队西进时踩出的唯一“道路”。

二月十一日午前六时，我军到达老爷岭顶四道河子上掌（地名阎王鼻子），该山西坡山势急峻，地形险恶，料定敌人追兵必来，乃选择精兵百人，附轻机十挺，在该地设置伏兵，山坡上下层层配备，相互衔接，部队在岭顶东坡大休息。下午二时寇军果然跟踪追至。

陈家亮子据点被我消灭，敌人非常恼怒，错误地认为我军是在牡丹江岸长期大包围圈中饥饿困乏之漏网残军，从陈家亮子仓皇撤走，只要跟踪猛追，就能予我以歼灭性的打击。因此，敌人追兵部署秩序不整，断断续续。骑兵、步兵混杂争先，林区地面积雪深厚，天上又降大雪，除了沿着我军撤走的一条狭窄的道路跟踪前进以外，不易分兵分路。

午后二时，敌军人困马乏，埋着头向阎王鼻子山爬行。我军将敌人先头部队骑兵约三百余人放进到伏兵线内——“口袋里”的时候，突然一齐猛烈射击，向敌人猛袭。敌人立不住脚，后退也来不及，不等伸手抵抗，就被打得懵头转向，滚滚爬爬。经两小时激战后，敌人兵马死伤狼藉，敌先头部队几乎无一生还者，军械弹药遗弃满地。敌后续部队也被我猛烈火力打击，狼狈奔逃，我伏兵一部追出数里以外，直到敌人逃亡无影，才收兵回归。

是夜，我军在岭上安全休息。二月十二日，继续试探东进。陈家亮子袭击战斗中，我九军军长腿部负重伤，救世军曲师长阵亡，其余牺牲干部战士三十五人，负伤二十人，冻死二十人，冻伤三十人，失踪三人。阎王鼻子伏击追兵战斗中，我军无一伤亡。

二月十五日，东进至葫芦崴子、半拉窝集一带，派出侦

察判明牡丹江岸敌情：敌之封锁包围部队仍未撤除，对山林区的搜查进扰行动范围则收缩了。同时接获五军军长柴世荣、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两同志的联络报告称：该部队自一月末突破敌寇乌斯浑河封锁后，几次战斗均未越过勃利铁路封锁线，部队续有伤亡，二月初转移土城子江西地区，现在喀上喀一带活动中云云。总部决定，在现地休息数天，处理岭西虏获的武器及战利品，安置伤病人员，暂命九军及救世军部队去四、五道河子江西岸，隐蔽休整，相机活动。第一次突围暂告一段落。

在葫芦崴子，追悼突围战斗及历年阵亡将士，大家肃穆庄严地唱起挽歌：

日寇猖狂，侵我海宇，狼烟遍地起。
工农兵学商齐奋力，抗日旗帜高高举。
为伟大祖国光荣，为民族自由独立。
黄帝子孙好儿女，前仆后继争杀敌。
那管饥饿病困，断指裂肤。
不顾风暴烈日，雷电雪雨。
捐躯轻鸿毛，荡寇志不渝。
倭奴罪恶须清除，索还血债一笔笔。
同志们，安息！
踏着你们洒下的血迹，
誓将民族解放进行到底。
前面就是胜利！
那是你们伟大光辉，永不褪色的业绩！

第二次突围。从一月中旬处死叛徒关书范以后，总部及直属部队、九军、救世军部队突破敌围，消灭陈家亮子敌人。五军军部在勃利，双河镇、小城子地区几次与敌恶战苦斗，突围受挫后，日寇在林口、勃利、依兰及刁翎牡丹江岸地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包围封锁，搜查进攻越来越紧了。我军各部伤亡、损失不断增加。同时日寇伴随军事压力、经济封锁，仍然幻想着对五军部队施行政治瓦解。寇军特务工作班、宣抚班加强活动，并以关东军名义，大量散发各种标语传单。在"告抗日军诸同志"的一张传单里这样写道"……诸君冰天雪地，饥寒交困，苦痛异常，缺乏生活兴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诸君心惊胆怕，午夜不安。抗日迷梦，应行速醒，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诸君应速归顺。现在是良好机会，凡以前归顺都得安乐幸福，诸君当能面知，何故执拗徘徊。大日本军虽有几百万雄兵，但不愿与诸君战斗，惟望诸君速速归顺，否则不断举行大讨伐，一决雌雄……"

"大日本军对归顺者，保证其生命安全，介绍其职业，使之同沐大满洲国皇恩……"

"……周保中屡屡阻碍归顺者，增加诸君痛苦，实为大满洲国逆贼，决不可容恕的罪人，诸君何故听其愚惑，而昧于自己新生向上乎？愿诸君勿再自苦，力图脱除周保中逆贼压迫，快来归顺……"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贼恶毒阴狠。

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起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是斗争最残

---

① 摘自周保中日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本存中央档案馆。

酷最尖锐的四个月，前后对敌作过大小三十七次战斗，破坏敌集团部队十一处；共打死日寇军二千余人，伤三百余人，消灭和俘虏伪军近七百余人；击落飞机一架，毁汽车十余辆……但我军损折亦在三分之一左右，以八、九军、救世军较为惨重。到三月底统计，总部（包括省委机关）有人员二百五十人，五军二团二百八十人及三团二百人，二师五团二百五十人，四军一百人。此外伤病员一百五十人，合计一千九百三十人。

三月二十八日，接到依兰、林口、刁翎的地下组织同志的报告，关于敌情方面，几乎有完全相同的情报：（1）敌人增调兵力，封锁方正、延寿、老爷岭林区，分路不断搜山；（2）在开江化冻以前，林口、勃利、牡丹江岸将举行全面大扫荡……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我总部在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沟里，严设警戒,召开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五军军长柴世荣、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九军主任王克仁、省委秘书处主任金石峰、冯丕让、江童等二十七人参加。会议开了三天，讨论了斗争形势、地下党和抗联的当前迫切任务及今后斗争方向和工作任务问题。

会议认为：（1）由于慕尼黑会议所孕育的恶果，法西斯德国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和捷克，将促成欧洲大战。日德意反共同盟活动加紧勾结,日寇将加紧进攻南部中国,若非同时进攻苏联，即将南进，发动东南亚反美英法战争。中国抗战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局面。（2）完全拥护中共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及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指示方针。满洲党组织必

须作更长期的斗争，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直到最后胜利。（3）关于当前紧急措施：更严密的收缩，重建各县地下组织。（4）牡丹江岸、刁翎、依兰、林口地区抗联部队，必须千方百计，保护指挥中心，保存基干力量（四、五军部队）。

会议决定，改变军事行动突围计划：(1) 总部（包括省委机关）直属部队及四军部队共三百五十人，向宝清、密山转移，以便今后直接指挥掌握下江地区第五军三师、第七军全部及其他联军部队；(2)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及新调任的代理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克仁两同志，率领五军部队一千二百五十人，向穆棱、东宁、汪清地区转移，适当时机进入宁安、额穆地区，与我二军该地部队协同动作，再向蛟河、舒兰、榆树地区，恢复与残留该地区的四、五军部队的联系，并支持抗联第十军部队的活动，沿老爷岭、牡丹江及敦化、宁安东面的老松岭经营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3）冯丕让（五军副官长）、金石峰（省委秘书处主任）两同志率领留守部队四百人，用"麻雀战法"分散在江岸以东的刁翎、依兰勃利地区作广泛地积极活动，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兵力。并适当安置伤病员及处理后方勤务。同时不断同抗联八军、九军、救世军部队进行联络；（4）经过中东铁路以南，将我方情况告知第一路军及经过依兰、汤原告知第三路军。

四月十日，我军在乌斯浑河北岸老头沟一带集结，准备分兵突围。午前六时发现寇军步兵六、七百人，骑兵二百余人，其他敌军数路约千余人，分布在小锅盔山一带。上午八时至下午一时向我尾追不止，我退至北兴隆沟北方二十余里葫芦崴子。该地区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我军迅速占领绵延

不断的各个高地，组织交叉火力，猛烈打击追迫前进的敌骑兵部队及一部步兵，约三百余人。锅盔山一带的敌兵渐渐向葫芦崴子围逼前进，支援敌军。我军坚守阵地，顽强战斗，并不断利用地形迂回出击，敌步兵被我打死百余人，负伤二十余人，敌骑兵争夺高地被我打的人仰马翻向后溃逃。激战至下午六时三十分，我总部及五军部分两部撤退。是夜，急行军百余里，到达腰围子东沟会合，布置警戒，一连停留五天，补充给养，整顿部队，遂按分兵突围计划行动。

四月上旬、中旬，不断降雪，间杂小雨，催促着地面的冰雪解冻。白天的道路泥泞，只有深夜时，地面上又冻起一层浮冰。山水与小河流都在奔流着，牡丹江出现了“清沟”。日寇“大扫荡”果然到处出现，但由于季节的变换，阻碍着日寇活动，不象以前那样的“狼奔豕突”行动自由了。

四月十五日夜，柴世荣、王克仁两同志率领五军基干部队一千三百人，由徐家屯附近渡河，分为两路，利用地形熟悉，穿插空子，选择敌人所料想不到的乌斯浑河左岸山地，经三昼夜的隐蔽行军，于十八日天明到达龙爪沟，横越林口南面的向阳车站附近，通过图佳铁路，向穆棱的犁树镇前进。此时已为敌人发觉，我军沿林虎铁路右侧佯进，作奔袭密山平阳镇的模样。敌人信以为真，由密山、林口两地出动重兵，封锁了铁路线,在前方犁树镇、平阳镇两地布置兵力，准备反击，拟将我军歼灭于黄泥河子——张家街地区。二十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犁树镇西北二十里的红石砬子附近，前卫改后卫，大队沿山干南走，准备从穆棱站以西越过火车道。敌人部署落空了。但是我军估计到目标既已暴露，战斗

接触就无法避免，乃准备通过穆棱车站附近时，主动给予敌人以打击。不料敌人在下城子、依林寿、穆棱站的守备兵力薄弱，我五军部队，乃于二十二日夜间从穆棱站西面擀面石安然越过中东铁路，沿牤牛河山道向南行走。估计敌人必将追击，乃选择泉眼河设伏兵。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时，穆棱、下城子敌人凑集了七百余寇军，二百余伪军缓缓追踪而至，我伏兵齐起，集中猛烈火力打击，激战达五小时之久。寇军在地形不利的情形下，就地抵抗。寇军死伤狼藉，击毙寇军官兵三百五、六十人，伤四十余人。伪军在战斗开始，慑伏不敢动作。

敌军得不到后续部队的增援，步步掩护撤退，我军亦不加以追击。随即撤出战场，向东偏脸子前进。此次战役，我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王克仁及三团副团长王德山同志以下二十人阵亡，负伤十余人。自此五军部队冲破了敌人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的长期围攻，完成了突围任务，在八达岭林区稍事休整，即与宁安镜泊湖一带的我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陈翰章、崔贤等同志取得联系。又一次贯通了对我一路军的直接联络，勾通了四、五两军西征被隔绝在舒兰、蛟河的部队，重新开始了那一地区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的游击活动。

当时抗联战士编了一首小调，欢唱突围经过。

伪三江来伪三江，日本小鬼太猖狂，

多年苦心织罗网，想把抗联一扫光。

抗联英雄如猛虎，日本鬼子反遭殃。

铜墙铁壁被冲破，誓将倭奴抛海洋！

在五军部队向南突围的时候，将冯丕让、金石峰两同志留在刁翎。牡丹江地区部队开展分散活动，吸引了寇军“大扫荡”的兵力，迷惑了敌人的注意力。我总部及直属部队三百余人，四月十五日午前五时自后刁翎围子东沟向马桥河移动，午后四时为该地寇军封锁部队三百人左右兵力所发现。我主动攻击，敌人仓皇应战。傍晚激战结束，敌人死伤三十余人。我向后围子前进，诱惑敌人，半夜向拉拉别河转移。为消灭踪迹，向上流徒涉五、六里，驻守下游堵击的寇军并未发现我军的行动。四月十日晨行至拉拉别河与荒沟间的无名高地，乃在该地大休息一日。十七日至十九日天气或雨或雪，大雾散发，对我隐蔽行军，绕过敌人临时据点颇有帮助，在这三天之内让过好几部分搜查扫荡的敌人。二十日晚到达图佳铁路护山站以西的附近高地。夜间十一时自佛爷岭山洞上方通过图佳铁路，继续向勃利东南大小五站、保安屯前进。密山与勃利之间都有敌军，“扫荡”部队封锁搜查。但都为我方巧妙的行动所让避，并未受到阻碍，得以安全地越过封锁线，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四月三十日宿营密山、勃利交界的老铁仓，在那里发现了我抗联其他部队激烈作战的痕迹。五月一日到达茄子河边宿营，举行了庆祝“五一”突围成功的集会，同日渡河。五月七日到达兰棒山二路军总部宝清的密营留守处，东部突围遂告胜利结束。

当日寇一九三八年加紧封锁包围伪三江省地区时，从十一月起至一九三九年的四月，实际上它把重心转移到牡丹江、

林口、勃利、依兰及刁翎、牡丹江两岸地区。因而下江地区我第五军第三师八、九两团及第七军各师，乃以完达山脉作依据，在饶河、虎林、密山、宝清、富锦、同江、抚远各县进行游击活动。虽然不断地受到敌压迫，接触战斗，但我军建制保持完整，人员损折较少，而敌伤亡损失却数倍于我军。同时我第六、十一各军部队虽有损折，但都陆续渡过松花江右岸，越小兴安岭，脱出敌人包围。敌人的长期准备，要在伪三江省地区“聚歼”和“根绝”抗联游击活动的计划，宣告失败了。这一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在我二路军总部指挥下依然持续。

上面列举的多半是东北游击战争高潮时期，东满吉东、松花江下游地区数以百计较为显赫的战役中的若干战例而已。南满地区第一军占领磐石，袭击清原、金川，攻占三原浦、八道江、凉水泉子等等，以及一九三六年，冲破寇酋三毛司令、伪军司令李树山的“大讨伐”，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我第一路军各部在反“大讨伐”斗争中，歼灭伪军邵本良全旅及伪蒙军索旅，特别是震动伪满的摩天岭一役，全歼日寇全团部队约千人，缴获大炮七、八门。其他如我军进出沈辽及安奉铁路和鸭绿江岸，打了不少恶战，攻破几百个小城镇，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又如我北满抗联两次攻入宾县、占领方正县城，江北方面袭击汤原县城、佛山县、萝北县都曾被我军攻陷。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在松江左岸的铁骊、庆城、东兴、凤山、巴彦、通河县等地区的许多据点为我拔除。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黑龙江平原伸张了游击活动，我三路军攻克德都、讷河、克山，远达嫩江下游的肇州、肇源、肇东

等城镇，均被我游击部队攻占。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在乌苏里江右岸，我第七军攻占东安镇独木河，并在同江、富锦地区拔除不少敌据点。一九四〇年袭击宝清的星河镇等等。这些较为显著的以及其他的一些战例，本文都未能一一加以整理。凡是这些战例，苦战恶斗的实际状况，尤其是寇军成百成百的被我军消灭，在敌人的材料上是不记载的。敌人为遮盖他的败绩，唯恐有伤"大日本军威"，用"讳莫如深"的办法，一律加以掩饰，就连寇军自己无关的部属，亦茫然无所知。我们处在游击运动残酷斗争环境，材料的收集、整理是很缺乏的。抗联许多老同志仗打多了，视为家常便饭一般，打过就忘记。因此直至今日，整理抗联游击战争的史料是艰难的。

结　束　语

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第一、游击战争的特点，战场是孤立的，敌人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因此在战略上我方是防御的，战术上是积极主动，采取有条件的进攻，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保存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为战略上反攻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与全国革命军事斗争有一致性。

第二、军事斗争主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密切配合群众斗争，因此，每一次战斗才能取得胜利。

第三、战术动作上，采取机动灵活行动，用伏击、袭击、夜袭的方法，同时使用数量上优势兵力给敌人以意外打击，

战斗就无不胜利；反之硬打硬攻，消极防守，被动作战，没有不失败的，即使勉强获得胜利，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第四、军队党组织坚强，内部团结巩固（包括民族团结），政治修养好，不断总结战斗经验，提高军事技术技能，加强刻苦锻炼，严肃纪律，凡是这样做的游击部队战斗力就强，能坚持持久斗争，颠扑不破。反之，一遇情况恶化，斗争尖锐，就不能坚持到底。

抗联的历史作用主要是：

第一、十四年的长期战争，东北大部地区，二十多万人口，卷入或直接影响这一场斗争，人民受到革命锻炼，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建立了人民武装，积累了一些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实际斗争经验。

第二、日寇速战速决（两年平定满洲）、以华制华（建立伪满），把东北当作侵略全中国，进攻苏联的巩固后方的战略计划，受到了严重打击，有生力量受到严重损折，牵制了日寇大量兵力，推迟和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的进展。

第三、抗联后期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保存了基本力量，为参加解放东北和人民自卫战争准备了力量，在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回忆陈翰章同志

一九三一年十月，旧东北军吉林王绍南旅之第七团第三营①在延吉起义，建立救国军，人数达数万人，分兵攻敦化日寇。占敦化北山，歼敌数百，攻入城。后不久敌援兵至，救国军撤出。时已翌年初一月。

先是，陈翰章同志自“九一八”事变之日，即在敦化组成反日会，在教师、青年学生、市民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动。救国军建立之后攻打敦化，翰章同志组织群众支援救国军攻敦化。救国军撤离敦化北山时，他毅然参加救国军，在前方司令②吴义成的司令部担任秘书。救国军领袖之一的吴义成，号吴傻子，不识字，大老粗，山东阳谷人。远在一九一〇年前后，为吉林著名土匪王德林的“炮头”（前锋），后随王一起被招安，编入旧吉林军。从救国军起，王德林为总司令，吴任前方司令，所有前方救国军，吴有调动权，作战指挥权。吴为农民出身，但极狡猾剽悍，地主、军阀观念

---

① 周保中同志此处所叙述的“老三营”起义，在部队的番号上有出入，应该是：“第十三旅（旅长吉兴）第七团（团长王绍南）第三营，这是老的番号，后来的全国统一番号为“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此处显然是记忆上有误。

② 当时的正式称呼为吉林救国军前敌总司令。

强烈。翰章同志年青俊秀，能写文章，沉默寡言，但遇事决断、果敢，颇为吴所赏识，吴器重之。

一九三二年夏初，我到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初任参议，实际上迅速掌握了参谋长作战指挥权，并就在救国军中，与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同志胡泽民（参谋长）①、王松柏等组成了党的秘密特别支部。王润成同志也随我到救国军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宣传队长（处长），在宣传队内形成了党的组织核心。

翰章同志不为吴义成小恩小惠所软化，坚定的站稳抗日救国立场，与当时另一姓杨的（后来参加党，又叛变了）和姓李的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记得介绍陈翰章同志入党的就是王润成同志（现名马英，在舒兰煤矿筹备处工作）。翰章同志加入党后，更为积极，受党的嘱咐，要他保持一般群众的政治面貌。在救国军前方司令部，他要担负繁重的秘书工作，并须保持对吴的照常交往。并且，他也参加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到七月间，前方司令部占领安图县城的群众宣传组织活动和发展党员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要参加一些同友邻部队的交涉活动，如反对当时辽宁民众自卫军代表团英若愚（参谋长）、王××（政治部主任）的军阀主义，反对他们向救国军争安图、桦甸的地盘。陈翰章同志不仅在宣传写作上是党组织的一个好助手，并且已能很好的执行党组织的政治活动任务。

一九三二年八月，由于党的积极倡议和军事活动，救国

---

① 胡泽民烈士时任救国军前敌参谋长。

军调集了二万左右人，由我任战地总指挥。以安图为根据地，出兵分攻蛟河、敦化、哈尔巴岭骚扰日寇抢修的京图铁路。敦化县曾两次被我军围攻，并占领了县城，给日寇以重创。翰章同志深入战地，积极参加战斗，表现得英勇顽强。同年十月，救国军五万人，转战宁安，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强渡牡丹江作战中，翰章同志也积极参加。

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日寇集中两个以上师团于牡丹江、宁安地区。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内讧闹磨擦，眼看十万人左右的队伍有垮台的趋势。我那时直接掌握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中党的领导，准备“应变”。然而在救国军中，虽有较完整的党组织，但力量不大，自卫军中则更小。当时象陈翰章同志这样的新党员，已成为对日寇斗争和内部保持统一战线，以支撑全局的重要分子之一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自卫军全部瓦解，救国军领袖王德林、孔宪荣等亦率万余人退逃苏联。党稳住了吴义成所辖前方部队，并且以吴任总司令，我任总参谋长，整顿救国军残部二万余人，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当时，将部队分编为五路，并编李延禄为游击军，重新展开吉东广大地区的游击活动。翰章同志此时仍任秘书，实际上参与了重大的军事行动及党内的策略行动，成为我的有力依靠之一。是年二月底，前方司令部转移到安图吉洞河大甸子。四月攻安图，打下大沙河，占领安图县城，并分兵进出桦甸及吉海铁路沿线。翰章同志此时已是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不遗余力地参加了各种战斗及党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初秋，在救国军中，我党与吴义成的统一战

线已初步呈现分裂趋势。那时我决定留守安图，指挥吉辽地区军事部署，准备分裂后，形成我党单独领导的军队，由我决定把翰章及其他一些同志留在前方司令吴义成的直属部队里。陈翰章同志则由于取得吴的信任，专留在吴的周围，他的任务是：（1）稳住吴义成，继续坚持抗日，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2）留心察看吴本人的变化，若出现动摇投降或逃跑的迹象时，即应作出相应处理，以防将部队带走。一九三三年十月，吴在我东满党和汪清、珲春游击队领导同志的鼓舞下，在绥芬镇(东宁——汪清地界)集中了数千之众，打响了袭击东宁城的战斗。这次战斗不幸失败了。失败后，部队退回绥芬镇。此时救国军内部的分化已经日见明显，一方面是以吴义成为首的救国军中少数有排斥党的领导倾向的领导人物；另一方面是以我救国军中党组织王润成同志、陈翰章同志等及东满游击队党组织为中心的坚持团结抗日的力量；第三方面是柴世荣(当时是救国军第四路军司令)等居中摇摆的势力。内部斗争的结果,因为救国军中有王润成、陈翰章等同志坚持革命路线，柴世荣部队中刘汉兴（陈龙同志）等坚持革命路线，结果使吴义成等少数救国军领导人要想破坏和收缴我东满各县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武器的阴谋宣告失败，这与翰章同志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四年初，吴义成屯兵宁安东部林区，他还以为陈翰章同志不曾参加共产党，是他的心腹可托的人。他派翰章同志去关里，找王德林、孔宪荣，找关里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家，为救国军探听关里要不要打日本的虚实情况，要求关里给予援助。当时我已经从安图转到宁安，驻天桥岭平日坡

工农义勇队。这时吉东抗日同盟军已经成立，我担任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兼党委书记，决心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准备和吴义成救国军分立、破裂。

翰章同志遵守党员的守则，向我报告请示，经过党组讨论后，由我指示翰章同志：（1）可以到关里去，借此以掌握救国军从关里到关外来往活动的线索，并参与其活动；（2）到关里去，在宣传上要坚持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投降不抵抗的罪恶，并说明在国民党影响下的东北自卫军、救国军都瓦解了，只有那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与共产党合作的才保存了抗日武装实力，并重新壮大起来；（3）要尽可能在平津一带找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配合行动……。于是，陈翰章同志就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的资格，到了北平、天津一带进行活动。在北平救国会会长朱庆澜召集的东北支援问题座谈会上，陈翰章同志痛切陈说东北抗日救国军武装斗争现状，并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东北以及旧东北军不抵抗的罪恶，指责在关内以支援东北抗日救国军为名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借名募捐，实同讹诈，发国难财的人们，号召以人力物力支援东北艰苦奋斗的义勇军。由于陈翰章同志短期的积极活动，引起当时平津一带抗日救国组织内部各阶层人们的极大注意，使政治上投机分子和发国难财的人们有所警醒或收敛；而真正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者则大大兴奋，为之鼓舞，更加积极。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翰章同志在天津遇到救国军的领袖王德林。王是一个有救国心肠的老好人，一九三三年初经苏联逃回关内，虽然受国民党西南派

陈济棠之摆布，但仍然继续抗日反蒋。他从南方转到北方，又受国民党和旧鲁系军阀余孽的包围。那时华北旧军阀官僚在日寇政治特务策动之下，有组织“华东共和国”的阴谋活动，以便为日寇进一步分裂和侵略中国的张本。陈翰章同志向王德林指出，不要被拉进那个圈套。翰章同志并在天津、北平一带的东北同乡青年知识分子中，阐明东北人民武装抗战的重要性和必胜信心，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

翰章同志从王德林手里得到关里捐助东北的大洋八千元。王德林颇有自知之明，他告诉翰章同志，有些自卫军、救国军的领导人，借东北抗战之名，在关里到处募捐肥己，有的仅以所募捐的百分之几、至多十分之一汇到东北去给自卫军、救国军。而在东北的自卫军、救国军的领导人，其中又有很多接到募款后，反而又把它重新汇回关里落入私囊。这样的坏现象，引起翰章同志的极大不满。因此，他决心不让这八千元抗日募款落入那些利己者的腰包。大概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底，翰章同志回到东北宁安，先到吉林抗日同盟军军委，向我报告了入关三个月的活动经过，并坚决主张把带回来的八千元募款交给军委。当时由我决定接受了这笔款项。问题不在钱多少，而在政治意义方面作用甚大。因为当时在同盟军影响下的救国军残余部队和其他抗日队伍，对关里国民党抗日，对救国军领袖抗日仍然抱着幻想。翰章同志由关里回来后，我们就利用这一行动，在牡丹江、宁安、敦化一带各抗日队伍中召开群众大会，散发募集的款项，近者每人一元，远者慰问，充分揭露关里关外、南京政府、西南派、天津和北平救国会中的国民党右派和其他投机分子，假借抗

日发国难财的各种丑行，指出全国人民是抗日的，中国红军是抗日的，关里人民是同情和用实际行动支援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就是要东北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后将击败日寇，收复东北失地，解放东北人民。翰章同志作了很大政治鼓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多动摇的抗日部队群众稳定了，积极性加强了，党的影响扩大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党决定翰章同志脱离救国军吴义成部。在正式脱离吴部之前，为了表明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诚意，党指示要翰章同志回到吴义成司令部，交代去天津、北平经过，以及带回的募款交吉东军委发给就近各部队的情形，恳切的劝告吴义成坚持抗日，并与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陈翰章同志执行了党的指示。当时吴义成虽衔恨入骨，恨不能吃周保中的肉和杀陈翰章的头，但是迫于正义的压力，有士兵和干部的拥护，不能不强为容忍。翰章同志从此脱离了救国军，被党派到抗日工农义勇队去做政治领导工作。

抗日工农义勇队，是当时同盟军的有力支柱，总队长是李荆朴同志（现任沈阳军区某步校校长）①。他原是宁安县的警察巡长出身，“九一八”后，因反对降日，而被日寇捕去，后来逃出拉起很大数量的反日山林队，报山头“平南洋”。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在东京城、宁安一带，有很大活动力，党派于洪仁同志到这支队伍里去作党的秘密工

① 这是周保忠同志撰文当时李荆朴同志的职务。

作，李荆朴接受党的领导，愿改造自己的部队。后来党加强该总队党的干部，又派了张建东、陈翰章、王光宇、陈明雅（陶净沣）等十几名有力干部去该队进行改造教育。在长期对敌和对内部斗争中，这个部队已经到了改造成功的程度。但是，由于李荆朴同志当时还迷信个人影响，不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不开除混到党内来的第六队队长。结果第六队队长勾结早已被驱逐出队的另一队长——日本内奸戴海亭进行秘密活动。一九三四年八月，工农义勇总队全体党员团员开会的时候，为反革命暴动所袭击，当场打死了党委书记于洪仁同志，李荆朴、陈翰章、王光宇等以下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被解除武装。这次反革命暴动只是数百人里的十几个凶手，所以当时李荆朴、陈翰章等同志被放走，回到吉东军委，又重新武装起来，积极打击敌人，创造新的吉东游击队。新的游击队的创立，和后来的壮大，主要是由于陈翰章同志及其他党团员、革命老战士的努力战斗，孜孜工作的结果。

一九三五年初，编抗日联军第五军。陈翰章同志任第二师参谋长（兼党委书记）。一九三五年底党派他担任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副师长侯国忠同志（后战死），政治委员王润成同志。一九三六年该师改为二军五师，翰章同志仍任师长（兼党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五月南满辑安会议，将第一路军第一、二军合并整编，翰章同志改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直到一九四〇年作战牺牲。

一九三五年初秋，陈翰章同志的父亲和妻子为敦化日寇拘捕，并强迫敦化士绅连坐，强迫其父把他找回来，投降伪

满有重赏重用，否则杀其父，连坐保人。陈父迫于淫威，带着陈妻辗转到宁安陡沟子（图佳线）附近见到陈翰章同志诉说来意。陈翰章同志在家是有名的独生孝子。“九一八”事变以前对父亲百依百顺。但这次见到父亲，态度非常坚定，不顾一切，坚决拒绝日寇的阴谋诡计。他安慰了父亲，并告诉妻子回家后即改嫁他人。陈翰章同志就是这样以“义无反顾”的坚决态度遣走了父亲和妻子。自此以后，他与家庭完全断绝关系，从不闻问。

一九三六年间，日寇不断向抗日联军发动政治攻势，想从思想上瓦解抗日联军。他们派出各种人物，散布各种流言，并利用日本社会党政治浪人雄谷进行“微妙”活动。驻宁安日寇宪兵在浪人雄谷的配合活动下，在廖家船口找到了老廖头（地主、两面派）。这个日寇的忠实走狗向我军散布空气，说日本要人要见抗日联军领导人有重要谈话。那时陈翰章、侯国忠同志的部队正在宁安东南活动。翰章同志得到日人要求见面的消息，报告到五军军部。那时我决定，派翰章同志去接见，并指示注意事项。陈翰章同志布置了警戒，在唐头沟东山接见日人雄谷（自称雄谷太郎）雄谷一见陈翰章同志，甚为客气，并致敬意。谈话一深入，他就露出日本社会民主党改良派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套“理论”，并向陈翰章同志提出：（1）抗日联军力量不能胜任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徒然破坏社会物质基础；（2）在满洲应借日军帮助，建设新社会，改变旧面貌才是进步；（3）积极与日军合作，建设满洲国，其发展前途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这与共产党的目的是殊途同归的；（4）

如果抗日联军不愿与日军积极合作，那就退出吉林、哈尔滨以东地区，把力量转移到三江省（佳木斯、牡丹江两岸）地区，在那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雄谷的这一切胡说，引起陈翰章同志的大笑。他义正辞严地指斥日寇侵略中国、侵占东北的暴行，揭露日本统治阶级的危机与日本社会的不稳，自谋自救不遑，岂有为中华民族求发展谋进步之可能！翰章同志声色俱厉地警告日本政治浪人："勿为日本军国主义作鹰犬，下次来杀勿赦，这次宽恕你带着脑袋回去，传话给日本军阀，抗日必胜，胜利的将是中国人民，失败的将是日本军阀。"雄谷饱受谴责之后，唯唯诺诺，抱头鼠窜而去。这次谈话再次证明了当时日寇对抗日联军的全部战略意图是："由南而北，由西而东，将抗联主力诱至三江省地区聚而歼之"。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翰章同志的部队，在敦化南牛心顶子设伏，袭击安图支援讨伐的日寇军一个中队及伪满走狗队百余人，大获全胜。此役打死日寇军官六人，打死日兵七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日军几乎全被消灭。伪满走狗队"作壁上观"，不敢加入作战即逃归敦化。在打死的日本军官中，有一人是日寇敦化县副县长。当时伪军向民众散布谣言，说陈翰章同志用假投降诱捕日寇，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在党所领导的抗联各部队中，在对敌斗争中，什么革命斗争艺术都可以采取，唯独不许可用假投降的手段。陈翰章同志是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和遵守纪律的好干部，他绝不会采取所谓假投降的办法

翰章同志从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年间，身经百战，既英

勇顽强，又机敏灵活，很有军事天才。他不但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钻研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历史掌故、文艺创作，也都有所长，对于革命游击战争理论、战略战术问题都有研究，并能结合实践运用得当。他写了许多党的理论学习、宣传文件和教育材料，个人日记写的也不少，可惜这些材料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翰章同志生活简朴，勤奋，平常寡于言笑，态度严肃。但遇有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谈起来津津有味，滔滔不绝。为争持真理，甚至激昂慷慨毫不迁就与退让。他既谦恭好学，勤问师友，又能亲切耐心地教导自己部下的同志。一九三四年间，他为研究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曾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一九三九年初研究《论持久战》，为之废寝忘餐，对其他历年党的重要文献和指示的研究亦莫不如此。

翰章同志与士兵同甘苦，经常关心战士生活，他的身体并不伟岸硕大，但却精悍结实。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战士不吃，他不先吃，战士不换军衣，他不先换。在地冻天寒、风雪交加的露营生活中，他除了做自己领导上必须做的工作以外，还经常参加战士们采伐柴草，架搭火堆，煮饭融化雪水等项活动。一有工夫，他就在战士中进行文化教育。广大农村抗日救国男女会员以及广大农民对翰章同志是很爱戴的。因为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他本人又善于联系群众，农民都把他看作是自家人。他对部队中的女同志特别尊重和照顾，在她们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男女间关系严格。同志们赞佩他，也取笑他是"圣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曾和女战士

张爱莲结婚的事情，那是不确切的。

翰章同志一九三九年间，应该收集力量，逐渐东移，以便在必要时集中到苏联去，但由于当时总指挥杨清同志正处于敌人严重进攻压迫之下，再则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同志（兼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在安图、桦甸地区也正处于困境，又常常患病，因而翰章同志的部队就不能不加重负担，无论如何必须在蛟河、敦化、额穆、舒兰等地坚持游击活动，同时支援在舒兰五岭一带的第五军陶净湃和曲玉山两个同志的部队。这是陈翰章同志照顾大局，牵制敌人，不断加强打击敌人，誓死不离那一地区的基本原因。

陈翰章同志在救国军中，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对于我党创建人民游击队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军二师有过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抗日游击战争高潮中，给予日寇兵员上的损失和日寇国防建设上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困难时期，他坚持在辽吉地区和京图铁路进行游击活动。日寇在蛟河、敦化、宁安、牡丹江地区的损失也是严重的。这对于活动在伪三江省北部地区的抗联起着支持作用，也掩护了南满抗联部队一九四〇年冬的东移。

陈翰章同志除在救国军参加作战以外，他和他所领导的部队，在抗日游击战中所取得的战绩是数不尽的。从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他直接率领的部队，北起林口、勃利，经过牡丹江、宁安，西南到敦化、安图、桦甸等广大地区，都和日伪军不断战斗过，多数是主动进攻、袭击或伏击。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四年秋，宁安三道河子、团山子、卢家屯

各次战斗；一九三五年敦化东的官地镇、额穆黑石镇，南湖头小沙滩等战斗；一九三六年夏袭击林口龙爪沟、庙岭、前刁翎、三道通；八月袭击中东铁路待马沟车站日寇的东运兵车……这些著名战斗,打死日军不少,缴获战利品甚多。这些战斗有的是与第五军部队配合行动，有的是陈翰章和侯国忠两同志的二军二师部队单独作战。只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宁安西南东京城西的莲花泡战役是失败的。但那次战役的指挥不是陈翰章同志，而是由其他同志的错误造成的。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北起宁安东京城,南到桦甸、安图，并且越过牡丹岭、老爷岭直达舒兰地区，东到哈尔巴岭延边的这一广大地区，陈翰章同志和他的二军部队神出鬼没，不断袭击、攻打、伏击，骚扰敌人，使日寇应付不暇，不仅在兵源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京图、图佳两条铁路经常受到破坏，有时完全断绝了运输。在敦化、宁安地区日寇许多永久性的军事建筑设施被迫停止，其中最显著的是镜泊湖发电站，被迫停工达三年之久。“镜波学园”军事大兵营的建设被迫完全放弃了。

一九四〇年陈翰章同志壮烈牺牲，那时噩耗传来，抗联战士无不悲痛万分。如今事隔已二十余年，翰章同志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特此撰文以表怀念之情。

松 江 长 虹

——袁珍杀敌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以多门师团为主力的万余日寇军队，以走狗张海鹏的降军八千人为前驱，上空有几十架飞机掩护着，从长春大举北进。日伪军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占据哈尔滨的反日吉林自卫军。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哈尔滨市委紧张地向市民进行着反日救国宣传，并在已经组织起来的反日会员里募捐、动员参战，号召保卫哈尔滨，支援正在松花江右岸双城县一带作战的自卫军。

可惜，深受南京蒋介石政府不抵抗和投降政策影响的自卫军首脑们，各有私图，动摇不定；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军队团结、军民联合的主张，没有很好地利用激昂的士气，反而去抑制它。因此出现民族叛徒张景惠敢于公开卖国投敌，使为数十余万人的吉林自卫军前线作战部队崩溃下来，纷纷退走。北满的中心——哈尔滨市也被放弃了。

人人仇恨的太阳旗，插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头顶钢盔，枪上刺刀的日寇兵，到处耀武扬威，横冲直闯。日本宪兵带着“巡警狗”，白天黑夜挨家挨户的搜查，群众一言不

顺就饱受其毒打。青年妇女遭到调戏污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成为被特别追查迫害的对象；敲诈勒索，抢夺居民的财物，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人们在街上遇见日寇兵的时候，必须立正道旁，鞠躬致敬，朗诵："太君大大的辛苦了！"如果你面带愁容或横眉冷眼的话，那么你定会受到一顿拳打脚踢！

三月一日清晨，青年工人袁珍，从江北淞浦镇家出来，去哈尔滨市区马家沟他叔父袁品富家。半路上，在道里花园遇上开庆祝"满洲国建立大会"。

会场上七零八落有气无力地正在喊着："大满洲国执政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等口号。人们被强令"静肃直立，遥拜日本天皇，致敬感恩！"有很多人，忍耐不住，眼泪簌簌地直往下淌；有的人咬牙切齿要往外跑，却被"巡警狗"挡住……

自从哈尔滨被日寇占领后，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亡国耻辱事，都深深地刺痛了袁珍的心。

袁珍的父亲是辽阳人，一九二〇年间在抚顺煤矿铁道当技工。母亲曾在沈阳纺纱厂做过工。父亲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因得罪了日本监工，而被开除。为了寻找职业，父亲和母亲带着童年的袁珍来到了哈尔滨。父亲在江北中东铁路淞浦站当车辆检修工，母亲在纸烟厂做工。

袁珍满十七岁时正在中学二年级读书，因为家境不好无力再继续读下去，就中途辍学去哈尔滨中东铁路机车修理厂当了徒工。他壮实魁梧，聪明好学，工厂里的工人们都很喜欢他。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九一

八”事变前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机车修理厂里有个老技工袁品富，同袁珍的父亲同姓不同宗，两人感情亲密，结为义兄弟。袁珍便把袁品富当做自己的亲叔叔。

袁品富的隔壁住着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工作者绍元同志①，一天晚上，他正在草拟“如何实现东北人民武装反日”的讨论提纲，突然从袁品富屋里传来激愤的语调声。

“不行！我非走不可，这样亡国奴的滋味我实在受不了啦！”

绍元一听，知道这是袁珍的声音，又听袁品富说：“你别着急，惊动了隔壁那位先生是不好的，半夜三更，吵吵嚷嚷，弄出差头，被鬼子把咱们逮去，那就吃不消了。”袁品富解释地说，“既然你父亲赞成你走，我是不会不同意的，不过你是一个青年团员，行动要有组织，何况反日救国是一件艰苦复杂的事情，必须多方商量妥当才行，但凭一股子牛劲，就以为称心如意，那是不成的……”

袁珍不等叔叔说完，抢着说：“横竖我一定要离开哈尔滨，我们团区委的一位负责人，今早到江北去找我谈话，要在我们的地下工人义勇军分队里挑选四个得力小伙，准备派到军队去扛枪打日本，我真高兴极了！但是，区负责人说我是江北‘青工’的组长，又是地下义勇军队长，不能把我调走，我真火了，不管怎的，叔叔得帮我想办法。我若能扛上

---

① 绍元即周保中同志。

枪，包管勇敢杀敌，替民族出气，把日本鬼子打跑，收复国土。”

“党组织不直接管青年团的工作，但我可以把你的志愿向省里的领导同志提一提，也许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绍元在隔壁屋子佯装熟睡，叔侄俩人的对话，全被他听清了，心想：象这样优秀的青年为什么不派他到军队中去呢？若派去，一定会起作用的。

刚天亮，袁珍起床，生火煮饭。

早饭后，袁品富就要走了，袁珍一再嘱咐叔叔：“千万别忘记，三天后，我来听回信。”

“你走吧，年轻人唠叨啥！我得先走，要赶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呢。”

袁品富走后，袁珍收拾好屋子，将秘密文件放进半麻袋玉米面里，扛在肩上，腋下挟着“滑板”和拄棍，锁好房门，便离开了。到了江岸，他踏上“滑板”，在江面的冰道上飞快地往江北岸滑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傍晚，青年团区委会的领导人来到了袁珍家里，“你请求参军，离开哈尔滨，这个志愿虽然值得重视，但是按地下工作需要，区里决定是不能把你调走的。”

袁珍睁圆了明亮的眼睛，漆黑的两道粗眉毛挤上挤下，很不自然地回答：

“嗯，就这样办吧，别看我想不通，为了革命，我什么

都能同意的。”

区委会的同志，紧紧地握着袁珍的手，满意地离开了。

日军趁着冰冻有利于野战行动的季节，沿松花江右岸和哈尔滨以东地区，分两路向自卫军进行新的进攻。

三月二十日的夜半，袁珍正在酣睡，父亲急促地把他摇醒。他惊诧地问：“啥事？爸爸。”

“区里来人找你谈话。”父亲点亮一只小蜡烛。

在闪烁的烛光下，袁珍看清是团区委书记在进门的左侧壁炉旁坐着，脸冻得通红，两手不断地揉搓，吸着烟。

袁珍急着问：“同志！有啥重要事，半夜三更，顶着寒风过江来呀？”

区委书记不说正题，继续抽着烟。

“到底啥事？”袁珍更急了。

“团省委已经决定：派另外同志接替你现在的工作，要你离开哈尔滨，明天就去通知那四个早已准备要调动的同志，分成两组，后天午前一定到江南，你自己一个人到你叔叔袁品富那里，他会告诉你要去的地方，并且有交通员安排你的旅途。”区委书记转过身来问袁珍的父亲：“你看，袁珍是不是可以离开？”

“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商量妥就行。”

区委书记向袁珍说明了这次要派遣他去执行任务的简单内容和重要意义，并慎重地嘱咐：

“虽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但如果你认为有啥困难或者不能去的话，还是可以商量的。”

"既然组织决定，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何况我个人早就有这个愿望呢。"袁珍坚定地说。

区委书记高兴了，拍着袁珍的肩膀，又叮咛了一番。

袁珍的父亲送走了区委书记，感到屋里有点冷。他打开壁炉门，在残余的炭火里添上几块木柴，顺手移过一只小矮凳，坐在炉边抽起烟来。一会儿，壁炉里熊熊的火光照射着小屋。父子俩人都好象忘记了睡觉，默默地对坐着，谁也不做声。袁珍忍耐不住了，向低头沉思的父亲说：

"爸爸，我以为要离开哈尔滨是不会有希望的，可是今晚得到这个好消息，真高兴极了！您为什么不吭气，难道后悔了么？"

"不，一点也不后悔，我一直愿意你远走高飞。"父亲忽然精神抖擞地站起来，用烟袋指划着说：

"救国是大事，鬼子侵占我们祖国的大地，要把我们同胞当牛马奴隶使唤，这是经过了好多年向我们一步一步逼近的。如果不是地主、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欺压老百姓，如果不是买办大资本家卑鄙倒灶，献媚外国强盗，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投降，不卖国，那么日本鬼子也不敢这样大胆地侵占我们祖国土地，祸害我们同胞。"他的语气越来越沉重，"孩子，我高兴你离开家。莫说你们青年小伙，就连我，在心里也时常盘算着说不定那一天，即使手里抓不到枪，也得抡起斧头、铁棍同敌人拚斗一场。"他的话停了一下，"孩子，你就收拾收拾离开哈尔滨吧！可就有一件事使我放心不下。"袁珍的父亲沉默了。

袁珍不解地问：

“啥事？”

“前年给你订婚的时候，你总是埋怨我和你妈妈，说我们是老封建，包办婚姻，男女双方都不愿意，硬要退婚，如果那时退了婚，现在不就好了吗？但是从去年年底，你和桂贞难分难舍，厂里的男女工都当笑话传。现在你走了，她能安静地呆下去吗？”

“您不知道我和桂贞为什么起了变化，我没有告诉您。去年十月鬼子打到嫩江桥的时候，‘老巴夺’烟厂开会支援抗日，桂贞被厂里青年女工选为职工会的代表，在区里讨论青年工作活动的时候，我和她常常碰到一块，说也奇怪，从那时起我俩闹离婚的恶感一点也没有了，感情反而亲密起来。有一次区委的一位同志向我俩开玩笑：‘反日战友的钢绳子把小两口绑在一起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时间找桂贞当面说说，写一封信，请您交给她。桂贞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她是厂里妇女反日会的活动分子，因为她是有品德又有本事，我深信桂贞是能够踏踏实实地站稳脚步的，请爸爸不必有什么顾虑。”

袁珍的父亲幽默的说：“哦，原来如此，既是这样我和你母亲就放心了。我这个封建佬，从前是包办婚姻的穿针引线人，现在成了你们革命夫妻的传书递信人了。”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们年轻人，也懂得怎样去处理个人的事情。”袁珍羞涩地说。

的确，袁珍家里在一夜间，出现了慈和爱，忧虑和激动，轻松和愉快的各种感情。

隔了一天，袁珍按预定时间到达江南他叔叔家里，接受

了地下党负责人给的行动指示，乘坐东开的火车离开了哈尔滨。

三月下旬，向东进攻的日寇，好象执行预定的军事演习实施计划一样，以走狗军于深澂部队为前驱，而日军的主力紧跟在后面，压迫着宾县、延寿一带；另一路寇军沿着中东铁路东线阿城、珠河前进。在战区的某些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枪声和炮声，天空中的敌机盲目地到处轰炸。吉林的自卫军与敌人稍一接触就向后退。广大地区的居民却遭到侵略战争的灾殃。

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在反日军队中创造反日武装的核心力量，在自卫军里一个要求走彻底抗日的革命路线的步兵团，是着手工作的对象。省军委书记绍元同志，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前往哈尔滨以东地区进行活动。

绍元到达珠河县以后，看见从车站到县城都是日寇军队，势态显得很紧张。地下党委把当地的一些情况通知了他，他即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袁珍是在二月二十二日到珠河下车的。地下交通员引他到车站后面一家大车店住下，他已乔装为苦力工人的模样，在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他肩上搭着两条麻袋腰上围绕着一条粗麻绳，在大车店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懒洋洋地走着，手里攥着一个苞米面窝窝头，边走边啃，眼睛不住的东张西望。突然对面来了一个熟识的人，他不自主地惊慌起来，停住脚步，心里想：为什么住在哈尔滨他叔叔袁品富隔壁的那个可疑的教书先生在这里出现了呢？袁珍心里正

在继续思索，但是那个熟识的人表示出很平淡的样子向他打招呼：

“张老师今天没什么好活干吗？天已晚了，还是回到咱们堆栈里去吧！”

袁珍一愣，这是规定的接头暗语，但他立刻心里醒悟似的平静下来，回答说：

“好吧，就到你们堆栈去吧！”

袁珍跟在绍元后面向北小道街走去。夕阳在他俩前面极远的方向渐渐地下垂到地平线上，远近的村落缭绕着炊烟，从遥远的珠河县街和它周围的村镇传来马的嘶叫声，群犬的狂吠声，在人声嘈杂里有尖声，嚎啕声，看光景这又是侵略者的军队宿营引起的骚扰。绍元引袁珍走到一片谷地里，望了一会儿星星点点各自独立的农户，然后他俩象被邀请的熟客一样，一直向一家朝鲜族农民家走去。女主人操着流利的汉语欢迎客人进屋。他俩分坐在小炕桌的两旁。女主人热情地向客人问候，并且把早有准备的一大木盆热气腾腾的苞米楂饭端到炕桌上，拿过两个大铜碗和铜匙子摆在客人面前，接着就是一土瓷盘满盛着大葱煎鸡蛋，堆尖的一大碗腌辣白菜，又一大铜碗白开水汤——摆满了桌子。女主人慰劳似地请客人用饭。

袁珍边吃边说：

“说真的，你虽然是我的老熟人，在哈尔滨我就不相信你是什么南蛮子草药医生或教书匠，我怀疑你是日本鬼子的侦探，你的真实情况我叔叔从来不肯向我透露，因此今天在珠河车站碰见你的时候，使我十分诧异，我判断你一定是日

本鬼子的狗腿子，盯梢跟我到珠河来的，我当时心里盘算把你揍死再脱逃呢？还是不理睬你，赶快脱身为妙？主意还没有打定，忽然你用规定的暗语向我打招呼，我仍然有怀疑，但我不能不大胆地答话……”

“你什么时候到珠河？看到些什么？”绍元问道。

“昨天上午十点钟到珠河下车，住在一家大车店，听说日军主力和于大头的走狗军往延寿和方正开去了，后续部队昨晚和今天还有到来的，这次寇军决心要追上自卫军，把他们通通消灭……”

绍元吸着烟，倾听袁珍激动的叙述。

“昨天下午，差点儿出了乱子。”

绍元急问：“出了什么乱子？”

“昨天午前交通员送我到大车店住下，觉得大白天蹲在店里没事干，反会引起坏人的注意，因此决定到街上走走，看看光景。当我路过十字街口的时候，那里聚集着一大堆人，看样子又是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欢迎日本皇军大会’，会场上人们虽然手持各种颜色的小旗在摇晃着，但表情是十分冷淡的，有几个日本军官和‘维持会’的士绅在台上轮流讲话，会场周围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巡警狗’把守着。鬼子军官讲完话，几个鬼子和‘巡警狗’搬出了几只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箱，从里面拿出很多糖果，还有针、线、一盒一盒饼干、小纸本、铅笔……向参加大会的群众挨个分发。据翻译宣布说：这是大日本天皇所赐‘日满协和’的赠礼。我也得到一条小手巾和一支铅笔。正在要散会的时候，县街南头突然‘砰、砰、砰’发出几排枪声，人们惶恐地向四面八

方乱跑开了。枪声很快就不再响了，街上呈现出一片静寂，除了日寇兵来往走动以外，居民几乎没有行走的。

“与其说我为好奇心驱使，不如说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我就大着胆子往南街走去，希望能在枪响的方向看到些什么。当我走到距离南街口外数十步远的地方，蓦然发现鲜血淋漓染满全身的两具男尸横在道旁，十来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尸体附近走来走去。其中一个日本鬼子正在用脚不断地踢那两具死尸，好象踢皮球一样，并且做着鬼脸向其他的日本兵开玩笑。四个‘巡警狗’分做两组站立在尸体南北方向，好象在封锁行人的样子。我当时料定这两个死者一定是刚才枪响时被日寇残杀的，我立刻觉出自己的脸、手发烧，心头涌起愤慨的火，但是我暗自吸了一口气，正想转身照来路往回走的时候，头顶‘哧溜’一声飞过一颗子弹，是一个日寇兵向我开了一枪，接着几个日本兵咿哩哇啦叫嚷着向我追来。我拔腿就跑，钻了好几条小巷，一口气跑出了东城外，背后没啥动静，我才放慢了脚步。”

绍元听得入神便插问：

“你后来往哪里去了呢？”

“因为地方生疏，没有个另外的落脚处，天色又已经傍晚，我寻找方向，又回到大车店住下。店客拥挤，大家唧唧哝哝在谈论今天珠河街发生的事情，有的用叹息的语调，有的人表现出愤怒的心情。靠近我的铺位的一位长者，回答了我的问话，我才明白，被日寇打死的那两个居民，其中一人姓王，是因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前曾经揭露过在珠河开当铺的日本人小林如何重利盘剥，如何仗势欺诈居民，并同小林

打过架，他怀恨在心。现在日本军来了，他气焰嚣张，到日寇军宪兵部队诬告姓王的是当地仇日派领头人，因此姓王的就被日寇宪兵抓住枪毙了示众；另一个被害的是一个小学教师，曾经在姓王的被捕以后，到‘维持会’要求士绅们去保释他。小学教师义正辞严的责备‘维持会’，不是维持中国人的生活秩序，而是维持日本侵略者对人民横施蹂躏的秩序。就这样，小学教师也被日寇宪兵抓去，同姓王的一块枪毙了。自从出了这件事，全县居民心里都愤愤不平，但谁也不敢多嘴多舌……”说到这，袁珍气愤地攥紧拳头往小桌子上狠狠一砸：“说真的，当我看到两个死者的惨状和鬼子兵象畜生样儿的时候，我真想同日本鬼子拚命算了，可是我又不由自主地命令自己忍气吞声向后转走了，我的脑顶上竟因此飞过来一颗子弹，假使枪口稍稍低一点的话，不正把我的脑瓜盖揭开了么？那不就白白送死了吗？！”袁珍睁圆了眼睛又补充了一句：“真气死人！”

绍元弹去烟头上的灰，仿佛讲演似地向袁珍说：“同志，你何必上火，为革命牺牲这是必不可少的，但要看死得是否有价值。你不能拿一把削铁如泥的降魔宝剑，去乱砍你路上遇到的顽石。你的大胆勇敢，而又机敏，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是为同志们所重视的；你虽然没有进过大学堂的门，但你写的工作报告和宣传单是那样的通俗明了，生动活泼，有很好的革命文气。然而你有缺点，你象梁山泊好汉李逵一样，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就抡起板斧乱砍一顿，这对于革命的地下工作是不好的。张飞什么时候粗中有细，什么时候就打胜仗，什么时候使性子“暴虎冯河”，就坏了事，连脑袋都

搬了家。”

袁珍把刚才的激动心情转为沉静，注意倾听绍元继续说下去。

“看光景，自卫军是不会有什么认真的抵抗，日寇军将继续东追，这就造成我们要达到的工作目的，将有很多困难。你作为工作小组长，要使用你的聪明和机警，在情况复杂里考虑自己的行动，千万别忘记：混杂在敌军作战行动地带，进行我们的工作活动，是带有危险性的，一切必须估量到可能碰到的危险，也就是要在不可避免地出现危险的时候，必须能够脱离危险。”

谈话兴趣正浓的时候，女主人同着一位珠河地下党负责人走进屋来。女主人从炕头搬出两床破旧的棉被给客人铺在炕上，向客人说了声明天见，就出门往隔壁屋去了。地下党的同志向绍元介绍了情况和商讨了工作。不久，便告辞走了。

绍元再一次向袁珍说明，这次要到自卫军去的具体任务：将在自卫军的一个步兵团里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组织，在全国范围展开军队革命化，实现彻底反日的活动。袁珍是这个核心组织成员之一。他们商量了当前的一些行动计划，快到半夜就都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女主人从隔壁屋把准备好的早餐送过来。袁珍和绍元吃过早饭，化装为小商贩的模样，离开了朝鲜族农民的小村，奔向大道，混杂到日寇行军纵队后尾，跟随着民间运输大队向延寿去了。他们傍晚便到达了延寿县城。那里寇军活动频繁，居民秩序混乱，谣言多，人心惶惶

不安。根据可靠的消息判明：日寇原来打算把自卫军主力压缩到方正及其以东松花江右岸狭长地区，然后加以歼灭。但是，自卫军在敌人未到时放弃了延寿和方正一带的抵抗线，继续顺江右岸向东退走，敌人急速地向东追击。在珠河一带集结待机的日军，也沿着中东路向东进击。看样子寇军的目的是要占领松花江右岸的依兰县和中东铁路东线的牡丹江市——南北呼应，组成沿牡丹江通到松花江的一条战线。后来的情况发展证实，就是这样的。

事情出乎意外，中共满洲省委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求绍元赶回哈尔滨。因此，绍元紧缩在自卫军中的工作活动范围，指派了袁珍坚持执行东去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在自卫军中，找到做工作对象的部队去开展活动。

三月二十四日黎明，绍元带着一个从比利时回国不久的留学生，和一个皮鞋工人返回哈尔滨去了。袁珍感到接受独立工作的事情是很突然的，但他并不着慌，并不犹豫，和同组行动的另外三个同志商量了行动计划。他们分成两组，冒着满天弥漫的大雪，顶着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刺痛肌骨的狂风，迈向目的地——依兰地区去了。

袁珍和他的同志在寇军前进部队和运输队的间空里穿插着走，有时必须避开大路另寻小路绕越行进，有时必须夜间行走。饮食住宿失常，疲乏和紧张交错着。这样旅途的艰苦，袁珍虽然未曾经受过，但他好象一个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老战士一样，艰难、困苦、危险并没有使他低头，他的精神仍然是饱满的、愉快的。一到远离大道不为敌人注意的地方，他就低唱着流行的歌：

黑水、长白是祖国壮丽的河山，
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三千万，
那能忍受倭贼侵凌摧残！
大家起来斗争，救国保家乡。
……

经过四天多的曲折复杂的行程，袁珍和同伴到了松花江右岸、大罗勒密附近，和同组的同志们接头，并在那里打听消息。据说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到依兰江西岸，袁珍估量日军占领依兰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再顺着敌军前进的大路去依兰寻找工作对象的自卫军部队，结果会是白费，不如舍弃大道，改走江道，赶过敌人先头部队，绕往自卫军的后方，这样就可以绕越敌人警戒线；同时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依兰以东，接近工作活动的目标。

袁珍和同伴往西走了三十多里，到了江岸小镇德莫力附近，得到地下“反日会”的帮助，坐上为他们准备的爬犁出发了。

大雪纷飞，风的狂吼在夜间显得分外凶猛。气温骤然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马不停地奔跑，汗水如注，皮毛光滑的身躯冻结着串串冰柱，宛如琉璃珠子，挂满了全身。冰串相互撞击，发出细碎的叮铃当啷的响声。他们倾倒歪斜地挤坐在爬犁上。

约七、八个钟头，走了一百五六十里的途程。东方出现微白，驭手用长鞭遥指着十里左右的地方，小声说：

“那就是依兰县街，在我们右侧江岸前面鸡叫狗咬的那

个村子，就是牡丹江西岸的马家大屯了。”

袁珍心里发生惊异：为什么战争中心地区，昨天下午还可以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大炮轰鸣，和飞机扔炸弹声，而现在却是这样沉寂？难道敌人已经占领了依兰重镇，自卫军又退走了吗？既然如此，也得越过依兰深入到后方去。袁珍知道这是旅途的重要关头，不能松懈。他向驭手和同志们说："我们必须再紧赶一段路程，越过依兰以后，再找地方打尖（吃饭）。”大家非常赞同，振作起精神，继续赶路。

忽然江右岸响起几排枪声，子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驾爬犁的辕马被打倒了，拉套的马也摔倒在地，爬犁翻了。驭手急忙卸下被打死的辕马，狠狠抽打另一匹马。马拉着翻过去的爬犁，刚刚跑几步，突然，第二阵排枪响了，两颗飞弹击中了袁珍的右腿，只听“搀”的一声，袁珍从爬犁上跌下来。接着，马又中弹倒在地上。大家惶恐地向袁珍围来，其中一个同志撕下一块包袱布给袁珍包扎流血不止的大腿。他们搀扶着袁珍向江北拚命奔跑。这时天已大亮，十几个双手持枪的日本兵，包围过来。袁珍清楚地知道，虽然伤了不是致命的地方，但若脱逃是困难的。他不忍心同志们为救助他而被拖累，以至完全落入敌人魔掌。他拒绝搀扶，告诉副组长带一个同志去执行任务，另一个同志同着驭手反回方正，向哈尔滨联络站报信。他竭力地推开同志们，命令他们分头逃跑。袁珍跑了几步，摔倒在地。这时敌人上来了。

十多个寇兵不去追逐分头逃跑的四个同志，而把他一个人团团围住，嘴里唧唧咕咕问话，用枪托和拳脚踢打着他。

这时的袁珍现出安然无事的样子，好象一块钢铁的砧

子，任凭寇兵捶打。

日军带着胜利的骄傲，象豺狼一样，连拖带拉把袁珍押到马家大屯去了。

日寇认为袁珍现在是他们重要虏获物，将从他的身上得到“理想”的东西。宪兵严刑讯问，袁珍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无住所的小商贩。日寇逼迫他说出同行的人们的来历和去向，他严词拒绝招供，推说和他们素不相识，只是在途中搭载偶然碰上的旅客。日寇部队长大发雷霆，拳打脚踢，并吩咐鬼子兵卒向袁珍鼻孔里倒灌辣椒水，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胸和背，用木杠压他的两肩和两条腿。袁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终于不省人事，昏厥在地。

当袁珍被凉水浇泼苏醒过来的时候，一个宪兵少尉，离开座位，亲自扶起袁珍，给他解去捆绑的绳索，要他倚靠着墙壁坐在一块板上，接着用生硬的中国话和蔼地说：

“你的同伙的四个人，跑脱一个，三个人通通的被抓住了。你说实话吧。哦，是不是肚子饿了想吃饭？”

袁珍点点头：“嗯，吃点东西再说。”

少尉叫一个兵卒端过一大碗用开水冲开的麦片粥。袁珍接过来，很快就把他吃完，向那个少尉说：

“大大的谢谢！”

少尉微笑了。

袁珍早就识破少尉的奸险，他心里想：四个同志可能脱险了，即使有人被抓住，也不会叛卖祖国，向日寇低头，万一真的有人被捕变节，也不能动摇我自己的革命贞操。袁珍在暗笑宪兵少尉愚蠢的诡计。

“是时候了，照直说吧，大日本皇军是来帮助满洲建国的，黄种人自强是我们神圣的任务，大鼻子红党，中国赤匪，我们统统的反对。日满协和，太平日子就有的，你要说实话，好处大大的有——快说！”日本宪兵少尉指手画脚，象训话般地向袁珍说了一大堆。

袁珍带着十分疲困的神情，喘息着向少尉回答：

“我愿意都说出来，但是伤口十分疼痛，稍稍歇息一会儿才好。”

“好吧，就让你歇歇，你生翅膀也飞不了的！”少尉说着用手一指，叫两个宪兵把袁珍带到东厢房的一间小屋里。马上来了两个哨兵，一个在门外，一个在后窗监视着。

袁珍料到事情已经陷入绝境了，总得设法寻找机会逃脱。快到中午的时候，袁珍虽然不能往外瞻望，但听到不远的大道上发出大批军队向东行进的沉重的脚步声，夹杂着炮车、汽车、大车的隆隆声。袁珍认为依兰已经失守，心里有些难过。散驻在这里的日本宪兵，虽然动作并不紧张，但已在作移动准备。袁珍心里着急，虽然自己的腿负伤两处，但未伤筋动骨，还可以跳跃奔跑。他正打算冒着最大的危险从后窗逃跑，突然一个宪兵军曹闪进屋来，手里拿着绳索和手铐要给袁珍上刑，袁珍央求着说：

“你们不是叫我要说老实话吗？请你去禀报太君，我现在就说。”

军曹让两个哨兵把袁珍架到上屋。

宪兵少尉改变了以前的态度。袁珍一跨进门，他就声色俱厉地说：

“再没有时间拖延了，若不说实话，归顺满洲国，报效大日本皇军，就要砍掉你的脑袋！”

“一个破产失业的小商贩，要到富锦去投亲靠友找活干，这是已说过的实话……”袁珍睁圆了眼睛大声地回答。

“八嘎，胡说！”少尉跳下炕，一拳向袁珍劈面打来，袁珍头一偏躲过去了。少尉如饿狼一般，怪叫几声，指挥手下的人给袁戴上手铐。宪兵军曹在一旁抽出亮晃晃的马刀，袁珍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便使尽全身力气，从两个哨兵挟持中挣脱出来，飞起左腿，正正地踢到军曹的右腕上。军曹手一松，马刀落地。袁珍抢夺到手，猛地一刀劈去，少尉的脑瓜盖削去了大半边，登时倒地死了。七、八个日本宪兵慌做一团，用枪刺和马刀向袁珍乱砍，都被袁珍搪过。小小的屋子变为激烈的战场。

袁珍从小就跟父亲学过少林寺派的拳脚棍棒，使刀弄叉，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大显身手。宪兵军曹也被劈死了，其他的几个宪兵有的被削去一只手，有的负了轻重不同的伤。日本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大大丢了魂。最后从另一个小院落跑来两个宪兵军曹，用手枪连发十数响，将袁珍打倒，但是袁珍的两眼发出炯炯的光亮，呼吸还没有停止。

日寇宪兵抓来村里的六个农民，强迫他们卸下一扇门板，要他们带上大锄头、鹤嘴镐。袁珍被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日寇从大屯调来一排人，在前面开道，农民抬着门板上的袁珍横穿大道向松花江走去，一群宪兵象送丧一样的跟在后面。

袁珍的头、脸、全身染满了鲜血，他张开嘴唇想要说

话，但被勒紧的脖颈发不出嗓音。他心里很明白，他将离开亲爱的祖国，自信自己的血不会白流的，所可惜的是过早的牺牲，没有给祖国河山收复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样的表情是抬着他的农民们从他微微转动着的眼神和平静地呼吸里看出来的。

袁珍被抬到离开小屯三、四里的江心，日寇指挥农民把门板放下来，要农民动手在冻得厚度几乎有一公尺的江面上凿开一个大窟窿，下面水流湍急不断往上涌出，这时在门板上捆着的袁珍突然从沙哑的嗓子里高喊：

"中华民族革命战争胜利！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袁珍的行动，引起敌人的各种不同的反映。有的似乎在默默赞佩，有的发出狗吠狼嗥的仇恨声。

一个身躯粗大、形态丑恶的宪兵举起锋利的马刀，对准袁珍的脖颈砍去。英雄的头颅飞离了躯体，满腔的鲜血，溅注着松花江的冰流……

几个鬼子宪兵将袁珍的尸体连门板一块儿推入冰窟窿里去。英雄的头颅被宪兵用两条重叠着的麻袋包裹起来，带到上司那里去请功。以后，悬挂在依兰市街，显示"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

被迫参与埋葬袁珍的农民，为英雄的气概深深感动，他们仇恨寇兵的残暴，他们忍受着痛心的眼泪，回到村里，把烈士慷慨就义的经过遍告深受苦难的同胞们。

松花江上年年出现的长虹，是烈士爱国捐躯的光荣的伟大的象征。不到两年的光景，在松花江两岸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游击战争。爱国的工、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踏着烈士的血迹，向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一九五八年

抗日小英雄姜墨林

牡丹江边出英雄

黑龙江省有条牡丹江，江水清澈见底，由南往北流去。牡丹江两岸，有着广阔的原野，长白山脉起伏的山岗和原始森林。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广大的各兄弟民族的人民，虽然处在旧中国封建统治的压榨下，然而他们还是勤奋地劳动着，生活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各族人民，在这个地区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坚决有力地回击了侵略者。

牡丹江两岸的宁安县，有个地方叫做“红土墙”，那里有一带红色的山岗，这就是抗日小英雄姜墨林的故乡。早在宁安的时候，我在吉东抗日同盟军军委工作时，就认识了姜墨林。他人小、胆大、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二十多年过去了，烈士的高大形象、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姜墨林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漆黑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对机灵的大眼睛；只是个子不高，总不肯长，而且身体很瘦，

和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比较起来，显得又瘦又小。但是，他却很有力气，爬山上树，更是飞快、利落。

一九三二年，姜墨林十一岁的时候，参加了地下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他人虽小胆子却特别大，又聪明、机智，意志坚强，地下党委很爱护他，把他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经常派他到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去，与那里的地下组织联系，传递信件和消息。出入敌占区，是一项艰巨危险的工作，但姜墨林却热爱这项工作，从不畏惧。别人听了伸舌头的事情，他却觉得平平常常，一点也不在乎，尽管情况恶劣，他仍然坚定地工作着，从来没有耽误过工作任务。他喜欢跳舞，唱歌，一有机会，他还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因此，姜墨林的红色的名声传开了，引起了日本鬼子和伪满特务的注意。

这时，地下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姜墨林，宁安县委领导同志把他找来，对他说："你的名声闹大了，太红了，小鬼子要逮你哪！"

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不怕，他们逮不住我！"

"问题不是怕不怕，你还要做更多的抗日工作。"县委同志似乎发觉自己的态度太严肃了，停了一会儿，又亲切地解释说："小兄弟，胆大轻敌也不好啊，容易闯祸。这样好不好：你还是换一个地方，到咱们部队里去吧！……"

初出茅庐，后生可畏

一九三五年初，十四岁的姜墨林参加了党直接领导的吉

东抗日同盟军绥宁游击队，并且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向党宣誓：不怕流血牺牲，一定把日本侵略者扫光！

姜墨林心情舒畅，胸脯也挺了起来，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愉快，服从指挥，遵守纪律，样样都好。可是，他究竟还是个小孩子，有时免不了耍顽皮。

姜墨林在“红土墙”工作的事迹，自然也传到了部队。可是有的同志，却不太相信：“瞎吹牛，个子和步枪一般高，能有那么大的本事？”有的战士赌气对他说：“回到你那‘红土墙’去吧！”这可把姜墨林气坏了，他鼓足劲头，勤学苦练，学文化不到三个月认识了一千来字，半年后就能够写文章了；学习军事技术进步也很快，机枪、步枪射击准确，撇手榴弹也和老战士不差上下；至于伪装，超越障碍，更是灵巧。战士们对他的看法虽然有了改变，却还是说：“了不起是了不起，没见他上过火线，听见枪响还不给吓跑了！”

不久，姜墨林头一次上火线，却出人意外，是那么勇敢、机灵，就象个小老虎。

有一次，抗日联军第五军有三、四百人的一支部队，在镜泊湖北边的杨胖子沟，与兵力相等的三、四百个鬼子打响了。姜墨林伏在地上，不慌不忙，放一枪就打死一个鬼子。后来，他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军官，在前面摇摇摆摆地扛着一面膏药旗，嘴里哇哇地叫着冲过来。姜墨林沉着地取出手榴弹，照直掷过去，随着爆炸声，鬼子军官倒了下去。

战斗胜利结束了，抗联五军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在

部队的评功大会上，同志们都说姜墨林的功劳大。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小看他了，战士们说他“真有种”，“人小胆量大”，政工人员说他：“初出茅庐，后生可畏。”政治处长拍着姜墨林的脑袋，笑咪咪地说：“这小子真了不起，应该表扬……”姜墨林心眼里可乐坏了，活蹦乱跳，又唱又闹……青年人嘛，就爱听这个。

小英雄当小队长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抗联五军军部直属部队转战在宁安南边的老松岭一带。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也和五军在一起行动。

这时候，那位平日活泼愉快的小英雄，忽然间变得闷闷不乐，愁眉不展，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部队扩大了，姜墨林被调到五军军部直属教导大队，并且当了一名小队长。他觉得，当个战士可以自由自在，一身轻松，有点顽皮捣蛋，还没多大关系，既然当了小队长，一切行动要起模范作用，光管着自己还不行，还要管着一、二十个小伙子，再跟谁去耍顽皮？姜墨林思想斗争了一番之后，还没想通，便去见大队指导员。

“指导员，不要叫我当队长，我还是当个队员……”

“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也没有，就是不想当队长。”

指导员心里明白了，态度很严肃地说：“哦，原来是因为负担加重了，不能自由自在，调皮捣蛋了，对不对？小老

弟，你是共青团员，老背着一百斤，给你背一百五十斤就不行了？要扩大自己，消灭敌人，这话怎么说？同志，要不断提高自己，想办法当好小队长啊……”

姜墨林接受了党的教育，愉快地担负起小队长的职务。他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尽一切力量关心战士，服装、武器、吃、住、行军他都管，结果管得很好。用指导员的话说：“他完全可以胜任小队指挥员的工作。”

双河镇痛歼日寇

十二月下旬，大雪覆盖了原野和山岗。森林中的积雪有一丈深。气候十分恶劣，不断有风暴——刮起“大烟泡”来，飞雪遮天盖地。这时候，敌人派出了大批兵力，来“围剿”抗日联军，敌情很是紧张。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抗联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二军一部分队伍混合编为一个行动部队，决定突袭延吉县双河镇的敌伪军。这支部队，包括姜墨林所在的教导队，统一由二军二师副师长侯国忠同志指挥，从宁安县南百公里的平岗密营出发，翻过大雪积压、满山密林的老松岭，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在天将拂晓时来到双河镇附近。

这座紧靠图佳铁路，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镇子，却盘踞着二百多个日本鬼子和二百多个伪军。镇外深沟高垒，筑着四、五个据点，遥相呼应。其中关东据点地势较高，是敌人的核心据点。先攻下它来，其它的就好解决了。

姜墨林小队里的十几名队员，都是十六、七岁的“小老

虎”,被选拔为参加摧毁关东据点的突击队。虽然在暴风雪中连续行军两天两夜，但他们仍然精神振奋，立即进行编组，配备火力，准备战斗。姜墨林率领的突击组，有两挺轻机枪，他亲自掌握一挺。初上战场时，他是一名普通战士；而今天，他是一名指挥员，要带领突击组投入战斗，必须做好战斗前的准备工作。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机枪冻了要出故障，步枪冻了拉不开栓，因此，姜墨林抱起轻机枪，就象抱孩子那样，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用自己的体温，保护武器。战士们看到队长如此，一个个都向他学习。

拂晓，突击队利用黑暗和风声的掩护，越过一丈多宽的壕沟，静悄悄地接近鹿砦，距离敌人的地堡仅百米左右。突击手刚把铁丝网剪开缺口，就被敌人发觉了，刹时间，地堡里和炮台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猛烈的火网盖在姜墨林和突击手们的头上。接着，敌人从四处放出了照明弹。雪地上亮光光一片，突击手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姜墨林很沉着，指挥战士们利用地势把身子埋入深雪里潜伏下来。他知道摧毁眼前的地堡，是解决战斗的关键，决不能后退。他情急智生，想出一条办法，立刻指挥战士们分散成四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挖雪沟，顺沟前进；即使敌人听到响声，一时也摸不清方向。突击组爬近地堡，姜墨林首先冲过去，提着一捆手榴弹，堵住机枪眼。在爆炸声中，姜墨林向敌人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枪不要命！投降吧！”果然，伪军动摇了，七、八十名伪军，有的逃跑了，有的举手投降，顽抗的被打死了，三十多名日本鬼子孤立了。抗联的后续部队赶上来，用猛烈的火力，干干净净地消灭了鬼子，占

领了炮台。

攻击其他几个据点的部队看到关东阵地上竖起了红旗，士气大振，也都把自己当面的敌人消灭了，一拥而进，占领了双河镇。战斗胜利结束，共计打死日本鬼子一百多名。这时已是下午两、三点钟，再过一两个小时，天就要黑了，部队处理了战利品，向群众进行了抗日宣传，带上粮食、武器，胜利而归了。

“小老虎”坚决打掩护

部队进入森林，又走了大半宿。计算起来，已经连续行军两天三宿，还打了一天仗，早已是人困马乏，精疲力尽了。走到一座岭上，决定打火堆，大休息。战士们立刻生起篝火，化雪做饭，大吃大喝一顿，庆祝双河镇战斗的胜利。姜墨林倒在篝火旁的雪地上，立刻睡着了。

大风怒吼。篝火燃烧得劈啪直响。突然，一颗火星子飞落在姜墨林的身上，棉衣立刻烧着了。一个战士喊姜墨林：“棉衣烧着了，快起来！”可是，姜墨林一动不动。战士们围过去，只听得鼻孔里呼噜呼噜响，拉胳膊，打屁股，对着耳朵大声喊叫，怎么也弄不醒他，睡“死”了！大家急急忙忙往他身上堆雪，外面的火灭了，可是棉花里的火还在蔓延。战士们急中生智，推着姜墨林在雪地里象擀面条般骨碌过来骨碌过去，火还是没有扑灭。而姜墨林呢？依然睡得香甜。大家可真是急了，不能眼看着让火烧坏身子啊！九名“小老虎”七手八脚地把姜墨林抬起来，就往雪地上扔，扔下去滚两滚，

抬起来再扔，……这么一扔两滚，一冷一热，姜墨林果然醒过来了。他揉了揉大眼睛，闷声闷气地问："你们干什么？"

战士们哈哈大笑："干什么？不这么干，那你早被烧死，该留给狼虫虎豹吃了！"

姜墨林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烧成了七零八落的碎片，急急忙忙脱下来，另找了一件棉衣，刚刚穿在身上，黑暗中猛然爆发了激烈的枪炮声。他愣了一下，只听侯副师长高喊："掩护队占领阵地！"姜墨林知道是敌人追来了，请求参加掩护队，立刻取过枪弹，率领自己的小队，飞奔到山岗上的一堆石砬子后面隐藏起来。

黑乎乎一大片敌人的骑兵，从岭下拥上来了。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姜墨林和他的"小老虎"们，沉住气，又稳又准地射击敌人。他们虽然只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却人人精力充沛，斗志昂扬。而敌人虽有五、六百骑兵，因为地势不利，跌跌爬爬地暴露在掩护队居高临下的阵地前面，处处挨打，不敢冒进。而且，骑兵在森林里，在一丈多深的雪地上，更吃不开，连人带马不断掉在雪坑里，互相拥挤，乱作一团。

天快亮了。为了摆脱敌人，侯国忠决定撤退。姜墨林请求留在掩护部队，率领二十多个"小老虎"战斗在第一线，并且号召说："同志们，我们的胜利不能让敌人抢回去！"

姜墨林小队打死了七、八十个鬼子、百多匹战马，越打越有劲、越痛快。鬼子吃了苦头，急忙拖着伤兵，扔下死尸往回跑了。

“克上克”收留“徒弟”

一九三六年二月，部队向北转移，五军军部到牡丹江一带活动。这时，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姜墨林所在的第五军教导大队，改编为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教导团。

当时，党的省委机关与二路军总指挥部一起住在大森林里，有些紧急的指示要传达给各地党委和抗联各军部队，没有合适的人担负这项任务。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姜墨林，他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有办法的，在宁安出了名，引起敌人的注意，但是现在部队已经不在宁安，而是在勃利、林口、依兰地区活动了。这一次，决定派他到牡丹江克上克屯抗联办事处以及勃利县、依兰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几天以后，姜墨林回来了。他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带回来一名“小徒弟”——十一岁的顾全民。

顾全民是北牡丹江四道河子屯一家贫农的儿子，给地主当猪倌。他的后母成天打他，每次挨了打，他都要跑到抗联办事处来。同志们觉得他怪可怜的，劝他说：不要哭，不要顽皮，要听妈妈的话……。大家关心他，爱护他，经常讲抗日故事给他听。有一天，顾全民挨了打，哭着来找抗联办事处冯丕让处长，说：“我妈妈不好，尽打我，她不是我亲妈妈。你们给我枪，让我打日本吧！”这孩子很聪明，体格也不坏，就是个子不太高。冯处长用好言安慰，劝他长大了再打日本鬼子。顾全民说：那时日本鬼子已被你们打光了，还

有什么打头。他每天都跑到冯处长那里苦苦哀求。人民军队嘛，对穷苦的孩子自然十分亲切。冯处长说："好啦，好啦，留下吧！给我们做饭的同志帮点忙，留下吧。"

从此，顾全民就高高兴兴地在办事处住下了。有时候，冯处长就派顾全民到三、四、五道河子，江东江西送个信、传个话。顾全民很机灵，事情办的不错，冯处长很高兴，觉得他很可靠。这时,姜墨林从总指挥部到办事处送信,见到了顾全民，又听了他的情况，就请冯处长让他跟自己做交通，工作上可以互相掩护。冯处长摇摇头不开腔，一会儿又笑了，说道："我想顾全民有阶级觉悟，不怕吃苦，就批准了吧。"姜墨林高兴极了，于是就带走了这个"小徒弟"。两个人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一双发臭的胶皮鞋，头戴一顶破棉帽——最重要的信件就藏在帽子里。到依兰县城去跑交通。一路上，姜墨林不住地"开导"顾全民。他教什么，顾全民就学什么。有时候，两个人就亲密地在一起啃"窝窝头"。走到警察多的地方，他们就打起架来，姜墨林往顾全民身上撒砂子，顾全民照着姜墨林扔石头，就这么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地从警察身边跑过去——小孩子顽皮，谁去管他？至于那批日本宪兵，对这些流浪的小孩子，自然也不放在眼里了。他们把文件交给地下党组织，然后带上党委给省委的报告，仍然是一路打闹着走出县城。

在牡丹江东岸，和姜墨林接头的，有时就是李升老人——党的特别交通员。李升有六十来岁，身板挺硬实，红光满面。为了进行地下工作，他化装成七、八十岁老头的样子，反正是越老越好，越能够骗过敌人的耳目；并且穿得破

破烂烂，疯疯癫癫，倚老卖老，走到那里，腰里都别着把酒壶，一根长烟袋吊着烟荷包，总是不离手。姜墨林却相反，要装得越小越好，身上越脏越好，样子越顽皮，工作起来越方便。一老一小碰到一块，非常亲热，李老头对于姜墨林那算是喜欢到心眼里去了。

依兰城巧运棉布

一九三七年冬天，日寇调动了十多万大军，企图把牡丹江、松花江下游的抗日联军消灭掉。敌人施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的全面进攻，进行残酷的封锁；到处杀人放火，派遣特务，活动的很厉害，造成了严重的斗争局面。

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和在外作战的一部分队伍，被敌人割断了联系；省委机关和上、下级组织的联系，也被敌人破坏、割断了。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下大雪了，不解决粮食和冬季军服，住在森林里的总指挥部和省委机关人员就会冻饿而死。从敌人手中去抢粮食和服装，就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要用血去换，哪有那么多血！

总指挥部决定派姜墨林小队突破敌人封锁，把指示传达给有关组织，在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帮助下，补充粮食、棉花和布匹；如果地方组织解决不了，就直接动手买。总指挥部并且把骑兵的好马挑选出来，以应付紧急而严重的情况，必要时进行军事活动。

姜墨林率领着一支经过挑选的精悍的轻骑队，穿过森林，

绕过敌人的集团碉堡,来到依兰县城南边约七、八里的一个大洼子里。这里地势复杂，有汽车道、江道，日军常来常往。敌人绝没有想到这里会潜伏着抗联一小队骑兵。姜墨林命令战士们把马藏起来，准备爬犁。他自己换了衣服，背了一条破麻袋，装着又脏又坏的黄豆——两万块钱就藏在里面，独自一人走向县城。

姜墨林装作傻里傻气，歪歪扭扭，却是一路顺利地进了县城，找到了地下党委。党委研究了严重的形势，决定通过抗日救国会组织，把钱分下去，发动群众买棉花、布、靰鞡和胶皮鞋，分别送到城外指定地点，然后集中交给姜墨林小队。计划安排好以后，姜墨林把钱交给党委，便回到城外。途中虽然遇到日本宪兵的盘问，由于姜墨林回话神态自然，没有漏洞，才混过了敌人。

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布和棉花限制的特别严格，每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抗日救国会发动了爱国群众，有老头子、老太婆、青年男女，还有小孩子，每人买三、五尺布或一斤半斤棉花，象走亲戚似的带出城外。虽然有敌人的监视，但群众都很巧妙、机警，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集中起来上千斤棉花、百多匹布和其他原料用品。姜墨林率领战士们，把这些东西分散开安放在爬犁上，前后派出侦察员，便向驻地前进。

姜墨林心里明白，回去的路途一定不会顺利，因为事实本身已经暴露了，从城里偷运出这许多棉、布，敌人必然会利用雪地踪迹找到去向，跟踪追击的。姜墨林选出一部分身强力壮的战士，在运输队的前后护送，碰到敌人就打，无论

如何不能让敌人打着运输队——它关系着森林里两千多人的生命啊！

小队保护着爬犁，顺着江道急驰。遇到有敌人的地方就绕过去。走到牡丹江东岸，离依兰城九十里的土城子附近，果然不出所料，发现了敌人的搜查队，大批日军随后紧紧追来。姜墨林对运输队说："我们打我们的，你们跑你们的。不要管后面。"说完，他带领着十多名战士——大部分是党员和团员，在灌木丛中把马藏好，立刻占据有利地势，埋伏下来。姜墨林对战士们说："我们的目的，就是缠住敌人，好让运输队安全返回后方。运输队如果受到损失，总指挥部和省委没吃没穿，对抗日影响太大了。我们宁肯牺牲也要把敌人挡住，无论怎样，一个活的也不要被日本鬼子抓去。"

下午三点多钟，六、七百敌人骑兵暴露在深雪的地面上，黑压压的一片，追上来了。姜墨林要战士们沉住气，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敌人的骑兵突然遭到截击。猛烈的火力打过去，不少敌兵人仰马翻，横躺竖卧，有的马脱缰向后狂奔。等到敌人清醒过来，勉强布成阵势，一时又摸不清我们的兵力多少，迟疑着不敢硬冲。战斗持续将近两个小时，敌人才判明我们的人马不多，但天色已经黑了。姜墨林利用这个机会，命令战士们跨上战马，终于摆脱了敌人，追上了运输队。

十分疲劳的战士们，稍事休息，不等天亮，便又出发了。下午，到达刁翎河口，与总指挥部派来接应的部队汇合了。恰在这时，又发现了敌情，部队返身投入战斗，掩护运输队转移。结果还是敌人吃了亏，我们的部队带着棉花、布

匹，胜利地回到了森林中的后方。我带着感激的心情向姜墨林和全队人说："你们获得全胜归来，真是一个奇迹！"

姜墨林赴苏留学

一九三八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王效明同志，率领部队在宝清县西方大锅盔山与日寇和伪兴安军的一次作战中，缴获了许多马匹，其中有东北马、蒙古马、也有日本鬼子的阿拉伯种战马。这批马送回指挥部后，战士们挑选了一匹日本指导官骑的好马送给我。

这确是一匹好马，一小时能走二十公里的"千里马"。经过很好的军事训练，而且经历过战斗。看到这匹雄壮的战马，战士们十分喜爱，个个跃跃欲试，都想着骑它一阵，显显威风。有一个战士走到跟前，和和气气地拍拍马屁股，刚想骑上去，不料那马大发雷霆，扬头翘尾，又踢又叫。好几个战士经过试验，都没有骑上去；有的战士虽然骑了上去，尽管使劲勒缰绳，用鞭子抽，结果还是被摔了下来。战士们气得直骂："当了俘虏，还不服气？"

姜墨林知道好马的脾气，它是不让拍屁股的，也不能用鞭子打，更不能拉着缰绳使劲乱勒。这时，姜墨林走过来，想试试看。战士们笑他："豆大点个子，也想骑它？小心把你踢死！"

姜墨林很有把握地接过缰绳，并没有拍马的屁股，那马不踢也不跳，只是扬着头。姜墨林得意地说："怎么样？稳稳当当拿在手里了。"战士们说："吹牛，骑上去看看，不摔

下来才怪呢！”

姜墨林检查一下马肚带，勒得挺紧，就说：“没关系，鞍子翻不了，我就摔不下来。”说着，他左手握住缰绳，右手勉强的又很迅速的往后鞍桥上一伸，飞身上马。那马象触电一般，立刻翘起尾巴，又跳又窜。姜墨林骑在马上，两只脚勉勉强强够着马镫，两条腿却夹的很紧，他既不用鞭子抽马，也不乱勒缰绳，稳稳当当坐在马上。那马示威一番，没有结果，就驯服了。

战士们立刻议论纷纷：“怪事，它怎么就服姜墨林？”

这事正好叫我看见了，我对战士们说：“没有什么奇怪，姜墨林懂得凡是好马不喜欢人们乱拍马屁。马也通人性，你既不要畏惧它，也不要吓唬它；没有骑上去，你如果就先害怕，骑上去动不动就使劲乱勒缰绳，用鞭子抽它，你这样整它，它当然不干了。”

不久，二路军总指挥部在宝清兰棒山停下来，我们得到机会，可以送一批同志到苏联去学习。我考虑到姜墨林年轻有为，六、七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应该培养他更好地为党工作。

于是，我把姜墨林找来，告诉他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不料他却说：“我很愿意学习。可是，让我离开战斗的部队，我实在舍不得。等我学完了回来，也见不到日本鬼子了。总指挥，是不是能派别的同志去？”

这时，我们已经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了。我就向姜墨林解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长期抗战，在我们东北，更是长期的了。即使关内的问题解决了，

说不定东北还要打一阵子。

一九三八年八月，姜墨林向东走了。

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一年以后，为了适应十分困难的环境，坚决打击敌人，抗联把部队分成许多小队。这些小队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搜集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寻找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联系群众，在群众中建立抗日宣传据点和地下抗日组织，在必要的情况下，确有把握时，可以打击、消灭小股敌人。各小队都是单线联系，独立活动。在一定的时间，总指挥部通过无线电台指示工作。

姜墨林从一九四一年由苏联学习归来，到一九四三年单独率领小部队，活动在牡丹江中东铁路沿线，有时到宁安、敦化，有时越过老爷岭往苇河县、舒兰县一带活动。小部队做了许多工作，从来没有受过损失。

深秋的一天，姜墨林的小部队从牡丹江以西地区向东转移，来到乜河镇附近。乜河镇是个战略要地，驻有上万敌兵。距乜河镇南二十公里左右，有一个敌人据点，约二十多名日本鬼子驻守，其目的是：监视抗联小部队的活动，镇压林区的伐木工人和监视伪警察队。姜墨林觉得这个据点比较孤立，敌人兵力不多，再加上好些时候没有和日本鬼子交手了，乘机在这里打一仗，不会犯错误。战士们都拥护队长，愿意打一仗，然后再往东奔向目的地。

据点的工事是土木工程，并不坚固。黑夜里，当姜墨林

小队摸上去时，敌人竟连个站岗的都没有。小队突袭敌人，一顿猛烈的枪火和爆炸，不到半点钟的工夫，二十多个鬼子就被消灭干净了。姜墨林带小队立刻转移，向绥芬河大青山方向走去。他们还没来得及跨过中东铁路，乜河镇敌人已经派出几百名骑兵和几百名步兵，进行搜索和追击。同时，敌军指挥部还通电各地日伪军，下令把中东铁路牡丹江以东一段地区严密封锁。

姜墨林发现前面的道路行不通，当即改变方向，从东北转向东南，打算到东宁县南方的山区去。走到离东宁西方一百多里的二十八道河子，他们突然发现已被包围在河谷里了。姜墨林立刻命令战士们散开，伏在大石头后面，和敌人展开了战斗。四面八方是层层的敌人，火力很猛，姜墨林知道已陷入重围，就和几名党员商量，把文件烧毁了，用石头把无线电砸碎，扔到急流的河里。这时，有几名战士已经在敌人的火网下面英勇牺牲了。最后，连姜墨林只剩下四个人，其中有两名战士还负了伤。形势十分严重了，姜墨林一边用机枪扫射敌人，一边沉痛地对三名活着的战友说："我犯了错误，不该冒险行动，……只认为那是个孤立的据点，其实，这个据点是处在敌人的重兵范围内，算是什么孤立据点？错误由我负责……。"他瞄准前面一排敌人，狠狠扫了一梭子，继续说："你们三个人，不管负伤没有，立刻突围。这里由我一个人顶着。无论如何，你们要活下来，回去报告总指挥。"

三个战士不愿意丢下自己的队长。姜墨林急了："总得有人回去报信啊！我是队长，要我离开这里，就不能留下一

个活着的战士！你们赶快突围吧。我一个人顶得住，没有问题。即使我牺牲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也必定会胜利的……。”

突然，一颗敌人的子弹打在姜墨林的腿上，战士们刚要靠拢过来，姜墨林用力把手一挥：“快！立刻突围，执行命令！”

三个战士犹豫了一下，转身顺水沟往外跑去。姜墨林也顾不得包扎伤口，对着敌人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以便掩护同志们突围。他偶尔回过头时，却见一名负伤的战士跑了不远就倒下去了；幸而那二名战士已经冲了出去。正在这紧急关头，机枪突然哑巴了，子弹打尽了。他急忙卸下机枪零件，一个个扔掉，然后，从腰里抽出二十响盒子枪。

敌人发现只剩下一个人，便叽哩哇啦地从四面围上来，一心要抓个活的。姜墨林毫无惧色，瞄准最前面的敌人，一枪打倒一个；看看几十名敌人来到近前，伸手要抓他，少年英雄姜墨林举起二十响盒子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火热的胸膛。

一群日本鬼子蜂拥上来，象饿狼一样张牙舞爪地举起刺刀就要往姜墨林遗体上扎，一个鬼子军官大叫“住手！”跑来一看，突然跺脚说：“可惜，为什么不抓活的！？”敌兵在姜墨林遗体上开始详细翻检，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在外衣兜里翻出一个纸条，上面是红铅笔写的：“中国必兴，日寇必亡。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救国胜利万岁！”这样的汉字标语，日寇官兵是不用翻译一看便知的。日本军官赶快把它揉搓掉，生怕更多的日本兵看见受“赤化”。周围看见过标语的日本兵一个个呆若木鸡，站立不动。

噩耗传来，全军上下万分悲痛，默然向英雄牺牲的地方哀悼。多么可亲可敬的英雄啊！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那暂短的一生。他那英雄的行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那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抗联战士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日小英雄姜墨林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永不褪色的红旗

——人民英雄车老四殉难纪实

“九一八”事变已经三十年了，在整个抗日救国斗争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获得了胜利。无数的优秀儿女，人民英雄，为争取最后胜利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车老四就是这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之一。

吉林省宁安县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基本游击区和根据地。在东京城（五区），这广袤百余里的农村中散居着七千多户人家，青年几乎百分之八十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被日寇视为“赤匪区”。

车老四家住在上马兰河西沟，他家是贫农。父亲车双义，四十多岁，但显得苍老，为人正直，性格刚毅，热爱家乡。“九一八”事变后，他告诉二儿车兴、三儿车旺说：“你们参军上队去吧，拿杆枪，多打死几个鬼子，这不只是为老百姓出口气，而是要为赶走日本救中国尽义务……留着老四在我身边，好替抗联多做些支援工作。”从此，两兄弟参加了抗联第五军，成为抗联部队中优秀战士，立了许多次战功。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北湖头袭击日寇战斗中，车兴战

死。他父亲接着亡故。国仇家恨，使车老四更加坚强起来了。一次宁安县委派车老四到五军军部送信，军领导同志接见了他。这时的车老四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了，浓眉大眼，身躯健壮。经过问话，军领导同志了解他是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有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非常喜欢他，把他留在军队教导团，指定专人负责教他政治常识、射击投弹以及地下工作活动的技术训练。经过一个月以后，派他回到了地方组织。他做了不少出色的地下交通联络、运输、侦察工作，成为东京城"抗日救国会"的青年领导骨干之一。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严冬的残酷游击战争刚刚过去，是敌我斗争的间歇时期，抗联游击部队正积极准备展开新的战斗活动，首先需要从地方上获得粮食补充。五区的"抗日救国会"也在积极动员群众加紧运输。

一天夜里，马兰河西沟"抗日救国会"会长张成寻找车老四，让他负责带队给抗日联军送粮食。车老四欣然同意了。

粮食运输队共三十二个人，九十五匹马。半夜两点钟，车老四带着人马出发了。

他们机智巧妙地越过图佳铁路的敌人封锁线，向卧龙河南方老松岭方向走去。第二天正午到达平岗，向抗联二、五军后方管理处交了粮食。抗联的同志招待他们休息，并召开了欢迎晚会。第三天下午东北风骤起，雨雪交加。车老四带着空载的人马往回走，刚出林子边，突然发现日寇"讨伐队"二百多人，距离不过六、七百米。先头的寇兵一面叫喊

"站住！"一面散开包围前进。车老四心里明白，如果跟大家一齐逃跑，总有些人逃不脱，会被逮住的，抗联平岗后方的粮仓可能会暴露，送粮的村屯也要暴露，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他立刻吩咐各组长带着所有的人和马迅速返回林子里，大距离地散开隐蔽，不要暴露出踪迹，连夜向西南方逃走，各自直接奔回家。之后，车老四一个人牵着自己的两匹马，迎着敌人慢腾腾地走去。寇兵果然被他的行动吸引住了，蹒跚地闯上来包围他。一个寇军队长用指挥刀背劈了车老四两下，问道："共匪的通通的有？你的什么的干活？"

车老四沉着冷静地说："通通有、通通有，他们在林子等候皇军的有，我是来回话的有。"

寇兵抢过车老四的马匹，用绳子绑了他的两臂，牵着他向林子走去。到林子里一看，空无人影。寇军队长大发雷霆，狠狠地打了车老四一顿。一旁的翻译追问："这么多的人和马明明是为匪送粮入山的，到底往那里去了？是你有意欺骗皇军，把他们放跑的嘛？！"

车老四镇静地答道："大概是他们趁我来见你们的机会跑了的。"

寇军队长愤愤地暴跳起来，挥舞指挥刀连劈带打，车老四立刻变成血人。但他始终硬挺着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住地，不肯说出给抗联送粮的实情，一口咬定他是一个到处为家的中国人，这样更激怒了日寇队长，跺脚疯狂嚎叫。

寇军追问不出结果，怕深夜受抗联游击队袭击，仓猝地

往回走了。经过两天之后，车老四被押解到东京城街里，寇军宪兵队进行严刑审讯，车老四遍体鳞伤，对日寇坚持斗争，始终不说一句话。最后日寇把几个特务走狗叫来，对着面目模糊的车老四脸上细细辨认。其中一个姓梁的走狗大声叫出："这不是马兰河西沟的车老四么！"

在民族败类面前，是难以隐瞒真面目了。车老四睁大了眼睛，愤怒地骂道："汉奸！走狗！日本鬼子迟早要被中国人民消灭的，你们这些卖国贼，将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东京城街里的日本守备队，这些日子正在阴谋计划，到处搜查民间抗日线索，寻找借口，准备对五区全体农民实施"赤区肃正"的大屠杀；对于车老四的案子十分注意，希望从车老四身上，获得口供。认为非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不可，立刻松开被绑着的车老四，扶他到炕上躺卧着，嘱咐其走狗们好好的"照应"，不得怠慢。

一连五、六天，车老四被"优待"起来了。每顿饭有人送，医生给治疗伤口；特务们轮流和他闲谈，"安慰"他，"劝解"他，要他照实把全部实情招供出来。然而，车老四始终坚不吐实。

从车老四被捕送到东京城那天起，上马兰河、中马兰河、西沟一带各村屯，表面上虽然平静无事，可是农民们都悬心吊胆，深怕车老四抗不住刑法的折磨，说出实话来，那么整个五区就将大祸临头。区"抗日救国会"会长不断派人到东京城街里打听审讯情况，并希望能营救车老四。但是日寇封锁消息很严，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因此，村民们十分焦

急，暗地里捏着一把汗。

车老四被日寇宪兵“优待”的地方是街西头一个土院套，院套的围墙不高，正房是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这是没有居民住的空院子。车老四被安置在正屋东头，前后窗户都被堵死。有三、四个特务住在房西头，每天夜晚有二人轮流住在车老四的屋里，坐卧不离地监视他，一盏半明半暗的灯通宵放在小炕桌上。每到天黑就有四名日寇来到东厢房住下，担任夜间巡逻。

以往，车老四常来东京城街里进行交通联络和搜集情报活动，对这里的大街小巷及周围的设防是熟悉的。他下定决心要逃走，装出伤势很重，体力不支的样子来麻痹特务们，暗地里对着院内敌人设防和活动情况留心观察。

有一天，半夜刚过，车老四突然听见屋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接着刮起大风，车老四见对面炕上躺着的那两个特务都已沉睡，还交替地发出鼾声。他故意弄出动静来试探，悄悄起来把灯吹息。两个特务象死狗般依然熟睡。车老四侧耳再向屋外细听，雨声很大，风也刮的很急，却没有听到日寇巡逻兵的脚步声。逃跑的机会到了。他轻轻地走到对面炕角，把两个特务的胶皮鞋抓到手中，一双穿在自己的脚上，一双紧扎在腰里，偷偷地开了房门，进到外屋，站在灶台上用力撬开后窗户，轻轻一跃，跳出窗外，迅速地走了十多步，到后院墙角下，又返身一跃，两手掌紧紧地反贴到墙头上，一个鹞子翻身，上了墙头，转身跳到墙外，顺着熟悉的小胡同，往街西舞风楼方向飞也似地跑去。他越过防护壕沟，上了通往长岭的大道，拚命的奔跑。

他跑了十多里路，感到筋疲力竭，全身发酸，便在春柳依稀，土堆起伏的小沟边坐下休息。突然听到马声嘶吼，人声嘈杂，距他二、三百步的大道上，日寇的骑兵急驰而来。为躲避日寇的追捕，他趴在地上隐蔽起来，日寇从雨后泥泞的路上辨认出他的踪迹，向他隐藏的地方搜索。

他已经暴露在敌人眼前了。

不等敌人接近，他起来拔腿飞跑。敌人在他身后追赶着，开枪射击。他的右腿连中数枪，倒在地上再也不能动了。敌人围拢过来，生擒了他。然后将他捆在一辆马车上，由两名日本兵、四个警察押解着。他们得意洋洋，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往回走。

车老四再一次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东京城和五区，人们更加仇恨敌人，牵挂着英雄，难以避免的危险和忧郁气氛绞着人们的心，都沉痛的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敌人就要下毒手了。车老四被捕的第二天，上自图佳铁路的鹿道车站，下至东京城附近的大小荒地一侧，沿铁路线的居民，男女老幼两千多人，被大批日寇宪兵和伪警察驱逼着，聚集到上马兰河西沟沟口的空地上，围成一个圆圈。西沟屯的农民二百多人被日寇威逼，拳打脚踢，强迫跪在人圈的前面。午前十一时左右，车老四被绑在三匹马拉的大车上，押解到西沟沟口，后面跟着日寇步骑兵各百余名。守备队长小林少佐，杀气腾腾，冲进人群中央，将绑着的车老四从车上解下来摔到地上。

长着一副凶恶面孔的小林少佐，拔出指挥刀，瞪着两只豺狼般的眼睛，抬起腿用力向车老四头顶上狠狠地踩去。踩

累了，又用皮鞭抽打，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狂叫："今天最后说实话的有，说实话的，皇军通通地放了你们，好好做大满洲国的臣民，实现大东亚共荣，日满协和，友好……"

车老四猛地爬起来，破口大骂："住嘴！什么日满协和、友好？杀中国人，占中国地方，抢夺中国的财富，这叫友好吗？东北是中国人民的，小林你休想夺走！"骂声不绝。

聚集的人群都屏住了呼吸，敬仰着英雄，几千双眼睛迸发着愤怒的火光。小林少佐被骂得嗷嗷乱叫，他挥舞着手中的皮鞭，发泄着野蛮的兽性，鞭抽、脚踢……车老四还是不住地骂。小林少佐打红了眼，随手拿起战刀，喀嗤一声，割下老四身上的一块肉，血淋淋地拿着，威逼他："你说实话的有，运粮的有，送到哪边的去？"面对豺狼的屠刀，铮铮铁骨的车老四，声如铜钟，边骂边回答："送粮的，就我一个人！"小林气急败坏，向鬼子兵一挥手，两条凶猛的军犬牵来了，向小林摇着尾巴，等待主人的命令。小林奸笑地说："不说实话的，死了死了的！"

车老四轻蔑地斜了小林一眼，毫不惧怕。

小林少佐看车老四坦然自若的样子，气得更加咬牙切齿，喊着两条军犬的名字，向车老四腹部一指，军犬立即扑上去，撕裂了车老四的肚子，顿时血肉模糊，地上殷红一片。小林向两条畜生命令地又喊了声什么，它们立刻驯服地停止撕咬。小林上前一步，冲着车老四，一句一顿地说："现在的，实话说，活命的有。"向翻译一摆手。这个两条腿的"狗"，蹲到车老四跟前"劝说"："少佐的意思是：你现在把送粮实情说出来，还不晚，狼狗咬的伤，皇军一定能

给治疗好。”

车老四怒目而视，向这个无耻之徒啐去。小林看到这种情形，沉思片刻，感到面对这样的中国人，已黔驴技穷，再无计可施了，遂命令两条军犬再扑向车老四，咬裂了前胸，掏出了肠子。车老四的骂声越来越微弱下去了，直到停止了呼吸。

安息吧，杰出的民族英雄！你的鲜血没有白流，浇灌了灿烂的革命之花；你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间，与日月共存；你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人们昂首奋进！

一九六一年于北京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英雄妇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领土、实行“满蒙政策”的开端，也是进一步侵略我全中国的序幕。由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多万人民，拱手让给日寇。日本帝国主义极其残暴地压榨和剥削东北人民；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人民怎能忍受这亡国奴的滋味！

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满洲省委，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主张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实行对日坚决抵抗，收复东北失地，开展抗日游击运动。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国人士和不愿做亡国奴的各族广大群众，团结在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周围，武装起来，奋不顾身，同日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光辉历史的重要一页。当时曾写过歌词，描述当年情景：

（一）

倭寇袭来，炮声响，陷落沈阳，

国民党，不抵抗，出卖河山！
姣妻美妾鸡狗散，边关将帅乱逃亡，
丢下了，黎民三千万，受灾殃！

（二）

民族危亡，谁挽救？人心惶惶。
共产党，提出主张：停止内战！
收复失地掉枪口，保卫祖国惩倭顽！
振臂起，工农兵学商，齐抵抗！

（三）

激荡辽水，卷松江，游击酣战；
燎原火，遍地飞扬，敌寇胆寒。
三岛日日归白骨，九州夜夜泣夫郎；
贼子叹，吞侵略后果，肝肠断！

的确，日寇的侵略毒害，曾长时期污染了我东北原野和山林，正如一九三七年日寇关东军东防卫地区司令岩越，曾在伪满报纸上发表过炫耀“皇军赫赫武功”，但却带着哀叹的文章说：“日本皇军的鲜血，洒遍全满洲。”是呀！日寇踏上东北领土，逐步侵略全中国，最终自食恶果“肝肠断”！

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苦斗，达十四年之久，直到全国获得抗战最后胜利，这是由三个最重要因素促成：东北各族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气

节，彻底反抗日寇的决心与民族团结，特别是中朝民族的坚固团结；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爱国青年为基础，形成抗日游击队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的前列，团结了东北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领导。除了上述的基因，还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东北妇女和男子一样，她们自始至终，踊跃地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无论在群众性的对敌斗争中，或在游击战斗的战场上，或在军队后方工作的各方面，都起着积极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所熟知的、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员赵一曼，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忠贞不贰地贡献给革命事业，当处于残酷考验的紧要关头，她抱着视死如归的革命节操，对日寇进行了惊天动地的顽强的战斗，使敌人丧胆，激励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又如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的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农民出身的妇女干部李秋岳①同志当她在珠河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协助发展游击队和组织群众斗争工作之后，引起敌人的注意和对她的追捕。省委调她到方正县担任县委领导工作。她领导那里的

---

① 据所知，李秋岳一九〇八年生，就义时二十七岁。她父亲、叔叔、长兄参加过一九一九年朝鲜“三一”运动，被日寇杀害。母亲领着秋岳、弟、妹于一九二〇年逃亡到中国，寄居吉林省延吉县。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移居北满，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一九三〇年与杨林同志结婚，同在哈尔滨工作，一九三二年调往珠河、方正县工作。

杨林在中国红军时名“华师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大革命，广州爆发起义失败后，赴上海，党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二九年派回东北工作。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四月调往中央苏区建设红军炮兵。一九三六年东渡黄河战死（一说病故）。

“中朝人民抗日救国会”，支援松花江右岸的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初秋的一个晚上，她为筹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奔波之后在返回住所的途中，伪警察把她当做嫌疑犯捕去拷问；后来日本特务把她辨认出来了。开始对她严刑逼供，继而采取政治诱骗。经过两个月的折磨，李秋岳同志决不屈服。她虽遍体鳞伤，骨瘦如柴，气力不支，但一见敌人，就气愤填膺，痛骂不绝。敌人在她面前颓丧狼狈，不敢抬头。后来，她被敌人绞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方正、珠河、宾县各地，广大群众为她壮烈牺牲所激励，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使那一带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会”得到了发展。

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在东满（延边）抗日游击区各县，同日寇的斗争极为尖锐。中朝人民大批受到了日寇宪兵、特务的逮捕，山区游击根据地的人民不断遭受日寇的“扫荡”、屠杀、焚烧。但是这一地区的中朝妇女们，不仅为数众多地参加了抗日联军、游击队、自卫队，英勇地打击敌人，而且几乎是独立地担负起重建或新建游击根据地的一切艰苦工作。这个地区妇女们的抗日斗争的事迹，成为东北广大地区的模范。

崔玉珠① 是一个刚满八岁，聪明伶俐，能歌善舞的“小姑娘”，是“东满文艺宣传队”的核心人物。她把家里的六口人，为革命而全被日寇捕杀的事迹编成词曲，形象地融化

① 崔玉珠全家六口人，因参加朝鲜“三一”运动失败后，逃亡到中国吉林省汪清。一九二三年她生于汪清大百草沟。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间、烈女的父母、伯、叔、长兄、长姊均为共产党员“革命案犯”，为延吉日本总领事捕杀。一九三二年初，烈女参加中共领导的汪清荒沟儿童团，即开始积极工作，直到一九三五年被捕后壮烈牺牲。

与表现在舞蹈和歌唱中，无论什么样硬心肠的人，一听到“小姑娘”的歌唱，一看到她的舞蹈，就会由衷地激动起来，潸然泪下。一九三四年春，小姑娘随从“东满文艺宣传队”远到北满牡丹江地区，到为党所争取和改造的抗日部队中进行宣传活动。她的演出给那一带武装抗日部队以很大教育，使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争取工作得到落实，党和抗日联军的领导机关。把小姑娘的成就珍视为“奇迹”。一九三五年日寇派遣大兵力长期“围剿”延吉、汪清一带游击根据地，血洗山林地区，大批搜捕抗日组织的人们，小姑娘也在汪清游击区被敌人捕去了，押送到延吉龙井村敌人的东满特务巢穴。日寇“总领事”亲自提讯，满以为弱小女孩可欺，甜言蜜语地哄骗她，劝诱她投降做“顺民”。小姑娘破口大骂：“你们侵占我祖国，杀我全家，对我东北人民实行血腥镇压，我决不投降。你们杀了我吧！总有一天你们会被抗日人民消灭干净的！”寇酋哈哈大笑，站起来离开座位，走向小姑娘，伸手拍拍她的双肩说道：“你不要为共产党的欺骗蒙住了，快快觉醒还来得及呢……”小姑娘勃然大怒，挣脱了寇酋的双手，推翻了公案桌，全身用力，一头撞去，几乎将“总领事”撞倒。日寇立刻露出狰狞面目，将小姑娘捆绑起来吊打，施以酷刑。小姑娘遍体鳞伤，死而复苏则好几次，最后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朝人民亲密团结万岁！”直至气绝牺牲。

在佳木斯做小学教师兼做党的抗日地下工作的冷云同志，一九三七年由地方组织调转到抗日联军第五军作文化教育工作。一九三八年初，她随抗联四、五两军西征部队游击

到哈尔滨东南地区。冷云同志被编入妇女队，经过半年的艰辛战斗锻炼，知识分子工农化，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是年初冬，情况不利，该部队返回牡丹江岸地区整补，日军大举进攻。在牡丹江乌斯浑河口附近一次激战中，冷云同志与安、胡、崔、王、郭、黄及杨桂珍等八位女战士，在战况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手挽手拧成钢索一般，横涉急流，奋力战斗。敌人对她们进行两岸夹击，上下游兜圈，她们战斗到气尽力竭，最后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抗日必胜万岁！”慷慨捐躯。

参加抗联为时九年，转战东北满数千里，后勤工作好手，又是机关枪射手的朱新玉和刘英、崔正淑、片莲荷等七位女同志，在一九四〇年深冬大雪中，她们的部队遭受到富锦日寇绝对优势兵力的袭击，战况异常恶劣，伤亡累累。这七位女战友身受重伤，还在雪坑中坚持抵抗，饥渴寒冻把她们窒息过去，醒来时已被敌俘虏押解宝清城内。敌人企图用物质与生命的代价引诱软化她们，但是七个人始终一条心，坚贞不屈，一见敌人就大骂不绝，痛数敌人的侵略罪行，并跃起撞击和扑打敌人，终于七人同命，壮烈殉国。

陈玉华同志，少年时代就在宁安县东京城区，在我党领导下，担负大小荒地一带农村的抗日救国组织工作，曾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对敌斗争的任务。一九三五年她被调到抗联第五军，由宁安出发，转战数千里到北满黑龙江平原，参加游击战争达七年之久。她是部队中的学习模范、工作和战斗模范。她体格弱小，但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经受过无数次残酷斗争的考验。一九四二年冬，她所属的特别分遣队，由同

江县境向饶河县作战斗转移，在小佳河附近，遭受敌人重兵包围攻击。队长、指导员相继阵亡，副队长负重伤，陈玉华同志坚决地担负起指挥分遣队的责任。同志们愈战愈强，打死打伤不少敌人。但最后以众寡悬殊，分遣队被击败了。弹丸穿透了陈玉华同志的胸膛；临死前她砸碎了无线电通讯工具，把它扔到积雪很厚的深坑中，并吞吃了密码。敌人一无所获，只看到她的圆眼大睁、栩栩如生、矗立不倒的遗体。

临到生死关头，为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从容就义的女英雄的事迹是很多的，上述仅举数例而已。

随着日寇侵略压迫的加紧，抗日游击运动走向最高潮，妇女广泛地被吸收到抗日联军部队里。她们英勇顽强地参与作战，或在后方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抗联第二、四、五、七各军的全部冬夏季军衣，差不多都是由妇女一手做成的。此外，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妇女的学习精神也是惊人的。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二年间，东北抗日联军领导机关从地方抗日救国会里、从部队里选拔了许多妇女同志，分批送苏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医疗救护、无线电通讯等等。她们知道自己是大老粗，缺乏文化修养，学会现代化技术是有困难的。但是，她们一想到日寇的残暴，一想到抗日游击作战部队的需要，一想到党对她们的信托和交给她们的任务，便勇气百倍，互相鼓励，克服困难，孜孜不倦地勤学苦练。在短期内，有的学成“简易医生”、“护士”，有的学成无线电通讯能手，有的学会机关枪、步枪、手枪，成为射击能手。至于撑舟、游泳、滑雪板，几乎人人都会，并且是熟练的好手。最使人感动的是，有五十几名的一队妇女，在一九四二

年间，上级领导把她们派到"航空陆战队"学习跳伞。与她们同时学习的男子里，还有这样的"英雄"，死也不敢跳伞，只好开除学额，半途而废。但在女子队中，没有一个畏缩的，都很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使得许多教官也为之惊奇，赞不绝口。她们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效果显著，加强了游击作战的力量，特别是在抢救伤病患者和远距离通讯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妇女同志们在革命战斗中的吃苦耐劳，经得起残酷条件的考验，也是很出色的。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东北游击运动形势逆转，斗争处于极度尖锐和艰难的境地。抗联部队每一个战士身上的负荷是很沉重的，除了携带枪械弹药，还得背上自己的给养、预备的服装、小帐篷、锹、镐、斧、锯和炊具等等。妇女同志的负担不但与男同志等同，还要携带药包、针、线、尺、剪、补衣服的碎布，有时还得背着成匹的布和缝纫机。如果男同志背包重四十斤、五十斤，那么女同志只多不少。男女同志身上的负荷这样重，无论寒暑，成年累月的长途跋涉，日夜行军作战，男战士中有不堪忍受以致苦死累死的，甚至有个别人借口不怕死，只怕苦累而逃亡叛走的。但是据我所知，妇女中没有怕吃苦受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

一九三九年初，正是严冬大雪封山的时候，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把抗联第五军围堵在牡丹江东岸刁翎地区。此时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以及直属部队三百余人，其中包括妇女队员近五十余人，被另一部寇军九千余人包围在江西岸夹皮沟里，寇军满以为"擒敌先擒王"，压缩包围圈，企图全

歼我总指挥部而后快。当时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择：对敌作最后孤注一掷，坠入被围的圈套；或是避免与敌接触，寻找空隙脱离敌人的包围。我们选择了后者。但是在那约有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林区里，敌人分布密如蛛网；从凌晨到傍晚，几十架敌机低空搜查、扫射，盲目投弹轰炸。就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我军同敌人象捉迷藏般周旋了将近一个月，终于安全地脱出了敌人的包围，向四道河子方面转移，汇合了抗联第九军和救世军残部，西越老爷岭，去突击方正县陈家亮子敌据守的采伐场。那时，大雪纷降，朔风凛冽，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间，寒冻断指裂肤，饥饿疲乏，困扰士气。行军在峭壁峻岭的深山大谷里，真是狂风怒吼，林木摇曳欲坠，风声响彻山谷，震撼崇峦，令人惊心动魄。有时暴雪满空，夹带飞砂走石，遮天盖日向人们袭来，征衣如剥，寒冻倍增，夜间露宿，帐幕难支，篝火熄灭，即使疲惫达到极点，也无法成眠，有时在那高大茂密、看不见天日的原始大森林里，突然又会出现另一种景象：崇山峻岭，怪石嵯峨，难辨行军的方向；雪堆冰河到处萦绕，难以寻找前进的路径；刹那间又显得静悄悄的，万籁无声，飞鸟藏形，走兽绝迹。这样异乎寻常的静寂，好象即将爆发决生死的恶战前景，心情反而为之惴惴不安。我们战士饿了，吞黄豆和粗糠充饥，渴了化冰雪为饮料。有的同志抵抗不住冻饿倒下去了，几分钟后就变成坚石般的僵尸。我们的妇女同志和男子一样艰苦行军，没有掉队落伍的。有时还和尖兵走在队伍前列，一面在深雪中踩出路径为后面队伍开路，一面搜查警戒作战斗准备。经过七、八天的艰苦行军，到达目的地。在胜利地袭击陈家亮子

敌防所时，妇女同志勇敢地冲杀敌人。撤退时又与掩护队一块，据险设伏消灭敌人的追兵。她们的意志始终是坚定而旺盛的，情绪是饱满的、愉快的、活泼的。她们无论在行军和宿营时，做完自己的事，还踊跃地帮助男同志整补服装装具，看护和治疗伤病员；每当情况许可，在行军中或宿营时，她们放开嗓子，唱出动人的歌曲；夜间围着篝火堆，扫除积雪开辟场所，举行小型舞蹈会，开展文娱活动，或者利用火光照明，学习文化和讨论政治和业务。人们把这些看做“难能可贵”的“奇迹”，而妇女同志“安之若素”视为常事。妇女同志这种革命斗争表现，在抗日救国会地方组织里，特别是在抗日联军部队里，引起男同志的由衷称赞：“咳，娘儿们都能这样，真是愧煞须眉了。”从此，许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部队中的战斗意志加强了。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妇女的英雄事迹是说不尽的。有人问：“为什么妇女能够这样坚强呢？”显然劳动妇女除了和男子一样受民族的与阶级社会的双重压迫外，还受旧中国宗法封建社会制度的压迫。当她们找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斗争出路时，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为群众占有，便成为力量。”妇女参加革命斗争自然就显得格外有力了。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以后，东北妇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斗争，支援了东北人民自卫战争，解放了东北全境，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和抗美援朝，巩固工农业基地的建设，同男子肩并肩地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悼念杨靖宇将军

——十八年后公祭之日

（一）

奴隶人民，求解放，中原揭竿。
初奉命，豪迈忠勇，北伐助战；
只因金陵蒋党叛，人民革命受挫伤。
八一后，工农兵创造：大别山。

（二）

倭寇袭来，炮声响，陷落沈阳。
不抵抗，青天白日，卖我河山。
娇妻美妾鸡狗散，边帅儿郎逃榆关。
丢下了，黎民三千万，受灾殃。

（三）

民族危亡，谁挽救？人心惶惶。
共产党，提出主张：坚持抵抗。
将军沪江再受命，先期闯关过辽阳。

振臂呼，工农学商，齐奋战！

（四）

卷起辽水，搅松江，游击战酣。
燎原火，地覆天翻，熬敌心脏；
三岛夜夜迎归骨，九州日日现白裳。
贼子叹，侵略图后果，太渺茫。

（五）

倭寇荡净，河山还，万众腾欢！
挺胸膛，气吐眉扬，遥祝天安！
工矿矗立如春笋，重庆三宝豆麦粱。
手挽手，社会主义，跃康庄！

（六）

将军气节，高白山，党员模范！
抛头颅，慷慨激昂．求大解放！
革命斗争为整体，那管自己存和亡！
千万人，景仰勋绩，永难忘！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为东京城镇革命纪念馆作

（一）

顽恶日寇，三十年代发疯狂，
伸铁蹄，践踏我东北领土百万方。
南京政府，国民党，不抵抗，步步投降，
看啊，国未亡，东北人民先遭殃。

（二）

牡丹江流长，葱郁森林夹两岸，
各族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
眼看要荒凉，生机将绝望。
起来干，高举抗日红旗，围绕着中国共产党。

（三）

时间表，十四年游击苦战，
宁古塔——东京城儿女好榜样，
不怕狂风怒吼，那管暴雪飞扬；
忍饥渴，耐地冻天寒，

流鲜血，抛头颅，为祖国争光，为人民解放。

（四）

老黑山上埋丑虏，镜泊湖里荡腥膻，

揭开夜幕见天日，大好河山庆旧还。

无名英雄功绩伟，子孙后代永难忘，

跃进建设新社会，继往开来放光芒！

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于北京



统一书号：10090·340
定　　价：0.48 元